

史坦倍克原著

蘇聯行

賈開基 蔣學模 合譯



封面說明並代譯序

——史坦倍克在喬其亞一家農舍的筵席上講的話和祝杯的留

影，詳見本書第 208 頁。

「我們就建議爲取消所有的「幕」——鐵幕、尼龍幕、政治幕、虛僞幕、和迷信幕而乾杯。我們建議道，幕是戰爭的前奏，假如戰爭果真會到來，那就不外乎兩種理由——不是由於愚蠢，便是出於故意。假如任何領袖蓄意要戰爭，那末就應該把那些領袖去掉，假如是由於愚蠢，那末就應該更仔細地查考它的原因。我們建議道，既然不論那一個人、甚至最愚蠢和最好戰的人也不能想像在一次現代戰爭中有人可以得勝，那末，凡是真正蓄意要戰爭的任何方面的任何領袖，都應該當作一條瘋狗那樣的被趕下來，使他與人羣隔離。」

蘇 聯 行

史坦倍克原著
賈開基 蔣學模
合 譯



3 0661 2333 6

文 摘 出 版 社
發 行



『蘇聯沒有一件事情可以不在史達林石質的、銅質的、油漆的、或刺繡的眼光之內。他的畫像不但懸掛在每一座博物館裏，而且懸掛在每一座博物館的每一個房間裏。他的彫刻像站立在一切公共建築物的前面。他的半身像懸掛在每一個飛機場、火車站、和公共汽車站的前面。他的半身像也懸掛在所有的學校裏，而常常是他的半身像後面又掛着他的全身像。在公園裏，他坐在一張水門汀的椅子上，與列寧討論着問題。小學裏的學生刺繡他的肖像，商店裏出售他的照片數以百萬計，每一家人至少有一張他的照片。史達林的繪畫、彫刻、鑄鑄、和刺繡，一定是蘇聯最大的企業之一。他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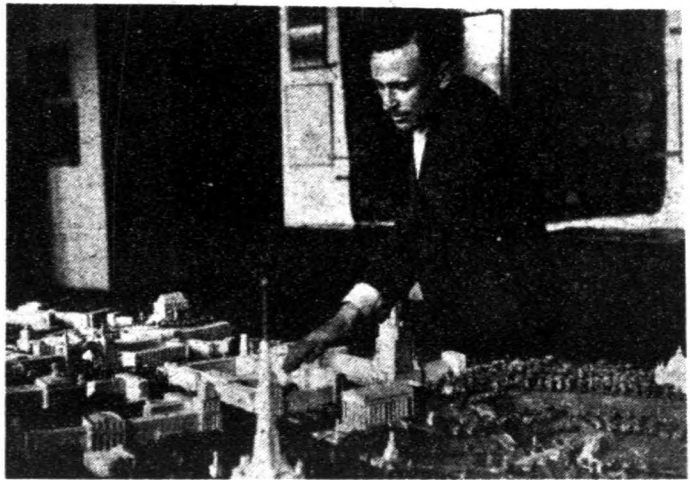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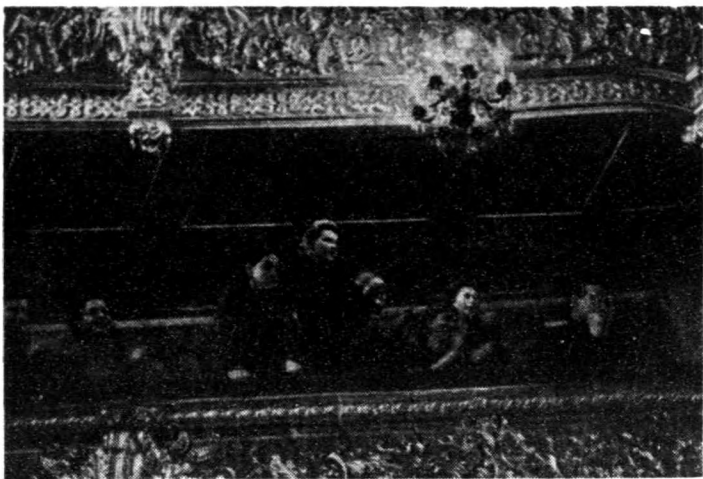
『後來我們到紅場去，那兒至少有一列四分之一哩長的人羣站着等在那兒去晉謁列寧的墳墓。整個下午，幾乎每一天下午，一長列人慢慢地穿過坟墓，去看玻璃棺材裏列寧的面孔；成千的人，他們經過玻璃棺材，向列寧的高額頭、尖鼻子、和翹下巴望一會兒。』



『街上有一個女警察在指揮交通，她穿着長靴，一條藍色的褲子，一件白制服，腰間束着一條軍人的皮帶，頭上戴着一頂扁平的小帽子，她的指揮棍漆成黑白兩色，她用一種軍人那樣迅速的行動指揮交通。她長得非常漂亮。』



「我們經過破破殘殘的市中心，經過那個德國虐待狂者在戰後被吊死的街角。博物館裏陳列着新城市的計劃。這兒有一座用白色塑料製成的新城市模型。一座將用白色大理石修築的宏偉富麗的城市，線條典雅，建築物龐大，有圓形的廊柱，圓形的屋頂，拱門，和雄偉的紀念塔，這一切都將用大理石來修築。」



「歌舞劇已開始上演了，我們幾乎每天晚上都去看，是我們生平所見最可愛的歌舞劇。場面非常偉大。一家商營戲院無法支持這樣的歌舞劇。這樣的表演、訓練、佈景、和音樂，必須要有政府補助，否則就不能存在。像這樣的演出是無法以售票來開銷的。」



「適合結婚年齡的青年人是這樣的少年青的小伙子，但應該在那兒和那些姑娘們跳舞的男子却已經戰死了。」（大多數的家裏都掛着聖像和戰死的家屬遺像）



「底弗里
斯有許多教堂
，它在過去和
現在都一定是
一個在宗教上
很寬容的城市
，因為那兒有
古老的猶太教
堂和回教寺院
，而它們從來
不曾遭到過破
壞。」



「午餐以後，我們去到河邊，租了一艘小汽艇，在基輔的懸崖底下巡遊了一會兒，然後駛向對河平淺的沙灘。沙灘上有成千成百的人在那兒洗澡和躺在太陽底下。有些人帶着全家大小穿着花花綠綠的游泳衣躺在白色的沙灘上曬太陽。河上有許多小帆船在折來折去地行駛。也有滿載着人的遊艇。我們脫掉衣服，跳出船邊，穿着短褲和背心在汽船四週游泳。河水很暖，令人愉快。那天是星期天，大家都非常高興。懸崖上的花園裏和城裏都有人羣擁來擁去。樂隊在懸崖頂上的音樂台裏演奏着樂曲。許多青年男女成雙成對地挽着手臂在河邊散步。」

第一章

我必須首先說一說這個故事和這次旅程是如何開始的，以及這次旅程的目的。去年三月間，我（這個代名詞是和約翰·根室特別商量了以後才用的）正坐在紐約東十四街貝德福旅館的酒吧間裏。一個我已改寫了四次的劇本再也寫不下去了。我坐在酒吧間的椅子上正在想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在那當兒，羅拔脫·卡柏帶着一種鬱鬱不歡的神色走進酒吧間來。這幾個月來，他早就說要跟我打一場撲克，我們便打了一場。他的書已經付印，他發覺自己無聊得很。酒保衛黎老是一個很知趣的人，他建議給我們調一杯蘇茜斯酒，而衛黎是世界上調配蘇茜斯酒的第一等好手。我們很沮喪，並不是沮喪新聞，而是沮喪新聞的處理方法。因為新聞已不再成爲新聞了，至少最引人注意的那一部份新聞已不再成爲新聞了。新聞已變成了詭辯家的事情。一個坐在華盛頓或紐約寫字間裏的人閱讀各地來的電報，把那些電報按照他自己的思想和路線改編。我們現在拿來當作新聞讀的東西，常常根本不是新聞，而是半打製造

2 新聞的詭辯家之一的意見而已。

衛黎把兩杯淺綠色的蘇茜斯酒放在我們面前，我們便開始討論世界上究竟還有什麼事情可以讓一個忠實的自由主義者去做。每天的報紙上講蘇聯的文字有幾千字之多。史達林心裏所想的事情，蘇聯參謀本部的計劃，原子武器和無人飛彈的實驗，這一切都是那些不會到過蘇聯的人寫的，他們的消息來源不無可疑之處。我們覺得某些關於蘇聯的事情從來不會有人寫過，而那些事情正是我們大家最感興趣的事情。那兒的人穿些什麼衣服？他們的餐桌上放些什麼東西？他們也有宴會嗎？那兒有些什麼食物？他們如何戀愛，如何死？他們談些什麼事？他們可也跳舞、唱歌、和遊嬉嗎？孩子們不上學？我們覺得找出這些事情的真相，把它們攝成照片，寫成文章，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俄國的政治正如美國的政治同樣的重要，但正像在我們美國這兒一樣，除政治以外，那兒一定還有許多其它的事情。那兒一定有俄國人民的私生活，而我們却讀不到那方面的事情，因為沒有人寫那方面的文章，也沒有人拍攝那方面的照片。

衛黎又給我們調了一杯蘇茜斯酒，他同意我們的看法，認為他或許也會對這種事情感到興趣。於是我們就決定試一試——做一件以照片為佐證的樸實的報導工作。我們將共同工作

。我們將避免政治和較大的問題。我們將不談克里姆林，不談軍人，不談軍事計劃。假如可能的話，我們要去接觸俄國人民。當時我們還不知道究竟我們能不能辦得到，當我們與我們的朋友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們簡直確定我們是辦不到的。

我們的計劃是這樣：假如我們辦得到，那就很好，而且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故事，假如我們行不通，我們也可以得到一個故事，一個我們怎樣行不通的故事。抱定這樣的宗旨，我們便到先驅論壇報去拜訪喬琪·考尼希，同他吃了一次飯，把我們的計劃告訴他。他同意這件事情很值得一幹，答應無論如何要幫我們的忙。

我們一同決定了幾件事情：我們決不帶着謠言一同去，我們當嘗試保持既不遇事挑剔也不存着偏愛的態度。我們將嘗試作忠實的報道，把我們所見所聞的事情不加評論地記述下來，對於那些我們知道得不充分的事情不作結論，並且決不因例行公事的拖延而動怒。我們知道那兒將有許多我們無法懂得的事情，有許多我們所不喜歡的事情，有許多使我們不舒服的事情。到一個外國去總是這樣的。但我們決定，假如那兒有應該加以批評的事情的話，則我們就應該在看了事情以後再批評，而不是在沒有看到事情以前就批評。

3
我們的護照申請書按時送到莫斯科去，在一個合理的時間以內，我的護照寄回來了。我

到紐約蘇聯領事館去，那位總領事說，「我們同意這是一件值得一做的好事，但你爲什麼要帶一個攝影師去呢？我們蘇聯的攝影師多得很。」

我就答道，「但你們沒有卡柏。假如這件事情可以做，便得整個地讓我們合作去做。」蘇聯有點不願意讓一個攝影師入境，對於我的入境則毫無不願意，而這一點在我們看來是很奇怪的，因爲檢查制度可以控制膠片，但却無法控制一個觀察者的頭腦。說到這裏，我們必須解釋一件在我們的全部旅程中證實的事情。攝影機是現代武器中最可怕的武器之一，尤其是對那些曾經遭受過戰爭，曾經被炸彈炸過和炮彈轟過的人民爲然，因爲在每一次轟炸行列的幕後，總是有着一張照片的。在炸毀的鄉鎮、城市、和工廠的幕後，有着空中鳥瞰地圖或間諜地圖，而那些地圖多半是用攝影機拍攝的。所以攝影機是一種被人恐懼的工具，而一個帶着一架攝影機的人不論到那兒都會遭到懷疑和注意。假如你不相信這句話，請你帶着你那架四號白朗甯到奧克立琪（美國原子中心——譯者）附近，或巴拿馬運河附近，或我們一個實驗區的任何一個附近去嘗試一下。在大多數人的頭腦裏，攝影機現在已成了毀滅的先驅者，它之受到猜疑是理所當然的。

我並不以爲卡柏和我真的相信我們可以做我們所想做的工作。我們竟然能夠辦到，對我

們和對任何人都是一件出於意料之外的事情，當那個消息傳來的時候，我們在酒吧間裏與衛黎舉行了一次小小的慶祝。正在那個時候，我遭遇了一件意外事故，折斷了一條腿，躺了兩個月。但卡柏仍繼續聚集他的配備。

一們美國人到蘇聯各地去大量攝影，已有許多年不會有過了，所以卡柏裝備了最好的攝影工具，並且每種都帶雙份，以備遺失時仍不會感到缺乏。他當然帶去了他在戰時使用的『康坦克斯』和『綠萊弗爾克斯』，但他又特別多帶了幾架。他帶了這麼多額外的攝影機，這麼多的膠片，這麼多的鎂光泡，以致他向航空公司付了三百美金左右的過重行李費。

當大家知道我們快要到蘇聯去的時候，忠告、勸阻、和警告便夾頭夾腦地扔到我們的身上，而這兒必須聲明，那些忠告、勸阻、或警告大多是從來沒有到過那兒的人提出來的。

一位老太太用驚惶的語氣對我們說，『噢，你們會失蹤的呀，你們一越過邊境就會失蹤的呀！』

爲了作正確的報導，我們答道，『你可有那一個認識的人失蹤嗎？』

『沒有，』她說，『我和他們並不相識，但失蹤的人多得很多。』

我們就說，『那或許是非常確實的，我們却不知道，但你能夠舉出一個失蹤的人的名字

來嗎？你可認識那個人認識一個失蹤的人嗎？」

她答道，「千千百百個人失蹤了。」

一個有一對無事不曉的眉毛和一張萬般都懂的臉孔的人，也就是那個兩年前在斯篤克俱樂部裏預測到進攻諾曼第全面計劃的人，對我們說，「嗯，你們必須說克里姆林的好話，不然他們就不讓你們進去。他們一定收買了你們。」

我們說，「不，據我所知，並不如此。他們並沒有收買我們。我們只是喜歡去做一種報導的工作而已。」

他抬起眉毛睨視我們。他相信他所相信的事情，他相信那個在兩年前知道艾森豪威爾的頭腦的人，現在也知道史達林的頭腦。

一位年老的紳士向我們點着頭說，「他們會拷打你們的，他們就喜歡幹那一套；他們會把你們關進黑黯黯的監牢裏，然後拷打你們。他們會扭轉你們的手臂，讓你們挨餓，直到你們願意說他們要你們說的話為止。」

我們問道，「爲什麼？那是爲什麼？爲了什麼目的呢？」

「他們對每一個人都是那樣的，」他說。「姆，我最近讀到一本書——」

一個相當重要的商人對我們說，『到莫斯科去嗎，嘿？帶幾顆炸彈去，把那些赤色鬼兒子炸他媽的一下。』

我們被忠告悶死了。人們告訴我們應該帶着食物去，不然就會挨餓；告訴我們那幾條交通線是通暢的；告訴我們如何可以把我們的情報祕密地帶出來。世界上最難使人相信的事情就是，我們所要做的工作只是報導俄國人的樣子、他們所穿的衣服、他們的行爲、農民談話的題目、以及他們在怎樣重新建設國內被破壞的部份。這是世界上最難說得明白的事情了。我們發覺千千萬萬的美國人患着一種嚴重的莫斯科恐懼症——他們相信任何荒謬的事情；不肯承認任何事實。後來我們發覺俄國人也患着同樣的毛病——華盛頓恐懼症。我們發覺正如我們在給俄國人頭上長角、屁股上長尾巴一樣，俄國人也在給我們長角長尾巴。

一輛出租汽車的汽車夫說，『那些俄國佬，他們混在一起洗澡，男女不分，脫得一絲不掛地。』

『他們是那樣的嗎？』

『當然啦，』他說。『那是不道德的。』

7
再問下去，原來是他會讀過一篇記載芬蘭蒸氣浴的文章。但他却把那一份不高興的事掛

在俄國人的帳上了。

聽了這種種的消息以後，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約翰·曼特維爾爵士的世界決沒有消逝，雙頭人和飛蛇的世界還不會消逝。的確，當我們離開的時候，「飛盤」出現了，而它的出現毫未推翻我們的主題。我們覺得世界上現在最危險的趨勢，是人們願意相信謠言而不願意去調查事實。

我們帶着世界上最集中配備起來的謠言到蘇聯去。在這本書裏，我們堅持一件事情：假如我們記下一則謠言，我們就指明它是一則謠言。

我們在貝德福酒吧間裏與衛黎喝了一杯最後的蘇茜斯酒。衛黎已成了整天參與我們計劃的合作者，這當兒，他的蘇茜斯酒也愈調愈妙了。他給我們忠告，其中有些是我們所得到的最好的忠告。衛黎很高興跟我們一起去。假如他去了，那或許倒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給我們調了一杯上好的蘇茜斯酒，他自己也喝了一杯，於是我們終於準備起程了。

衛黎說，「出了酒吧間以後，你們得多聽話少開口。」

在此後的幾個月內，我們常常想到衛黎和他的蘇茜斯酒。

這次旅程便是這樣開始的。卡柏約摸帶回來四千張底片，我帶回來幾百頁筆記。我們會

考慮如何記述這次旅程，經過許多討論以後，決定採取平鋪直敘的辦法，按逐日、逐項經驗、逐項見聞地記載，不加以分門別類。我們將把我們所看到和聽到的逐項記載下來。我知道這在大體上是違反現代新聞原則的，但正是爲了那個理由，它或許也是一種換口味的辦法。

這就是我們的經歷。它不是俄國的故事，而僅僅是「一個」俄國故事。

第二章

我們在斯篤霍姆拍電報給先驅論壇報駐莫斯科辦事處的主任約瑟夫·紐曼，告訴我們預計何時可到，然後就放心地以爲他會駛一輛汽車來迎接我們，預定一個旅館房間來招待我們。我們的路線是從斯篤霍姆經赫爾新基（芬京——譯者）、列甯格勒，到莫斯科。我們得在赫爾新基轉搭蘇聯飛機，因爲外國飛機都不能飛入蘇聯境內。精光雪亮、纖塵不染的瑞典飛機載着我們越過波羅的海，直達芬蘭灣的赫爾新基。一位非常漂亮的瑞典女侍應生給我們吃非常好吃的瑞典小吃。

經過一次順利舒服的短途旅行以後，我們在赫爾新基新築成的機場上降落。那兒的建築物是最近才完成的，非常宏偉。而那兒，在酒館裏，我們坐下來等待俄國飛機的到達。約摸兩小時以後，俄國飛機來了，是一架陳舊的C——四七，飛得非常低。它那棕色的戰時油漆依舊還在身上。它擊着地面，它的尾輪爆破了，於是它就帶着一隻洩了氣的扁平的尾輪像一

隻蚱蜢似的在跑道上跳過來。這是我們在旅程中所見的唯一意外事件，但是，正巧在這個時候看見這件事情，它的確很難增加我們的信心。它那斑駁的棕色油漆和它那不修邊幅的外形與光彩耀日的芬蘭飛機和瑞典飛機一比較，實在顯得並不太妙。

它在跑道上跳了又跳，從它的肚子裏，吐出一羣剛從蘇聯的拍賣市場裏購買皮貨回來的美國人。那是沮喪和靜寂的一羣，他們聲稱從莫斯科飛來的全程中，飛機從未離地一百米以上。一個俄國機師爬下來，踢了一踢那隻偏平的尾輪，然後向機場的盡頭間盪過去。不久，我們便知道那天下午不能起飛了。我們得到赫爾新基去過夜。

卡柏整頓他的十件行李，像一隻母鷄似的繞着它們咯咯地亂叫。他眼看着它們送進一間上鎖的房間裏。他再三警告飛機場上的職員，叫他們必須好好地看守那些行李。在他離開的期間，他從未高興過一個時候，卡柏平常是一個很輕鬆的樂天者，但碰到與他的攝影機有關的時候，他就變成了一個暴君和憂天者了。

赫爾新基在我們看來似乎是一個鬱鬱少歡的城市，轟炸得並不厲害，但相當荒涼。它的旅館陰氣沉沉，它的酒館靜寂無聲，它的廣場上有一個演奏着並不愉快的音樂的樂隊。街上的士兵似乎像小孩子，這樣的年青、蒼白、和鄉巴佬氣。我們所得的印象是一個貧血的地方

，一個很少歡樂的地方。經過了兩次戰爭和六年苦戰以後，赫爾新基似乎已不能再有生命了。經濟情形究竟是否如此，我們無法知道，但它給人的印象是如此。

我們在城裏碰到安特華德和希爾，他們是先驅論壇報正在所謂鐵幕後面的國家作社會經濟研究的人員。他們合住在一家旅館的一個房間裏，房間裏堆滿了報告書、小冊子、調查表、和照片，他們還剩下一瓶蘇格蘭威士忌酒，那是他們儲貯着準備作一種意想不到的慶祝用的。我們成了那種意想不到的慶祝，而那瓶威士忌並不十分經喝。卡柏發了一些自尋煩惱和無益的怪想，我們便上牀睡了。

早晨十點鐘，我們又在飛機場上了。那架俄國飛機的尾輪已換過，但第二號引擎依舊還得修理一下。

在此後的兩個月內，我們乘着俄國運輸機飛行了很多地方，那些飛機大都差不多，所以這架飛機可以當作它們的代表來描寫。它們都是C——四七，身上帶着棕色的戰時油漆，是租借物資的存貨。飛機場上有較新的運飛機，一種有三輪降落器的俄國C——四七，但我們所乘的却不是那一種。那些C——四七已經有點陳舊了，窗簾地氈都已不見，但它們的引擎仍完整，駕駛員似乎非常好。機上的工作人員比美國飛機上的多，但因為我們不曾到控制室

裏去過，所以我們不知道他們究竟做些什麼工作。控制室的門開時，裏面似乎經常有六七個人，其中有一個是女侍應生。我們也不知道那個女侍應生究竟是做些什麼的。她似乎與乘客毫無關係。飛機上不供給乘客食物，但乘客們自己攜帶大量食物，補充了這個缺點。

在我們歷次所乘的飛機裏，通氣孔千遍一律都是失効的，所以沒有清新的微風吹進機內來。假如食物的氣味或偶爾有人嘔吐的氣味充滿了飛機，根本就沒有辦法了。我們聽說這些陳舊的美國飛機要一直使用下去，直到它們被較新的俄國飛機代替時為止。

航空習慣與我們美國人所遵守的似乎也有一點不同。飛機裏沒有保險帶。飛機在飛行途中是禁止吸煙的，但一旦飛機着陸，人們便可以燃點香煙了。夜間飛行是沒有的，假如你的飛機在日落以前不能到目的地，它便中途停下來，等到第二天早晨再起飛。除了遇到風暴以外，俄國飛機比我國的飛機飛得低得多。而這是比較安全的，因為俄國大部份地方都很平坦，一架飛機幾乎到處都可以找到強迫降落的場地。

俄國飛機的裝載方法在我們看來似乎也很特別，乘客就座以後，行李就推在甬道裏。

我覺得這第一天使我們最擔心的是那架飛機的外貌。它看上去是這樣一個週身有創痕的令人難以起敬的怪物。但它的引擎極靈巧，而它又飛得那樣的平穩，所以我們並沒有真正可

担心的事情。我想我們的飛機雖然外表光彩耀目，但却也不見得能作更好的飛行。我以前認識一個人，他的太太聲稱他們的汽車在擦洗過一次以後，便可以駛得更快更穩，我們對於許多東西大概都有那樣的感覺。一架飛機的第一要件是它要能夠飛到空中，而且能夠飛到它所要到的地方。在這一點上，俄國人似乎並不亞於任何人。

赴莫斯科的乘客並不多。一個冰島的好外交家帶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一個法國大使館的專差帶着他的外交文袋，還有四個沉默的、從未開口的、不明身份的人。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

卡柏現在可無計可施了，因為卡柏什麼語言都能說，就只會說俄語。他講每一種語言都帶另一種語言的口音。他用一個匈牙利人的口音講西班牙語，用一個西班牙人的口音講法語，用一個法國人的口音講德語，從一個永遠無法證明國籍的人的口音講英語。但他從來不曾講過俄語。一個月以後，他學會了幾句俄國話，說起來帶着一種烏茲貝克人的口音。

十一點正，我們起飛，飛向列甯格勒。一旦到了空中，長期戰爭的創傷便明顯地擺在地面上——戰壕、翻起的泥土，以及現在已開始長滿了青草的砲彈穴。我們愈接近列甯格勒，創傷便愈深，戰壕更常見。焚毀的農舍帶着它那聳立的焦黑的危牆點綴着風景。某些發生

過劇戰的區域，其地面凹凸得像月球的表面一樣。列甯格勒附近是破壞最劇的地方。一眼就可以看見許多戰壕、堡壘、和機關槍窠。

途中，我們很爲通過列甯格勒的海關檢查担心。帶着那十三件行李、幾千隻鎂光泡、幾百捲膠片、大量的攝影機、和成捲的鎂光線，我們以爲或許要幾天才能檢查完畢。我們並且以爲這種新配備得付出大量的進口稅。

我們終於飛臨列甯格勒上空了。郊外已粉碎，但城市的中心區域似乎並未受到多大的損傷。飛機輕輕地降落到機場的青草地上，開入飛機的行列裏。機場上除了管理處以外，再無其它的建築物。兩個年青的士兵帶着刺刀雪亮的大來福槍站在我們的飛機附近。然後關員上來了。帶頭的關員是一個臉帶微笑、很有禮貌的小個子，笑時露出一排閃閃發光的鋼齒。他知道一個英國字——『Yes。』而我們知道一個俄國字——『Da。』所以當他說Yes的時候，我們就回答一聲Da，所以說來說去仍和最初開口的時候一樣。我們的護照和錢拿出來檢查了一遍，然後就是我們的行李問題了。行李得在飛機的甬道上打開。它是不能拿出去的，那個關員非常有禮貌、非常客氣、也非常徹底。我們打開每一隻行李袋，他就檢查每一樣東西。但是，當他在繼續檢查的時候，我們看出他並不是在尋找什麼特別的東西，而只是感

到興趣而已。他翻弄我們那些閃閃發光的配備，珍愛地用手指撫摸它。他拿出每一捲膠片，但他並沒有拆開它，也沒有提出問題。他僅似乎對外國東西感到興趣而已。而他似乎也幾乎有無限的時間。最後，他謝謝我們，至少是我們以為他在謝謝我們。

現在出來一個新問題了，就是在我們的證件上蓋章的問題。他從他的制服口袋裏摸出一小包用新聞紙包着的東西，從那裏面拿出一隻橡皮圖章。但他所有的僅止於此了，他並沒有帶一隻印盒。但他顯然從來不會有過印盒，因為他的技術是小心地設計好了的。從他制服的另一隻口袋裏，他摸出一支鉛筆；然後，先舐了一舐橡皮圖章，他就用鉛筆在橡皮上擦，在我們的證明文件上嘗試蓋印。絕對毫無痕跡。他又試了一次。還是沒有痕跡。那顆橡皮圖章甚至連影子都不會打出一個。爲了幫助他，我們摸出我們可以漏水的自來水筆，用我們的手指漬墨水，把墨水塗在他的橡皮圖章上。於是他終於蓋出了一個美麗的印。他把他的圖章包在那張新聞紙裏，把它藏回到他的口袋裏，親熱地與我們握一握手，然後就爬出到飛機外面去了。我們重新打好我們的行李，把它堆到一隻空座上。

現在一輛貨車打倒車退到飛機打開着的門口來了，那輛貨車裏載着一百五十架裝在木箱裏的新顯微鏡。一個女卸貨工人走上機來——是我生平所見最強壯的姑娘，瘦而有勁，有一

張波羅的海人的闊大的臉孔。她把那笨重的一捆捆的東西擗到駕駛室裏。當那個房間堆滿以後，她就顯微鏡堆在甬道裏。她穿着帆布鞋，一件藍色的上衣，手臂上綳起肌肉。她也像那關員一樣，有閃閃發光的，純潔無瑕的鋼齒，那一口鋼齒使人的嘴巴看來像機器的一份一樣。

我想我們曾預料會發生不愉快的事情的；一切海關總是令人不愉快的，因為海關是一種侵害個人隱私的機構。或許我們已把那些從未到過這兒的忠告者的話相信了一半，預期多少會受到一些侮辱或恐嚇。但那種事情並沒有發生。

那架裝了行李的飛機終於又昇到空中，飛越那無窮盡的平原、一片森林、整齊的農場、小小的白木村舍、和明亮的黃色的麥桿堆向莫斯科前進。飛機始終飛得很低，直到一片雲壓下來，以致我們不得不飛到雲層上面去。雨開始傾注到我們的機翼上。

我們的那位女侍應生是身材高大、白臉金髮、胸部豐滿、和母親型的姑娘，她的唯一責任似乎是拿幾瓶粉紅色蘇打水越過顯微鏡堆去給駕駛室裏的人。有一次，她拿了一隻黑麵包去給他們。

27
我們開始感到餓了，因為我們不會吃早餐，而飛機裏面似乎又沒有再吃東西的可能性。

假如我們能說話，我們或許會向她乞討一片麵包吃。可是我們甚至那一點都做不到。

經過四個鐘頭以後，我們從帶雨的雲層裏竄下來，而就在我們的左邊，我們看見了向四面散開的、龐大的莫斯科城，中間貫穿着莫斯科河。飛機場本身就非常大。其中一部份是鋪了水泥的跑道，一部份是長着青草的長跑道。停在那兒的飛機確實有幾百架之多，有些是陳舊的C——四七，也有許多是裝着三輪降落器的、發光的鋁質外殼的新式蘇聯飛機。

當我們駛向那座赫赫然的機場新大廈的時候，我們從窗口向外望，想找一張我們所熟悉的臉孔，因為一定有人在那兒等候我們的。天在下雨。我們走出飛機，淋着雨集攏我們的行李，而一大片孤獨籠罩到我們身上。沒有一個人來迎接我們，沒有一張熟悉的臉孔。我們無法問一句話，我們沒有俄國錢。我們不知道到那兒去。

我們曾從赫爾新基拍電報給喬意·紐曼，說我們將遲一天到達。而機場上沒有喬意·紐曼。機場上沒有一個人找我們。一個非常強壯的腳夫把我們的行李搬到機場門口，等待我們付錢給他，而我們沒有辦法付給他。公共汽車時有經過，我們知道我們甚至連它們的終點站都讀不懂，而且，車子裏的人是這樣的擁擠，車子外面也掛着人，我們和我們的那十三件行李是決不可能擠進去的。而那腳夫，那個非常強壯的腳夫正等待着付錢。我們又餓、又濕、

又慌，我們覺得完全被人遺棄了。

正在那個時候，法國大使館的專差帶着他的外交文袋出來了，他借錢給我們付給那個腳夫，他把我們的行李放進來迎接他的那輛汽車裏。他是一個頂括括的好人。他在我們快將自殺的時候救了我們。假如他有機會看到本書，我們要在這兒再謝謝他。他載我們到京都旅館，據猜測，喬意·紐曼大概是住在那兒的。

我不懂飛機場與它們所服務的城市爲什麼要離得這樣的遠，但它們總是這樣的，莫斯科也不是例外。從飛機場到城裏，那條路一哩又一哩的走不完，那條路穿過松林、穿過農場、穿過無窮盡的洋芋田和椰菓田。路面有時粗糙，有時光滑。那位法國專差把一切都預料到了。他叫他的汽車夫去買了一些吃的東西，所以在赴莫斯科的路上，我們吃到了小肉丸和火腿。當我們到達京都旅館的時候，我們覺得已經好得多了。

京都旅館是一家相當宏偉的旅館，有大理石的樓梯、紅色的地氈、和一架有時也開動的大鍍銅電梯。那兒的辦公桌後面有一個會說英語的女人。我們詢問給我們預定的房間，而她從來不曾聽說過我們的名字。我們沒有房間。

在那個關頭，芝加哥太陽報的亞力山大·金特烈克和他的太太來救我們了。我們就問，

喬意·紐曼究竟到那兒去了？

『噢，喬意嗎！他有一個星期不在這兒啦。他現在列甯格勒，去看皮貨拍賣去了。』

他沒有接到我們的電報，什麼都沒有準備，我們沒有房間住了。而不經事先準備要想住房間，是絕對辦不到的。我們本料定喬意會與負責的俄國機關接洽的。但既然他並沒有去接洽，沒有接到電報，俄國人自然不知道我們要來。但金特烈克夫婦帶我們到他們的房間裏去，給我們吃燻沙爾蒙魚和伏特加，使我們感覺到受了歡迎。

過了一會兒，我不再感覺孤獨和遭遺棄了。我們決定住到喬意·紐曼的房間裏去，藉此懲罰他一下。我們用他的毛巾肥皂和大便紙。我們喝了他的威士忌。我們睡在他的長榻和床上。我們認為那是他為我們盡力，償付我們所受的痛苦的最低限度的招待了。我們說，他雖然不知道我們要來，但那却不是寬恕他的理由，他是該受懲罰的。所以我們就喝掉了他那兩瓶蘇格蘭威士忌。這兒必須承認，我們當時還不知道這是怎樣的一種罪過。美國駐莫斯科的記者羣中確有很多不老實和調皮的行爲，但却還不會到我們所做的那種程度。一個人是不喝另一個人的威士忌的。

第三章

我們還不知道我們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地位。我們實在不十分清楚我們究竟是怎樣到那兒去的，是誰邀請我們的。但莫斯科的美國記者們聚攏來，幫助我們，與我們握手——傑爾摩亞，斯蒂芬，金特烈克，還有其餘的那些人，他們都是富於同情心的好人。他們帶我們到京都旅館的營業餐室去用膳。我們發覺莫斯科有兩種餐室：一種是配給餐室，那兒你得拿着你的口糧配給票去吃，價格很便宜；一種是營業餐室，那兒，同樣的食物却得付出極高的價格。

京都旅館的營業餐室富麗堂皇得很。房間中央有一座很大的噴水池。天花板約有三層樓那樣高。有一個舞池和一塊高起的地方供樂隊使用。俄國軍官帶着他們的太太，還有上層收入階級的平民，極有禮貌地圍繞着噴水池跳舞。

樂隊偶或也演奏美國的爵士舞曲，而那是我生平所聽到的最響和最壞的爵士音樂。那位

鼓手顯然是師宗克魯伯的，但他的藝技和他的老師相差極遠，他極其熱情，像魔術師似地把他的棍子在空中揮舞。玩豎笛的那位樂師曾聽過貝尼·高特曼的留聲機片，所以我們偶爾可以聽到一些略似高特曼的三重奏。有一位鋼琴師是喜歡彈奏滑音的，彈得很技巧，而且彈得非常熱心。

全餐包括四百克伏特加、一大碗魚子醬、椰菜湯、牛排併煎洋芋、牛油、和兩瓶葡萄酒。五個人喫，按大使館每元美金折合十二盧布的匯率計算，約摸化了一百十元美金。那頓晚餐約摸化了兩個半鐘頭才吃完，這使我們小小地吃了一驚，但後來我們發覺那是俄國餐室千遍一律的現象。我們並且找出了爲什麼菜來得那樣慢的原因。

由於蘇聯的一切都歸國家所有，每一筆交易都歸國家所批准的獨佔企業進行，所以會計制度極其繁複。侍者接到一張菜單的時候，便非常小心地把它抄在了一本簿子裏。但抄好以後，他並不去要菜。他到會計員那兒，會計員把顧客所要的菜又登記一遍，發一張條子給廚房。廚房裏把所要的菜又記一次賬。當那份菜終於燒好了的時候，便發一張送菜單給侍者。但侍者並不把菜帶回到桌子上來。他拿了那張條子到會計員那兒，會計員又記一筆賬，載明所定的那一份菜業已發出，又開一張條子給侍者，侍者於是回到廚房，把那份菜帶回到桌子上

，並在他的簞子裏註明顧客所要的那份菜已經入帳、已經燒好，現在，終於已經放到桌子上。這種會計制度要化很多的时间。實際上，比燒菜的時間更多得多。但等菜發脾氣是沒有好處的，因為世界上不論什麼都對它沒有辦法。那種手續是不能改變的。

這當兒，樂隊高聲奏出『滾出桶來』和『我已懷春』那兩支曲子，一個次中音歌手走到擴音機前，但他實在是不需要擴音機的，因為他的聲音已足夠充滿房間。他唱出『老人河』和幾首美國人所喜歡唱的歌，如『梅傑克老黑人』和『我已懷春』等曲，是用俄語唱的。

當我們在等菜的時候，駐莫斯科的美國記者們便以識途老馬的資格告訴我們可能會遭遇到怎樣的情形和應該怎樣應付。有他們來告訴我們這些事情，實在是非常幸運的。他們指出，我們最好不要被托付給外交部照顧。他們着重地指出那些被托付給外交部照顧的人所應守的規則。其中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一條是不能離開莫斯科區。而我們不要住在莫斯科。我們要到鄉下去，看農村裏的人究竟如何生活。

拍發電訊或打長途電話要受檢查局管制的，我們既然不想拍電報或打長途電話，所以我們覺得大概可以避免受外交部的照顧。但我們還不知道究竟誰來照顧我們。大概不是蘇聯作家協會便是蘇聯對外文化關係協會（Cultural relation organiz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簡稱 Voks 文協)。我們很想把我們自己看作是一種文化關係。我們事先已決定我們所需要的消息是非政治性的，除非是地方性的政治或直接影響人民日常生活的政治。

第二天早晨，我們打電話給旅行社。旅行社是照顧外國人的機構。而我們發覺，僅以旅行社而論，我們是沒有地位的，我們是並不存在的，因而也沒有房間可以住。於是我們就打電話給文協。文協說，他們知道我們要來，但却想不到我們已經到了。他們可以給我們設法弄房間。那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莫斯科所有的旅館都是經常客滿的。於是我們就出去到街上閒盪。

我曾在一九三六年的時候來過幾天，其間的變化極大。第一，城市已比那時清潔得多了。街道打掃得很乾淨，並且舖上了柏油，而以前的街道是泥濘污穢的。十一年間新添的建築物很多。幾百幢高聳的新大廈，莫斯科河上添了幾座新橋樑，街道拓闊了，到處都是雕刻像。舊莫斯科好幾區狹窄污穢的街道整個兒失蹤了，在它的舊址上，現在出現着新的住宅區和新的公共建築物。

偶爾可以看到一些受轟炸的痕跡，但並不太多。德國飛機襲擊莫斯科顯然毫未成功。某些戰爭期間留在莫斯科的記者告訴我們說，高射砲防禦是這樣的有効，戰鬥機是這樣的衆多。

，以致德國人在經過幾次遭受重大損失的試驗以後，便多少已放棄空襲莫斯科的企圖。但有少數幾顆炸彈還是進來了：一顆投中克里姆林宮，幾顆投在郊外。但在那個時候，德國空軍已在狂炸倫敦，不願意再犧牲大量的飛機去轟炸一個設防嚴密的都市。

我們也注意到正在粉飾城市面目的工作。每座大廈的前面都搭着竹架，正在粉飾牆頭和修補破損的地方，因為在幾星期之內，莫斯科便將恭逢它的築城八百週年紀念日了，那一天將舉行大規模的儀式從事慶祝。而不到幾個月，又適逢是十月革命的三十週年紀念。

電氣匠正在公共建築物、克里姆林、和橋樑上裝置綠光燈。這種工作甚至夜晚也不停止——整夜燈火輝煌地繼續工作，粉飾裝修城市，準備作許多年來第一次非戰爭時期的慶祝。

但雖然這樣忙碌地準備，街上的人似乎很疲倦。女人極少打扮，或根本不打扮，衣服很過得去，但並不十分漂亮。街上的男人有很多穿着軍服，但他們已不在軍隊裏。他們已復員，而他們的軍服是他們唯一所有的衣服。軍服上不佩符號或肩章。

卡柏並沒有帶着他的攝影機出來，因為其他記者已告訴過，他假如沒有書面的許可書，這可不是一件官方願意你做的事情，尤其是一個外國人。第一個警察便會抓住你，帶你去問話，除非你有正式的書面許可證。

我們又開始感覺到孤獨了。決不是因為我們已遭到監視或釘槍，而是因為我們簡直找不到一個人可以承認我們已到了那兒。我們知道莫斯科的機關是行動得很遲緩的，正如華盛頓的機關一樣。現在，潛伏在旁的房間裏，身邊堆着幾百捲膠片和許多攝影配備，我們開始有些不耐煩了。

我們聽說俄國人有一種極少遭擊敗的棋術。那種棋術玩起來很簡單。政府機關裏你要去見的那個人不在、生病了、在醫院裏、或是去旅行去了。這種事情可以連續幾年。假如你轉移目標去找另外一個人，他也到城外去了，在醫院裏、或出去旅行去了。一個匈牙利代表有一件事情要請求，我想大概是因為當局不高興它，以致已等待了三個月，最初去見這個人，後來去見那一個人，但始終不會見到任何人。有一個想交換學生的美國教授，是一個頗有名望的好人，已在會客室裏坐了幾個星期。他也從未見到過任何人。這種棋術是無法對付的。它是無法抵抗的，除了媽媽虎虎地拖下去。

坐在喬意·紐曼的房間裏，我們覺得這種情形或許也會落到我們的頭上。而且，在打過幾次電話以後，我們又發覺了一件關於俄國官廳的有趣的事情。中午以前是沒有人上辦公廳的，一個人都沒有。辦公廳要到中午才開門。但是，從中午起，辦公廳便繼續開着，人們繼

續工作着，一直繼續到午夜。或許有些機關是不遵守這個公式的，但我們在此後兩個月內跟它們辦交涉的機關却全都遵守這種時間。我們知道我們一定不能不耐煩也不能動怒，因為假如你一動怒，這局棋你便輸定了了。事實證明我們的恐懼是毫無根據的，因為文協第二天便開始行動。他們給我們就在對面街角的薩服伊旅館弄到了一個房間，他們請我們到他們的辦公室去討論我們的計劃。

薩服伊旅館像京都旅館一樣，是劃給外國人住的。住在京都旅館裏的人聲稱薩服伊旅館比較好，那兒的菜和服務都比較好一些。在另一方面，住在薩服伊旅館的人却又聲稱京都旅館的菜和服務比較好。這種相互恭維的把戲已繼續了好幾年。

我們被派定住在薩服伊三樓的一個房間裏。我們登上那座排着彫刻像的大理石樓梯。我們很喜歡其中的一尊格萊齊拉（Graziella）半身像。格萊齊拉是一位與拿破崙同進莫斯科有名的美人。她穿着一套帝國的服飾，戴着一頂很大的帽子，而由於彫刻師的錯誤，她的名字竟不是刻作格萊齊拉而是刻作克萊齊拉（Craziella），於是我們便稱她為瘋伊拉（Crazy Ila）。樓梯頭上站着一隻碩大無朋、身體裏塞着稻草的俄羅斯熊，做出向人撲過來的姿勢。但不知那一個胆小的顧客已剝掉了他前掌上的利爪，所以它只能以無爪之掌撲人。在半月

半暗的樓上大廳裏，它對於薩服伊旅館的新顧客，永遠是使人略吃一驚的來源。

我們的房間很大。我們後來發覺，在那些住在薩服伊旅館其它房間裏的人眼中，它是一個非常值得羨慕的房間。天花板離地二十呎高。牆壁上油漆着一種陰鬱的暗藍色。房間裏的床可以併闊，窗簾可以交叉拉攏。它最好的妙處是有一套黑橡木的長躺椅、鏡子、雙門衣櫃、和一圈環繞在牆壁頂上的壁畫。隨着時間的航進，那圈壁畫進入我們夢境的次數是愈來愈多了。假如它是可以描寫的話，它是這樣的：在那圈壁畫的中央和下端，俯臥着一個兩腿翻在背後的江湖賣藝者。他的面前正有兩隻貓想從他的手裏溜過去。他的背後躺着兩條綠色的鱷魚，鱷魚頭上蹲着一隻背生蝙蝠翅、頭戴皇冕的瘋猴子。這隻猴子有兩條長而強壯的手臂，那兩條手臂穿過他翅膀上的洞眼，抓住兩隻長着魚尾巴的山羊的角。這兩隻山羊都披着胸鎧，胸鎧盡頭有刺，刺上穿着兩條看上去很兇猛的魚。我們看不懂這圈壁畫。我們不知道它的意義，也不知道爲了什麼理由要裝在我們旅館的房間裏。但我們開始夢到它。當然會幾次爲它發生夢魘。

三組很大的雙面窗望向街上。隨着時間的前進，卡柏站在窗口的時間愈來愈多了，把我們窗口下面所發生的小事情攝入鏡頭裏。街對面的三樓上有一個開設着一家類似攝影機修理

理店那樣的舖子。他在攝影機件上化很多的時間。後來我們發現：當我們在拍攝他的時候，他也正在那兒拍攝我們。

在莫斯科有一間專用浴室是一種光榮。我們有一間專用浴室，而它有一些特點。進去很困難，你不能箇簡單地一開門就進去，因為門是被浴缸擋住的。你得側身擠進裏面，蹲在洗臉架旁邊的角落裏，把門關上，然後你才可以自由行動。浴缸的幾隻腳放得不十分平穩，所以一旦裝滿了水，假如你突然轉動，整個浴缸便傾側到一邊，水便瀉出到地板上了。

它是一隻陳舊的浴缸，大概是革命以前的東西了，底上的琺瑯質已磨損，留下一個有一點兒像沙皮紙那樣的表面。卡柏是一個皮肉嬌嫩的人，他發覺洗澡以後竟擦出了血，此後他便穿着短褲背心進浴缸了。

據我們在蘇聯的經驗，這間浴室的特點可以適用於所有其它地方的浴室。蘇聯或許還有與此不同的浴室，但我們却沒有找到。所有放水的龍頭——廁所龍頭，洗臉缸龍頭，浴缸龍頭——雖然都是漏的，但所有的排水孔却都是點水不漏的。因此，假如你一旦在缸子裏注滿水，水就留在那兒了，當你拔掉排水孔的塞頭的時候，它對於水的逃遁毫無影響。在喬其亞的一家旅館裏，水從排水孔逃出去時的吼聲是這樣的響，以致我們必須關上浴室的門才能睡

着。在這件事上，我完成了我最大的發明，我準備把那種發明獻給重工業。方法非常簡單。只要把程序顛倒一下：只要把塞子塞住放水的地方，把放水龍頭裝在排水的地方，問題便全部解決了。

但我們的浴室的確有一項極大的優點。熱水總是很充分的，有的時候，熱水大部份淌在地上，但當我們需要它的時候，它總是有的。

在這件事情上，我在卡柏的脾氣上發現了頗不令人愉快的一點，我覺得應該在這兒記下來，以備將來他要向她求婚的那位小姐參考。他是一頭浴室裏的豬，而且是一頭非常古怪的豬。他的方法是這樣的：他一起床，便溜進浴室裏，放一缸水。然後他躺在那缸水裏看報或看書，直看到沉沉欲睡，至此，他就睡着了。這早晨的一覺可以睡兩個鐘頭或三個鐘頭，而從此可以看出，當他在浴室裏的時候，即使你有任何更嚴重的目的，那間浴室總是不能動用的了。我爲了公共福利而提出這一則關於卡柏的消息。有了兩間浴室，卡柏是一個有趣、聰明、和好脾氣的伴侶。假如只有一間浴室，他是——

我們已經身受到俄國貨幣的綜錯複雜的麻煩。它有幾種價值，有官方的價值和非官方的價值。官方的匯率是一元美金合五個盧布。美國大使館的匯率是一元美金合十二個盧布。但

在黑市場上，你可以用一元美金買到五十個盧布。某些南美國家的外交代表在別的國家如波蘭或捷克買盧布，一元美金可以買到一百盧布。美國大使館因為忠實遵守這十二對一的匯率，所以被某些館員批評為太浪費。譬如說，假如美國大使館裏要舉行一次宴會，按十二對一的匯率計算，那場宴會所費極大，而上面所述的那些大使館裏假如有人宴會，按一百對一的匯率計算，那場宴會就便宜得令人難以相信了。

當我們在薩服伊旅館登記的時候，我們便分發到口糧配給票，每天三張，一張早餐張午餐，一張晚餐。拿了這些票子到旅館的配給餐室裏去吃，價錢便很合理了。假如我們想到營業餐室裏去吃，菜價就非常貴，而菜却並不非常好。啤酒是酸的，非常貴，平均約摸要一塊半美金一瓶。

32

下午，文協派一輛汽車來接我們到總會去談話。據我們的印象，關於誰負責照料我這一點，作家協會與文協之間曾有過爭奪，結果是文協失而復得。文協的辦事處設在一座美麗的小王宮裏，那個地方以前是一位經營商業的親王的私邸。我們被招待到卡拉加諾夫先生的辦公室裏。那間辦公室的橡木護壁板一直裝到天花板，有一扇彩色玻璃的天窗——一個非常愉快的工作地點。卡拉加諾夫先生是一個金髮碧眼、年青謹慎的人，他口操一種正確而緩慢的

英語，坐在他的寫字檯後面向我們問了許多問題。他用一支紅藍鉛筆在一本拍紙簿上信手亂塗。於是我們就解釋我們的計劃，說明我們要避免政治，但却想了解俄國農民、工人、和商人，看他們如何生活、設法把這種事情告訴我們的人民，以便達到某種互相了解。他靜靜地聽着，用他的鉛筆劃着尖角記號。

然後他說道，『以前也曾有人要做這種事情。』於是他舉出幾個曾寫過書報導蘇聯情形的美國人的名字。『他們曾坐在這間辦公室裏。』他說，『口裏說如此如此，但回國以後，寫出來的文章却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假如我們似乎略微有點兒不信任的話，就是爲了這個原因。』

『你不要以爲我們是有什麼偏愛或厭憎的心理來的，』我們答道。『假如可能的話，我們是來做一件報導的工作的。我們準備紀錄和拍攝我們所見所聞的事情，不參雜自己的意見。假如我們看到有我們不喜歡或不懂得的事情，我們也要把它記下來。但我們是來找故事來的。假如我們能夠去得到我們所要的故事，我們便把它記下來。假如我們不能去找，我們還是可以有一個故事。』

他非常緩慢而深思地點點頭。『這是我們可以相信的，』他說。『但有些人到這兒來的

時候強烈地親蘇，回到美國以後却變成猛烈地反蘇，我們實在被這些人弄得非常厭倦了。那種經驗我們已得了不少。

「文協這個機關，」他繼續說，「沒有很大的權力，也沒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我們盡力使你們去做你們所想做的工作。」然後他向我們提出許多關於美國的問題。他說，「你們的許多報紙正在談論對蘇戰爭。你們美國人民真的要對蘇聯作戰嗎？」

「我們並不以為如此，」我們答道，「我們並不以為任何人想要戰爭，但我們並不確實知道。」

他說，「美國唯一大聲在反對戰爭的，顯然只有亨利·華萊士。你們可能告訴我，他的立場究竟如何？他在人民中間是否有真正的擁護者？」

我們說，「我們不知道。但這一點我們確實是知道的，就是：在一次演說旅行中，亨利·華萊士的門票收入，得了一筆空前大量的款子。我們也知道人們出錢去聽政治性的演說，這是聞所未聞的事情。我們的確知道有許多去聽他演講的人又轉回家去，因為會場裏已沒有他們坐或站的地方。我們不知道這種情形對於即將到來的選舉究竟有什麼意義。我們只知道我們自己，我們這些已經嘗到過一點戰爭苦味的人，是不要戰爭的。我們覺得很多很多的人

都是像我們這樣的。我們覺得假如戰爭是我們的領袖所能給我們的唯一答覆，那末我們實在是生活在一個非常貧瘠的時代裏了。」然後我們問道，「俄國人民，或其中的任何部份，或俄國政府的任何部份，可有想要戰爭的嗎？」

聽到這裏，他挺直了身體，放下他的鉛筆，說道，「那個問題我可以確定地答覆。俄國人民，或其中的任何部份，或俄國政府的任何部份，都不要戰爭。我甚至還可以說——俄國人民將盡一切力量避免戰爭。關於這一點，我是可以確定的。」於是他又拿起鉛筆來，在他的拍紙簿上信手亂塗。

「我們來談一談美國文學吧，」他說。「據我們看來，你們的小說家已對什麼都沒有信心了。這是真的嗎？」

「我不知道，」我說。

「你本人最近的作品在我們看來似乎也有嘲世哲學的態度。」

「那不是嘲世，」我答道。「我相信作家的任務之一，是儘可能按他所理解的紀錄下那個時代。而那就是我現在所做的工作。」

於是他就問了一些關於美國作家的問題，問及卡特威爾和富格納，以及海敏威的新書可

以在什麼時候出來。他問有什麼新興的青年作家，有什麼新人。我們解釋說，有幾個青年作家正在開始露頭角，但要想他們作爲成熟的作家，現在未免還太早。過去四年內，本來應該練習寫作的那些青年都入了軍隊。這種經驗多半與他們以前的生活大不相同，他們大概得經過一個時間整理他們的經驗和生活，然後才能坐下來寫作。

他聽說美國的作家不會團結在一起，不會互相取得密切的聯系，似乎略微感到有點驚奇。在蘇聯，作家是非常重要的。史達林曾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我們向他解釋道，美國作家的地位不同，他們被認爲是介於耍猴子的賣藝者和猴子之間的人物。據我們的看法，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們相信一個作家，尤其是一個青年作家，假如太受推崇，就會像一個電影女演員受了影電雜誌的吹捧而一樣地得意忘形。我們認爲從大處着眼，一個美國作家所遭受的苛刻批評，是對她非常有益的。

在我們看來，俄國人與英美人之間最大的區別之一，是他們對政府的感想。俄國人受教導、訓練、和鼓勵去相信他們的政府是好的，相信政府的每一部門都是好的，他們的任務是從各方面擁護政府，支持政府。英美人則相反，他們深深地感覺到一切政府多少都是有點危險的，政府所管的事情愈少愈妙，政府權力的增加總是壞的，現政府必須經常加以監視，監

視並批評得它時時刻刻戰戰兢兢地不敢做壞事。後來，到鄉村裏，當我們和農民圍坐在一起，當他們問我們的政府如何活動的時候，我們便解釋道，我們因為恐懼把權力交給一個人或一羣人，所以我們的政府是根據一套互相牽制的辦法建立起來的，目的是在防止大權落入任何個人手裏。我們解釋道，那些推舉出我們政府的人民是這樣的恐懼權力，以致他們甯願犧牲一個好領袖而不願意造成一個領袖制度的先例。我覺得我們的這一番話不見得能夠被他們澈底了解，因為蘇聯人民所受的訓練是要他們相信領袖是好的，領袖制度也是好的。這個問題一時辯不清楚，因為兩種制度之間的交往太少了。

卡拉加諾夫先生的拍紙簿上已塗滿了紅色和藍色的種種花樣。他最後說，『請你們寫一張條子給我，開列你們所要做和想看的事情，我來看看是否能替你們設法辦到。』

我們非常喜歡卡拉加諾夫。他是一個直言無隱、條理清晰的人。後來我們聽到許多花言巧語的演講和許多概括性的話。但我們從來不曾從卡拉加諾夫的口裏聽到過那種話。我們從未向他掩飾我們的真面目。我們有某種看法，一種美國人的看法，那種看法在他眼中可能認為是含有某些偏見的。但他並沒有因此不喜歡我們，或不信任我們，却反而似乎增加了他對我們的信任。我們留在蘇聯的期間內，他幫了我們很大的忙。我們見過他好幾次，而他對我

們的一個要求是，「報導真相，報導你們所見的東西。不要改變它，照原樣把它記下來，我們就非常高興了。因為我們是不信任恭維的。」我們覺得他似乎是一個誠實的好人。

關於我們旅程的那場無聲的爭執依舊在進行。目前，一個人只能以某個機關的來賓的資格或負有某種特殊的任務才能到蘇聯去。我們還不能確定負責照顧我們的究竟是協會抑或是文協，我們也不能確定他們自己究竟知不知道。可能雙方都在把這種可疑的榮譽推給對方。有一點我們是確定的，就是：我們不願意被當作一個普通記者看待，拿一份記者證，因為假如那樣，我們便將被置於外交部照顧和控制之下了。外交部對於記者的規則是非常嚴格的，假如我們一旦成了外交部的小寶寶，我們不拿特別許可證便不能離開莫斯科，而特別許可證又是極少發給的。我們將不能有旅行的自由，我們的資料將受外交部的檢查。這些東西我們是不要的，因為我們已經與駐莫斯科的美國記者和英國記者談過話，我們已發覺他們的報導活動幾乎僅限於翻譯俄國報紙和雜誌的文字，傳送他們的翻譯文字，甚至即使那樣，檢查人員還常常要把他們的電報剪掉一大段。某些檢查是完全無稽的。有一次，一個美國記者在描寫莫斯科的時候，說克里姆林宮是三角形的。他發覺這項消息被剪掉了去。你沒有檢查規則可資遵循，但老資格記者，就是那些在莫斯科住了很久時間的記者，大概可以猜中那一

類的消息通得過和那一類的消息通不過，記者和檢查員之間的鬥爭是永遠不息地在進行的。

這兒大家都知道一個關於一種新式贖地鼠的故事，那個故事大致是這樣的：一個土木工程師發明了一種名叫贖地鼠的掘泥機器。它的照片和圖解在一份蘇聯科學雜誌上登載了出來。一家美國雜誌轉載了它。一家英國報紙看見這篇文章，就拍電報給它駐莫斯科的記者，叫他報導贖地鼠的故事。那個英國記者因此就去尋到那份蘇聯科學雜誌，找出那篇資料，寄給他的報館，結果却發覺全部材料都被檢查處扣留了。這是幾個月以前的事情，而據我所知那份資料現在還握在檢查處手裏。

記者們最近又受了一種新條例的限制。那種新條例把洩漏農業、工業、和人口數字看作像洩漏軍事消息同樣的叛國罪。結果是，關於蘇聯的任何生產，誰都不能得到數字了。一切都用百分比來計算。沒有某數，百分比看了也是枉然。譬如說，他們不能告訴你某一家曳引機工廠究竟生產了多少架曳引機，但他們可以告訴你，它的生產量是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九十五。假如你知道一九三九年生產多少架曳引機，你的數字大概是正確的，但假如你沒有別的數字比較，你就完了。在某些情形之下，這種辦法是非常可笑的。譬如說，假如你問史達林格勒目前有多少人口，他們就告訴你是戰前人數的百分之八十七。於是你一找戰前的數字

，比較一下，就知道史達林格勒現在住着多少人了。

駐莫斯科的記者和新聞檢查處之間經常進行着舌戰，而我們不想被捲入到裏面。

在這當兒，喬意·紐曼從列寧格勒的皮貨拍賣市場上遨遊回來了。除了是一個好的朋友以外，喬意還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他曾在日本和阿根廷受過訓練，這種訓練使他特別適宜於莫斯科的場面。在不流行坦白說話的國家裏有過長期的經驗以後，他得到了一種安閑自在的氣質；他對於旁人的建議和言語之間的細微差別非常敏感。他可以讀出意思後面的意思。此外，他又是一個瀟灑磊落的人。假如你來做他這項工作，沒有多久就會發瘋。我們非常感謝他給我們的消息和訓練。

我們去拜訪美國大使館，而它與我以前所見過的美國大使館都不同。在大多數美國大使館裏，美國遊客或訪客的行列是不斷的，在莫斯科大使館簡直沒有一個人去拜訪。我們莫斯科大使館裏的人員雖然相當多，但他們幾乎只能互相往來或與其它大使館的人往來。因為外國人與俄國人之間的交往是相當受限制的。在這種緊張的時期，俄國人當然不願意被人看見和美國大使館的人混在一起，這原是很容易懂得的。我們大使館的一個人向我講了一個故事解釋這一點。他說，有一次，他與一個國務院派到莫斯科來的人談話，國務院的人抱怨說他

不能和蘇聯人民接觸。大使館的那個人說，「噫，假如說在華盛頓，你聽說你的一個女秘書和俄國大使館裏的一個人一同出去玩。你將怎麼樣？」國務院的那個人答道，「嘿，我就開除她，馬上開除她。」於是大使館的那個人就說，「噫，你瞧，或許俄國人也是這樣想呢。」

美國大使史密斯將軍邀我們去午餐，我們發覺他是一個聰明而謹慎的人，正在極力儘量改善兩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承認他正在很大的困難之下工作。因為外國外交官的活動是受着新聞記者同樣的限制的。他們不得離開莫斯科，他們不能在全國各地自由旅行，他們到俄國人家裏去的次數是極其有限的。並不是當局有什麼閒話，而只是因為根本沒有人來邀請你。假如你邀請一個俄國人，通常總有一些事情要發生。他病了，或是不能來，或是不在城裏。這種事情是很不幸的，但却是真的。同樣不幸的是：在美國，多少也會發生這樣同樣的情形。

我們相信俄國人是世界上最蹩腳的宣傳家。讓我們且以外國新聞記者為例。一個新聞記者到莫斯科去的時候，通常總是滿懷善意，很想了解他所見到的東西。他很快地發覺自己處處受牽制，不能做一個新聞記者的工作。漸漸地，他的情緒開始轉變了，漸漸地，他開始恨

起那種制度來，倒並不是恨那種制度本身，而只是恨因為它阻礙了他的工作。要把一個人改變來反對一樣東西，再沒有比這種方法更迅速的了。這個新聞記者結果常常變得煩惱自卑，因為他不能完成派他來做的那種工作。一個不能履行他的任務的人，常常憎恨那使他不能履行職務的原因。大使館裏的人和新聞記者感覺孤獨和隔膜；他們是俄羅斯的島民，無怪他們要變得孤僻和苛刻了。

這一段關於外交部對付普通莫斯科記者的話是說得很公平的。我們可以做許多他們不許做的事情。但假如也得像他們那樣拍發新聞電報作為我們任務的一部份，那末，我們也就得受外交部的照顧，我們也不能離開莫斯科了。

41

文協現在派了一位譯員給我們，而譯員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甚至連一條街名都讀不懂。我們的譯員是一位年青、矮小、並且相當漂亮的女郎。她是莫斯科大學的畢業生，在學校裏的時候專攻美國史。她敏捷、機警、而強硬，是一個蘇聯陸軍上校的女兒。她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那不但因為她十分清楚莫斯科並且能以很大的效率辦成事情，而且也因為在她的談話中，她使我們得到一個印象，知道俄國青年，至少是莫斯科的青年在想些什麼或談些什麼。她的姓名叫做斯維脫拉娜·立脫維諾伐（Svetlana Litvinova）。她的名字讀起來

像『甜蜜』拉娜 (Sweet Lana) ，這個名字我們覺得這樣的可愛，以致我們決定把它推廣開來。我們試叫『甜』史密斯將軍，『甜』哈萊·杜魯門，和『甜』凱利·凱普曼·卡德，但叫起來都不順口。最後我們叫到『甜』喬意·紐曼，這個名字似乎是鉄定不移的了。他到現在還被人叫做『甜』喬意。

甜拉娜週身都是精力和辦法。她給我們弄到車子。她帶我們去看我們所要看的東西。她是一個堅決的小女郎，而她的意見也像她的人同樣的堅決。她憎惡一切現代的藝術。象徵派畫家是頹廢的美國人；實驗派畫家也是頹廢的美國人；庇卡索的畫使她看了作嘔；她把我們房間裏那一圈瘋狂的壁畫描寫成美國頹廢派藝術的典型。她唯一真正喜歡的圖畫是十九世紀的代表照相畫。我們發覺這不是她個人的看法，而是一般的看法。我們並不以為蘇聯的畫家會遭受到任何確實的壓力。但蘇聯只有國家藝術展覽會，假如他想把他的圖畫掛在國家藝術展覽會裏，他就得繪照相派的圖畫。他至少不會公開拿色彩和線條來實驗，不發明新技巧，不用主觀色彩的筆法。甜拉娜對這個問題辯論得很激烈。她在大多數問題上都是辯論得很激烈的。從她的身上我們認識了蘇聯青年的道德風氣。它多少有點兒像前一代美國一個小鎮市的道德風氣。好姑娘是不進夜總會的好姑娘是不吸煙的好姑娘不塗脣膏或指甲油。好姑

娘穿衣服非常保守。好姑娘不喝酒。好姑娘對待他們的男朋友非常拘謹。甜拉娜是這樣的道德，以致我們雖然從未以為我們自己是非常不道德的人，但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却使我們自慚形穢了。我們喜歡一個盛裝艷飾的女人，我們對一隻圓潤的膝頭不禁要多瞟一眼。我們的鼻子會自然地傾向脂粉香。我們喜聽蕩魂的音樂和嗒聲嗒氣的歌唱，我們愛上歌舞團裏美麗的小腿。這一切在甜拉娜看來都是頹廢的事情。這是頹廢的資本主義的產物。而這種態度並不僅限於甜拉娜所有。我們所遇到的大多數青年都是如此。這使我們感到很有趣。因為在蘇聯青年的態度上，我們找到了美國最保守和最舊式的那一羣人的態度。

甜拉娜非常整潔，她的衣服做得很好，樸素而非常合身。有時，當她偶或引導我們到戲院或歌劇院去的時候，她就在帽子上戴一片小小的面紗。我們留在蘇聯的那個期間內，甜拉娜對我們頹廢的憎厭，已減少了幾分。最後，當我們快要離開的時候，在我們最後的那天晚上，甜拉娜說，『我曾嚮導過許多人，但我們以前從來不會有過一點趣味。』

她在大學裏對美國史的研究非常用功，而且是用蘇聯的那種科學態度來研究的。她知道許多美國史上我們從來不曾聽說過的事情，但她當然總是用馬克思主義者批判的態度去研究美國史的，所以關於那些我們的確知道的事情，從她的口裏講出來，也帶了一種陌生的異國

情調。或許我們對俄國史的知識在他聽來也有那種同樣的味道。漸漸地，雖然我們頹廢，我覺得她已開始有點喜歡我們了。我們和她以前所接觸的大多數遊客多少有點不同。偶爾，甜拉娜會擺脫蘇聯青年那種嚴肅的氣氛，也來開一些非頹廢的小玩笑。

我們切盼了解這種態度，而漸漸地，我們比較明白了。蘇聯青年所受的訓練使他們感覺到需要完成的工作是這樣的多，多得簡直一生都做不完，所以沒有多少時間可以遊玩。他們之間的競爭是永遠不息的。進學校得考試，成績最好的人得勝，成績最好的人可以取得學位。投考大學的人總比大學的學額多，所以競爭是非常尖銳的。不論在什麼地方，獎章和獎金總是歸工作最有效率的人所得。靠過去的成績，或依賴父親或祖父的餘蔭，在這兒是根本沒有這回事的。一個人的地位是完全依賴他自己的聰明和努力的。假如說這種方法使蘇聯青年似乎有一點兒緊張和缺少幽默感，但它也使他們工作得非常刻苦。

甜拉娜帶我們去玩列甯山，站在俯瞰全城的高處，我們看見莫斯科一直延伸到天邊，是一個極大的城市。天上堆着一壘壘的烏雲，但太陽在烏雲底下照耀着，照亮了克里姆林宮金色的圓頂。市區裏有新築的大廈，也有窗櫺上彫花的木頭小房子，是一個奇異的、抑鬱的、充滿特徵的城市。全市人口現在不會發表數字，據說大概在六七百萬之間。

我們緩緩地驅車回到城裏。水溝兩旁種滿了正在茁長的椰菜，公路兩旁種着洋芋。戰時的這種勝利花園現在仍繼續存在，而且將繼續存在下去。每一個人都有那一小塊種椰菜和洋芋的園地，而這些園地是受着極有力的保護的。我們在莫斯科的期間，有兩個女人因為從一個私人園地上偷了三磅洋芋，竟被判處十年苦工。

在我們驅車回莫斯科的途中，一大片烏雲遮蔽了天空，雨開始傾瀉到城市上。

一個人在世界上最難做到的事情，大概就是要把他所看到的東西樸實地記載下來了。我們老是被我們所希望、所期待、或所恐懼的事情歪曲了我們的畫面。在俄國，我們看到許多與我們的預期不符的事情，而爲了這個理由，攝影是極好的辦法，因爲一架攝影機是沒有成見的，它只會把它所見到的東西照樣記錄下來。

我們得在莫斯科等待許可證，然後才可以離開那個城市到全國各地去旅行。

我們應邀去見新聞局的代理局長。他穿着一套灰色的制服，制服上佩着外交部方形的肩章。他那一對眼睛藍得亮晶晶的，像玳瑁的眼睛一樣。

卡柏激烈地談論關於攝影的事情。截至目前爲止，他還不能拍照。新聞局局長向我們保證，聲稱他將盡力爲我們提早弄到攝影許可證。我們的會見是正式的拜會，非常客氣。

後來我們去訪問列寧紀念館。一個接一個的房間裏都陳列着一個人一生的瑣碎紀念品。

我想歷史上是再沒有記載得更詳細的生活的了。列寧一定是什麼都不摔掉的。許多房間和陳列箱裏堆滿了他的片紙隻字、賬單、日記；他的鉛筆和鋼筆，他的領帶，他的衣服，什麼都在那兒。四面的牆壁上繪的巨幅的壁畫，記載他一生自兒童時代起的種種事件。壁畫上也記載着與他有關的每一個革命事件。他的書籍深嵌在白色大理石的架子裏，有些書嵌在牆裏，書名是燙金的。紀念館裏有列寧各種姿勢的彫刻像，在他後半生的照片中，我們看到了史達林。但整座紀念館裏，沒有一張托洛斯基的像。至少以俄國人的歷史而論，托斯基已停止存在了，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一個人。這種處理歷史的辦法我們實在不懂。這樣的歷史不是實在的歷史而成了我們所願望的歷史。因為托斯基對俄國革命無疑地會發生過很大的歷史影響。他的被逐無疑地也有很大的歷史重要性。但在年青的俄國人，他是從不存在的。在那些進列寧紀念館去看革命史的兒童，托斯基是沒有的，好的或壞的都沒有。

紀念館裏很擁擠。那兒有成羣的蘇聯士兵；有兒童；有從各加盟共和國來的遊客。每一個團體都有一個演講的人，每一個演講的人都帶有一條小棍子，用那條小棍子，他或她指出討論中的各種物件。

當我們在那兒的時候，進來了一長列戰時孤兒，他們大約都是從六歲到十五歲的小孩子和小姑娘，穿着他們最好的衣服。他們也走遍紀念館，張大着眼睛凝視列甯過去的生活。他們好奇地望着他的皮帽子、他的皮領外套、望着他的鞋子、他寫字的桌子，他所坐的椅子。與這個人有關的一切東西都在這兒，一切都有，只是沒有幽默。這兒找不出證據可以證明在他的全部生命中，他會有過一個輕鬆或幽默的思想，有過一刻稱心大笑的時候，或有過一個開心的夜晚。這些事情無疑地是存在的，但或許在歷史上，他是不允許有那些事情的。

在這座紀念館裏，你會得到一種印象，覺得列甯本人是明白他在歷史中的地位。他不但保存了他思想和寫作的每一個片斷，而且也保存了陳列在那兒的數以百計的照片。他無時無地，從小到老都拍了照片，幾乎像是他已預料到世界上將來有一天會有一座稱爲列甯紀念館的博物館似的。

紀念館裏到處都是靜悄悄的。人們低聲耳語，那些拿着小棍子的演講者用一種異常美好的祈禱般的音調講話。因爲在俄國人的腦子裏，這個人已不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成了一個青銅和大理石的人。他那禿頂的頭和翹起的鬚鬚在蘇聯是無所不在的。他那一對凝思睨視的眼睛從畫布上注視着每一個地方。

晚上，我們到美國俱樂部去參加一個宴會。美國俱樂部是大使館職員和海陸軍參贊處的人士們娛樂的地方。那兒有一種混合酒，是用伏特加和葡萄汁調合起來的，喝着使人想起美國禁酒的時代。艾地·琪爾摩領導着一個小小的樂隊。他一度把他的組織稱作「克里姆林鳥鴉」，但因為這個名字有點兒招忌，所以已改稱為「莫斯科河鼠」。

經過列甯紀念館裏一下午的嚴肅以後，這個宴會上的略微的騷亂、喧鬧、和大笑在我們是一種愉快。

參加這次宴會的女郎中，有幾個不許離開蘇聯的英美人的妻子。她們是漂亮而有點抑鬱的姑娘。他們不能到英國或美國去和她們的丈夫團聚，所以她們就受雇在她們的大使館裏，等待一個最後的決定。

蘇聯有許多事情是我們無法懂得的，而這件轟動一時的事情便是其中之一。這些女人不過只有五十個左右。她們對蘇聯沒有用處。她們已遭猜疑。俄國人並不與她們來往，可是她們又不許離開。而爲了這五十個女人，爲這五十個不重要的女人，却使旁人對蘇聯的印象大壞。這種情形當然是不能再發生的了，因為根據一條新頒佈的條例，俄國人已不能和外國人結婚。但這兒，她們坐在莫斯科，這些傷心的女人，她們已不再是俄國人了，但她們卻不會成

爲英國人或美國人。而我們不能懂得爲什麼理由要留住她們在這兒。或許這僅僅只是因爲俄國人不願意做旁人叫他們做的事情。它可能就是這樣的單純。當克里門·艾德禮以私人資格要求送她們出俄國的時候，他所得到的答覆是叫他不要管閒事。世界上的國際愚蠢行爲正在增加，這僅是其中的一端而已。有的時候，各國的領袖似乎像是肩胛上頂着木片的小孩子，互相衝撞着要撞倒對方肩頭上的木片。

美國俱樂部的那次宴會很好，那是一次熱鬧的好宴會，它使我們感覺到有一點懷鄉病了。那兒的人都患着懷鄉病，因爲俄國對待外國人是並不十分親熱的，尤其是受雇於外國政府的外國人。我們到俄國的時間雖然並不十分久，但那些女郎的唇膏、脂粉、和指油在我們眼睛裏已覺得非常好看了。

第二天下午，我們去看航空表現。平民雖然也有幾個節目，但大多數節目是由蘇聯空軍表演的。蘇聯武裝力量的各類兵種都有他的紀念日。有坦克兵日、步兵日、和海軍日，而這一天是空軍日。由於這是半軍事性質的表演，所以我們事先接到通知，不准帶攝影機去。這在我們看來似乎有一點兒滑稽，因爲每一家大使館的每一個軍事參贊都會到那兒去的，而他們是真正懂得飛機的人。我們從人叢裏向上望，辨別不出飛機的式樣。每一個軍事參贊多半

會記下並懂得他所見到的東西，而我們却不懂。

一輛汽車來接我們去。我們開出一條兩旁排列着旗幟的大道上，旗幟連綿長達數哩，都是紅旗和空軍旗。大路兩旁矗立着巨幅的史達林像、馬克思像、和列甯像。幾十萬人乘着火車和公共汽車擁向飛機場，還有幾十萬人步行前進。

我們的位置是在特別參觀席裏，而那是一個錯誤。我們應該擠到那幾百萬人站着看表演的青草大廣場上去的。那天的天氣很熱，特別參觀席沒有遮太陽的設備。在那平坦的青草大廣場上却有蓬帳，蓬帳下面有冷飲和小餅出售。我們就座以後，人海裏開始發出一陣低沉的吶吶聲，那種吶吶聲逐漸擴大成一片宏壯的咆哮。原來是所有人都站起來在向那剛才到達的史達林致敬。我們看不見他，我們看不見他的閱覽台，因為我們在特別參觀席上所佔的方寸不對。他的到達所引起的反響不是一種歡呼，而是一陣嗡嗡聲，像幾百萬隻蜜蜂所發出來的聲音似的。

表演幾乎立刻就開始。開頭的一些節目由平民飛行員表演，有些是從工廠裏來的，有些是從飛行俱樂部來的，有些是從婦女團體裏來的。他們表演編隊飛行，飛出非常複雜的隊形，而且飛得非常妙。幾長列飛機表演『跟着領隊機飛』，一架接一架地翻斛斗、轉身、和俯

衝。

然後軍用機來了，飛密結隊伍，三架，五架，七架，機翼連着機翼，飛得像一架飛機一樣。這實在是異常壯觀的飛行，但人們却不是爲了看它而來的。人們來看的是新式飛機，噴火機和火箭機。這些飛機終於來了。其中有些以極高的速率幾乎成垂直線地竄上天空，機翼尖端的火箭在天空裏留下一縷白痕。最後，噴火機來了。我不知道那究竟是否是爲了要迷惑觀衆的視線，但它們只在地面以上三百呎光景的空中飛行，到我們聽到它們的聲音的時候，它們幾乎已經飛過去了，它們『茲』地一聲擦過去就不見了。我們不知道它們與其它噴火機相較究竟如何，在我們看來，它們似乎飛得非常快。在所有參加表演的飛機中，只有兩架大飛機可以算是轟炸機。

接着，天空中發生了一幕假想戰。敵機進襲，防禦機昇空去迎擊它們，而在遠處的地面上，高射砲亮光閃閃地怒吼起來，整個地面都爲之隆隆震動。這幕表演非常逼真，因爲在天空的這一邊和那一邊，會有一架飛機冒出黑煙和火焰，翻着斛斗摔下去，然後，山背的那一邊會升起一片鎂光，像是那架飛機已墮地焚毀了似的。這是一幕非常有效率的戲劇。

53

最後的一項表演最爲壯觀。一大羣運輸機飛到機場上空，每一架飛機都突然吐出降落傘

來。天空裏至少同時有五百頂降落傘，它們有的紅色，有的綠色，有的藍色。太陽使它們看來像是空中的花朵。它們向飛機場飄下來，而正當在着地以前，每一頂降落傘又吐出第二頂降落傘，所以傘兵着地的時候是站着的，他們並沒有顛頭或打滾。

那場空中表演一定會經過許多週的練習，因為它的時間十分正準，沒有耽擱。表演項目接一連二而來。當表演完畢的時候，人羣中又發出那片嗡嗡聲和幾十萬人的鼓掌聲。原來是史達林離開了，而我們依舊沒有看見他。

在特別參觀席裏佔有最好的位子實在有不利的地方，我們希望我們那次能在廣場上，那兒，人們舒舒服服地坐在青草地上看表演，而且看得比我們多。我們後來不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曾再犯同樣的錯誤。特別參觀席對自大者或許是一種恭維，但你所看到的東西却沒有那樣多。

第二天早晨，我們的攝影許可證拿出來了。卡柏終於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他的攝影機了，他的手指已在發癢。我們要拍攝莫斯科的建築物，拍攝忙碌地粉飾裝修、準備慶祝莫斯科築城紀念日的情形。甜拉娜跟我們一起去，做我們的嚮導和翻譯。

我們幾乎立刻就遭遇到猜疑外國攝影者的那種糾紛。我們正在拍攝一羣孩子在亂石堆裏

遊玩的情形。他們一心一意地在從事建築，把石頭一塊一塊地壘起來，把垃圾搬到小車子裏，模仿大人的動作。突然地，一個警察出現了。他非常有禮貌。他要看攝影許可證。他讀了許可證，但却很不願意信任那一小片紙頭。所以他帶我們到最近便的公共電話站。打電話給某一處總部。於是我們就等着。我們等了半個鐘頭，才看見一輛汽車滿載着便衣人員駛過來。他們審讀許可證。每一個人都看過，然後他們開了一次小小的會議；我們不知道他們說什麼，但那時他們又打了一次電話，最後，他們都面帶笑容地回來，他們都向我們行了一個敬禮，我們便可以在那個地點的附近自由攝影了。

然後我們走到城市的另一部份，因為我們要拍攝商店的情形，拍攝食物店、服裝店、和百貨商店。而又來了一個非常有禮貌的警察，審讀了我們的許可證，他也去打一次公共電話，叫我們等着。於是又來了一輛載着便衣人員的汽車，他們每一個人都審讀了我們的許可證，他們也商量了一番，他們也去打了一個電話。結果是一樣的。他們面帶笑容地回來了，向我們行了一個敬禮，於是我們在那一區就可以自由攝影了。

這種情形似乎在蘇聯各處都是一樣。我想，凡是有政府機關活動的任何地方都是這樣的。誰都不願意負責任，誰都不願意對一個建議說一聲是或否。他老是必須向上峯請示。這樣

做，他就可以使自己不受批評。凡是與軍事機關或政府機關關聯過交涉的人，都會承認這個故事的正確。我們的攝影機所得到的反應是到處都非常客氣，但却又非常小心，直到警察確信一切都沒有問題的時候，攝影機的鏡頭才可以『喀嚓』。

莫斯科的食物店非常大，而像餐室一樣，它們也分兩種：一種是配給店，那兒的食物非常便宜，但你得拿着配給票才能買得到；另一種是自由商店，也是政府經營的，那兒各色各樣的食物幾乎應有盡有，但價錢非常貴。罐頭食品推積成山，喬其亞來的香檳和葡萄酒壘成金字塔。我們在這兒看到一些美國貨。有些罐頭蟹依舊貼着日本商標。有德國貨，也有蘇聯本身的奢侈品——大聽的魚子醬，從烏克蘭運來的成堆的香腸、牛油、鹹魚、甚至還有野味，如野鴨、啄木鳥、鵝鳥、家兔、野兔、小鳥、和一種看來像松鶴的白色野禽。

但這些食物都是奢侈品。在一般俄國人，重要的是麵包的價格和數量，以及蔬菜和洋芋的價格。在像今年這樣的好年頭，麵包、蔬菜、和洋芋的價格下落，而這是農作物收穫量成敗的指標。

不論配給和營業的食物店廚窗裏，都擺滿着蠟製的樣品，表示店裏所出售的食物。那兒有蠟製的火腿、鹹肉、和香腸，蠟製的牛肉，甚至還有蠟製的罐頭魚子醬。

我們其次就去看百貨商店，那兒所出售的是布衣料、鞋襪、和男女衣服。東西的質並不好，做工也並不十分好，他們的實用品是根據需要製造的，在實用品的需要未滿足以前，不製造奢侈品，這是蘇聯的原則。百貨商店裏有印花布衣服，也有幾套羊毛衣服，價錢在我們看來似乎非常貴。但說到這裏，我們便已犯了籠統說話的危險，因為甚至就在我們逗留在蘇聯的那個短時期內，價格便已下跌，質的方面似乎已在改善。我們似乎覺得一件事情在今天正是正確的，到明天就會變成不正確。

我們去參觀那些出售舊貨的營業商店。這些是專業化的商店。一家售賣瓷器和燈，另一家售賣珠寶——都是舊式的珠寶，因為蘇聯極少有新製的珠寶——紅寶石、翡翠、耳環、戒指、和項鍊。第三家出售攝影器材和照相機，大多是戰時得來的德國照相機。第四家出售舊衣服和舊皮鞋。有些舖子出賣從烏拉爾山運來的未經完全琢磨的寶石、有綠玉、黃玉、和藍玉。

在這些商店外面，另外又有一種交易。假如你從一家攝影機商店裏出來，就會有兩三個帶點兒賊頭賊腦樣子的人走進你的身邊，每一個人帶着一個包包，包包裏是一隻照相機，一隻『康坦克斯』，或是『立卡』，或是『祿來發來克斯』。這些人把那隻照相機給你瞥視一

下，告訴你是什麼價錢。珠寶店外面也有同樣的情形。有一個人拿着一小捲報紙。他很快地打開報紙，給你看一隻鑽戒，並告訴你一個價錢。他所做的事情大概是不合法的。這些店外賣貨人所討的價錢比營業商店裏的價錢略微要高一點兒。

這些商店裏老是擠着一大羣人，那些人不是去買東西而是去看別人買東西的。假如你看一樣東西，立刻就有一羣人也擠到你的週圍來看，並且要看你究竟買不買。據我們想，這在他們是一種娛樂。

我們回到我們那個有那幅瘋壁畫的綠色的房間裏，我們感覺到很氣悶。我們不能指出究竟爲什麼氣悶，然後我們想出來了：街上極少笑聲，甚至也很少笑容。人們低着頭走路，或說得更正確些，是急急忙忙地趕路，他們的臉上沒有笑容，或許這是因爲他們工作太辛苦了，因爲他們得走很多路才能到達他們工作的地方。街上的氣氛嚴肅得很，或許這是永遠如此的，但究竟是否永遠如此，我們却不知道。

我們與甜喬意·紐曼和時代週刊的約翰·華爾克同進午餐，我們問他們是否會注意到笑聲的缺乏。他們說他們也會注意到。他們又說，沒有多久，笑的缺乏便會鑽進到你的皮膚底下，你自己也會嚴肅起來。他們給我們看一份名叫『鱷魚』的蘇聯幽默雜誌，翻譯了幾則笑

話給我們聽。但它們不是使人發笑的笑話，它們是尖酸的笑話，批評的笑話，它們不是供人發笑的，其中沒有使人開心的地方。甜喬意說，他聽說莫斯科以外的地方情形不同，這一點，我們後來發現是確實的。鄉村裏有笑聲，在烏克蘭，在草原上，在喬其亞都有笑聲，但莫斯科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城市。

有一個記者與他的汽車和車夫發生了麻煩。他需要一輛汽車，而在莫斯科，一個外國人能有一個俄國車夫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了。調換車夫對他沒有好處的。他的問題是這樣：他的車夫給他駕駛得非常好，但當他不爲他駕駛的時候，他就給別人駕駛，只要那個人肯出一百盧布作一次短途旅行便可以成交。他的車夫變得非常有錢，而車子却得時刻不停地奔馳。這種事情毫無辦法，因爲假如他一抱怨，他的車夫便有點兒鬱鬱不樂，而一當他的車夫鬱鬱不樂，他的車子便會出毛病，而一當他的車子出毛病，他便得到修理廠裏去住上兩三個星期。假如想用他自己的車子，最好的辦法還是使他的車夫快樂。他曾嘗試過調換別的車夫，但總是要發生同樣的情形。

在某些場合，車夫問題變成了有點滑稽。琪爾摩的車夫自己也雇着一個車夫，那個車夫駛車送他的車夫來上工。

我們很懷疑這些故事是否全部真實，有一天，當一個人把一輛公共汽車整個租給我們的時候，我們才終於相信了。我們得趕快到飛機場去，而我們除了一輛公共汽車以外，沒有別的選擇。那次旅程化了我們四百盧布。我們兩個人乘着一輛可以坐三十個人的公共汽車駛入飛機場，實在有點悶氣。

莫斯科的車夫可能是非常有錢和快樂的人，但他們是必需的，因為一個外國人很難取得一張司機執照。有一個記者去參加司機執照考試，但他在一個問題上失敗了，那個問題是：『什麼東西是不屬於一輛汽車的？』他可以想出許多不屬於汽車的東西，最後他挑選了一樣，但他答錯了。正確的答案是『爛泥。』

那天晚上，我們在大使館裏看美國影片『Rhapsody in Blue』。這張片子我們以前已經看過了，但這次重看非常有趣，因為膠片攪亂了，影片開始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是死的；漸漸地，他們活了轉來，到影片完結的時候，喬琪·傑斯又已返老還童，成了一個小孩子。我們很喜歡它這樣開映。

卡柏經常利用我們旅館的那個窗口作為他拍攝街上行人的地點。他拿着一隻長鏡頭的攝影機潛伏在窗簾後面，拍攝那些在雨中行走的人和對街小鋪子裏買東西的人。他和對街攝影

機修理舖裏的那個人繼續用他們的攝影機互相決鬥。

我們都很久沒有聽到國內的消息了。沒有信寄來，我們決定嘗試打紐約的長途電話。這是非常困難的，我們最後放棄了那種企圖。一個人要打電話到紐約，必須有美金存在紐約的蘇聯賬戶裏。要這樣，我們須得拍電報給紐約的某一個人，告訴他我們要在那一天打長途電話，並且要在電話裏談多久。這筆費用在紐約的存款裏扣除，那時，紐約與莫斯科的長途電話才能接通。但因為這種手續須得化一星期或十天的時間才能完成，所以我們決定最簡單的事情還是繼續寫信，希望最後總能收到幾封。

當信件終於開始到達的時候，我們發覺從紐約寄到莫斯科的航空信得走十天到三星期。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它要走那樣久，因為從紐約到斯篤霍姆是兩天，其餘的時間便化在從斯篤霍姆到莫斯科了。這種投遞的遲延更增加了外國人孤獨的感覺。

我們開始有點怨恨的情緒，因為我們到莫斯科已有一星期，而我們離開那個城市的許可證却還沒有出來。我們以為我們或許得在莫斯科過夏等候許可證，但它們突然出來了，我們的計劃於是就開始。

甜喬意·紐曼為我們舉行了一次鷄尾酒會，一直繼續到深夜。我們的計劃是在黎明起程

去基輔。那次鷄尾酒振奮了我們的精神，也振奮了其餘五十個人的精神。

我們發覺在蘇聯旅行有一項困難。你不能從基輔去列甯格勒，或從列甯格勒去史達林諾。每一次，你必須回到莫斯科以後再出去，因為蘇聯的運輸系統是以莫斯科為中心像自行車的鋼絲那樣輻射出去的；公路已在戰時弄得這樣的破舊，以致幾乎不可能在公路上旅行，而且，在公路上旅行所化的時間比我們所預期的要多得多。另一種困難是，由於飛機只在白天飛行，沒有夜間飛行，所以它們一清早就要起飛。而經過甜喬意的那一場鷄尾酒會以後，我們似乎覺得時間實在太早了。

第四章

甜拉娜不能跟我們一同到基輔去。代替他做翻譯和嚮導的，是乞瑪斯基先生。他是一個小個子的好人，在大學裏研究過美國文學。他的英語知識純粹是學院性質的。卡柏老是亂叫他的名字，拿它來開玩笑。

乞瑪斯基會一再較正他，說，『卡柏先生，是乞瑪斯基，不是朱瑪斯基。』
而卡柏就說，『是，曹瑪斯基先生。』

『不，卡柏先生，是乞瑪斯基，不是朱瑪斯基，也不是曹瑪斯基！』

62
那種辯論是永遠說不完，而卡柏很高興每天都給他的名字找到了新的叫法。乞瑪斯基老是有一點兒擔心我們所說的話，擔心我們所用的那種古怪的美國雙關語。他曾一度想明白那種話的意義，但最後放棄那種企圖，不再聽我們說話了。有幾次，他爲我們所定的計劃不曾實現——預定的汽車沒有來接我們，我們去搭的飛機不起飛。於是我們就叫他克里姆林的

格里姆林。

「格里姆林是什麼東西？」他問道。

我們詳細解釋格里姆林的起源，說明他們如何開始在英國皇家空軍裏出現，說明他們的習慣，以及他們如何在半空中停止引擎，凍結機翼，阻塞油管。

他非常留神地傾聽，最後，他豎起一個指頭說，「我們蘇聯的人是不相信鬼的。」我們或許戲弄得他太利害了。我們希望我們不會傷了他的情感。

有一件事情是你永遠無法預知的，那就是一架飛機起飛的時間。這是不能在事先知道的。但有一點你是可以知道的，就是，它將在早晨很早的時候離開。還有一點也是你可以確定的，就是，你必須在起飛以前老早就到飛機場去。你每次出去旅行，必須在黎明以前寒峭的黑暗裏到達飛機場，在那兒坐上幾小時，喝幾小時的茶等候飛機起飛。早晨三點鐘，我們房間裏的鈴聲響了，我們不高興起身，因為我們曾參加了甜喬意的鷄尾酒會，我們所需要的是十二小時的睡眠，而我們才睡了一個鐘頭左右。我們把行李堆在汽車後面，穿過荒涼的莫斯科街道，駛入鄉下。

我們現在注意到一件一再發生的事情。蘇聯的司機把汽車開得飛快，然後關閉油門，讓

車子滑行。他們利用山坡關閉油門滑行。據說這樣可以節省汽油，是每一個司機必須學習的一種技術。某一段距離要用多少汽油，是經過計算以後才配發給司機的，他必須使那一些汽油駛完那段距離。因此他利用他所能玩的每一種花樣來使他的汽油多用一些時候。這正是蘇聯會計制度繁複的又一個例子。它可以與餐室裏的會計制度並駕齊驅。油門開關的摩擦是不考慮的，但這樣所節省下來的汽油一定也實在有限得很。在我們看來，這種辦法實在惹人煩惱。汽車加速到約摸以每小時六十哩的速度疾馳，然後油門突然關閉，車子順勢滑行，直到它的速度減低到像昆蟲爬行一樣。然後它又躍昇到每小時六十哩的速度，然後再滑行。

黎明前的莫斯科飛機場上擠滿了人，由於所有的飛機都在清晨起飛，所以午夜以後不久，機場上就已開始有乘客到來。他們穿着各式各樣的服裝。有些穿着皮衣，準備抵擋白海或西伯利亞北部的北極氣候；有些人穿着很輕便的衣服，因為到黑海附近的亞熱帶去，這些衣服已經足夠了。從莫斯科出發，經六小時的空中途程，你幾乎可以找到世界上的任何氣候。

由於是文協的來賓，我們走過公共候機室，進入側邊一個有一張餐桌、幾張長榻、和幾張舒適的靠椅的房間裏。而那兒，在一張油畫的史達林的嚴肅的眼光之下，我們喝着濃茶，直到我們的飛機召喚乘客。

在壁上那張史達林大油畫像裏，他穿着軍裝，佩帶着他的全部勳章，而那些勳章是非常的多。在他的喉部是金星勳章，那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勞工最高的勳章。在他左胸的最上端，是那最令人羨慕的蘇聯英雄金星章，那個勳章相當於我國的國會榮譽勳章。在那個勳章下面，是一排戰役勳章，表示他曾參加過那幾次軍軍行動。在他的右胸上，掛着許多金色和紅色的琺瑯質勳章。蘇聯陸軍的勳章和我們軍隊所佩帶的戰區緞帶不同，他們是每一個大戰役都頒發一種勳章，如史達林格勒勳章，莫斯科勳章，羅斯托夫勳章等，而那些勳章史達林都佩帶着。作為蘇聯陸軍元帥，那些戰役都是他指揮的。

說到這兒，我們順便討論一件大多數美國人感到困惑的事情。蘇聯沒有一件事情可以在史達林石質的、銅質的、油漆的、或刺繡的眼光之內。他的畫像不但懸掛在每一座博物館裏，而且懸掛在每一座博物館的每一個房間裏。他的鑿刻像站立在一切公共建築物的前面。他的半身像懸掛在每一個飛機場、火車站、和公共汽車站的前面。他的半身像也懸掛在所有的學校裏，而常常是他的半身像後面又掛着他的全身像。在公園裏，他坐在一張水門汀的椅子上，與列甯討論着問題。小學裏的學生刺繡他的肖像，商店裏出售他的照片數以百萬計，每一家人家至少有一張他的照片。史達林像的繪畫、鑿刻、融鑄、和刺繡，一定是蘇聯最大

的企業之一。他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視的。

在懼恨把權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並且懼恨權力的繼續的美國人看來，這是一件可怕和可惜的事情。在公共慶祝集會上，史達林的畫像大得非夷所思。它們可能有九層樓那樣高，有五十呎寬。每一座公共建築物裏都有他的巨幅畫像。

我們曾與不少俄國人談起這個問題，得到了幾種答案。一種答覆是：俄國人民一向用慣了沙皇和沙皇家屬的照片，沙皇被搬掉以後，他們需要一樣東西來代替他。另一種答覆是：俄國人習慣地懸掛聖像，而這是聖像的一種。第三種答覆是，俄國人是這樣的愛史達林，以致他們要和他永遠在一起。第四種答覆是：史達林本人並不喜歡這種情形，曾要求不要把這種情形繼續下去。但據我們看來，史達林不喜歡任何其它東西，那樣東西便會除掉，但這樣東西却只有在增加。但不論是什麼理由，總之，你沒有一刻時間可以不在史達林那微笑的、或沉思的、或嚴肅的眼光之下。這種事情是美國人的情緒所無法了解的。蘇聯也有其它的畫像和其它的壁刻像。而你可以從其他領袖照片和畫像的大小上，相當正確地道出他們和史達林的繼承關係。所以在一九三六年，史達林以下最大的畫像是伏洛希洛夫，而現在次大的畫像必然是莫洛托夫。

喝了四杯濃茶以後，我們的飛機召喚乘客了，我們就把我們那一堆行李搬上去。它又是一架棕色的舊C——四七。人們把行李搬到飛機裏，堆在甬道上。每一個人都帶着食物：黑麵包、蘋果、香腸、牛油、和燻肉。他們老是帶着食物的，而我們發現這是一個好辦法。行囊裏帶着一段燕麥黑麵包，假如出了什麼毛病，你就可以有兩天不致於挨餓。通風設備常常是失了效的，所以艙門一關，飛機裏就悶氣沉沉。艙裏有一種酸溜溜發酵的味道，我很久不能證明那究竟是什麼氣味。但我終於發現它是什麼了。原來這是人們呼吸裏有燕麥麵包的氣味。過了一會兒，當你自己也吃了那種麵包的時候，你就習慣那種氣味，一點也嗅不到了。

卡柏在那次旅途中帶了一些書，在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他是如何得來的。但後來才知道卡柏是一個偷書賊。他把這種偷稱爲借。他隨隨便便地把書放進他的口袋裏，假如被人捉到了，他就說，『我會還的，我只是借一借，我只是想拿去看一看。』那本書極少會還。

他這種作風在琪爾摩的身上發生了高潮。在駐莫斯科的記者羣中，書是非常寶貴的，每次運到一批偵探小說或新小說，是一件非常歡喜的事情。那一次，琪爾摩剛才接到一本伊里萊·奎恩新出版的偵探小說。當我們去拜訪他的時候，他才讀了五章，而他自然把他手裏的書放在一邊跟我們談話。當我們離開以後，他再找他的書，而那本書已經不見了——卡柏把

它借去了。假如卡柏借或偷了琪爾摩那位可愛的太太泰瑪拉，琪爾摩或許會更傷心，但他却不能更忿怒的了。卡柏後來聽到琪爾摩發怒時的那種情形，有好些時不願意再見他。駐莫斯科的記者羣中，尤其是在冬季，已養成一種榮譽法典，猶如西部人對於馬匹的榮譽法典一樣，偷一個人的書，幾乎就像害了他的命。但卡柏從來不曾學會這種守法精神，他從不改過。當他在俄國的期間，他自始至終偷書。他也偷女人和香煙，但這是比較容易寬恕的。

我們在飛機上看了一會兒書，不久就睡着了。當我們醒來的時候，我們已飛臨烏克蘭穀物平原的上空。那一片穀物田像美國中西部同樣的平坦，也幾乎同樣的豐盛。那歐洲的大麵包籃，那幾世紀來引人垂涎的土地，那一片無窮盡的田野已躺在我們的下面，長滿着金黃色的小麥和燕麥，有些已經收割，有些正在收割。眼前沒有山，沒有任何種類的高地。平原一直展向一條渾圓的地平線。平原上蜿蜒着小溪與河流。

村落附近有彎彎曲曲的壕溝和砲彈坑，那是曾經發生過戰鬥的地方。那兒有無頂的房屋和焚毀的建築物的黑斑點。

我們似乎得無止境地在這片坦盪的平原上飛。但我們終於飛到第聶伯河，看見其轄了，它的河邊懸崖是周圍許多哩以內唯一高聳的東西。我們飛越那破碎的城市，在郊外降落。

每一個人都對我們說，我們一出莫斯科，情形就會有不同，嚴肅和緊張就會不再存在。而這是確實的。飛機場上有當地文協的幾個烏克蘭人來迎接我們。他們是愛笑的人。他們比我們在莫斯科遇到的人愉快和輕鬆。他們令人發生一種坦白和親切的感覺。他們都是大個子，幾乎都是白膚金髮，和灰色的眼睛。他們已準備好一輛汽車送我們進基輔。

基輔必定一度會是一個美麗的城市。它的歷史比莫斯科悠久得多。它是俄國城市之母。它位於第聶伯河旁邊的小山上，向下展開到平原。它的僧舍和城堡和教堂還是十一世紀時的建築物。它一度曾是沙皇心愛的遊樂地，他們曾在這兒建立他們的行宮。它的公共建築物是聞名全俄的。它以前是一個宗教中心。而現在它已成為一個半廢墟。在這兒，德國人顯露了他們的能耐。每一座公共建築物，每一所圖書館，每一家戲院，甚至那永久性的馬戲場，都被破壞了，不是被砲火轟壞，也不是在戰鬥中破壞，而是用火和炸藥破壞的。它的大學已被焚毀和夷成平地，它的中學小學已成為廢墟。這不是打仗，而是瘋狂的破壞，該城所有的每一種文化機構和一千年來所建立的每一座美麗的建築物幾乎都被破壞。這兒，日耳曼文化留下了它的成績。德國俘虜現在正在幫助清理他們所造成的破瓦殘礫，這是世界上少有的公道事之一。

我們的烏克蘭嚮導是阿里齊斯·波塔拉士基。他是一個大個子，因為在史達林格勒之役受傷，略微有一點跛腳。他是一個烏克蘭作家，英語極好，有很大的幽默感，是一個熱情友善的人。

在赴旅館的途中，我們注意到——而這是每一個人都會注意到的——烏克蘭的姑娘們非常漂亮，大多白膚金髮，有很豐滿的女性的身裁。她們有敏銳的感覺力，她們跨着搖搖擺擺的步伐走，而她們很容易微笑。她們的衣服雖然沒有莫斯科的女人那樣穿得好，但似乎比較合身。

雖然基輔曾遭大破壞而莫斯科不曾遭到什麼破壞，但基輔的人們却似乎並不像莫斯科的人們那樣呆板疲憊。他們走路的時候並不垂頭喪氣，却挺着胸膛，而且常常在街上大笑。這當然可能與地方性有關，因為烏克蘭人不像俄羅斯人；他們是斯拉夫民族的兩個支系。大多數烏克蘭人雖然能說俄羅斯話，能讀俄羅斯文，但他們自己另有一種語言，那種語言對南方斯拉夫人的語言比對俄羅斯人的語言更接近。許多烏克蘭字，尤其是農作方面的字，是和匈牙利語一樣的，他們有許多字與其說是從俄羅斯字轉化而來，不如說從捷克字轉化來更正確些。

在旅行社的旅館裏，我們的烏克蘭主人給我們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餐。席上有新鮮成熟的小番茄和胡瓜，有醋漬小魚，有大碗的魚子醬，還有伏特加。我們吃油煎的第聶伯河裏來的小魚，吃用烏克蘭蔥燒得噴香的牛排，還有從喬其亞來的葡萄酒，和美味的烏克蘭香腸。

這些人有着一種很好的友誼感。在午餐的時候，他們用一種非常有趣的態度向我們講到一個隨着一個國際委員會到基輔來過的美國人。這個人，他們說，在回到美國以後寫了一連串關於烏克蘭的文章，並且還寫了一本關於烏克蘭的書。但他們感到有趣的是：他對於烏克蘭並不知道得很多。他們告訴我們說：他極少走出他旅館的房間，他什麼都沒有看見，假如他不離開美國，他也可以寫出那本書的。這些烏克蘭人說，那本書裏充滿了不確實的事情，他們有一封他的上司寫來的信，表示同意他們的看法。他們很相信這個人在美國會被人相信，因為他現在已被認為是一個烏克蘭問題的權威了。他們笑着敘述有一天晚上，當他在進餐的那家旅館的附近街上有一輛汽車爆破輪胎的時候，他曾如何跳起來縮在一邊，大喊，『布爾雪維克在槍斃犯人了！』而，那些烏克蘭人說，他或許到現在還是那樣相信着的。

下午，我們在依傍第聶伯河邊懸崖建築的那座美麗的公園裏散步。那兒有碩大的古樹，那座被德國人焚毀的露天音樂廳已經重新建立了起來，並且還增加了一座新的舞台。樹叢裏

有保衛該城的戰士的坟墓，墓上青草如茵，墓頂上種着紅花。公園裏有小劇場，裏面的坐椅很多。

俯視下面，河道傍着懸崖轉彎，河對面是一個沙灘，有人躺在陽光裏和在河裏游泳。更遠的地方是一片平原，房屋已在作戰時完全被毀壞，殘留着瓦礫和焦黑的木頭，以及片斷的危牆。紅軍就是從這條路上回來把它從德軍的佔領下解放出來的。

公園裏有一個樂隊在演奏，許多孩子坐在凳子上聽。河上有遊艇和小汽船，還有游泳的人們。

我們走過一座跨越一條公路的小橋，橋下是一個公共汽車站。而在一輛公共汽車前面，正演出着一場我們多久未見的絕妙的婦女拳擊賽。俄國人排隊的規則是不可破壞的。每一個人必須排在行列裏走進電車或公共汽車。這種規則有例外：孕婦、帶小孩的女人、年齡極大的老人、和殘廢者不必排隊。他們可以先進去。但此外，每一個人都必須排隊。我們下面的情形似乎是有一個男人想越到前面去，而一個忿怒的女人正在扯他回去站在他應該站的地方。那個男人固執地佔住位子，而且擠進了公共汽車裏，於是那個女人跟在他後面鑽進去，把他拉出來，強迫他退回到他的行列裡應站的位置上。她非常忿怒，當她把那個男人拖出來站

回到他的位置上時，行列裏其他的人都對她歡呼。這是我們在全部旅程中看到的少數幾件動武的例子之一。在大多數場合，人們互相有着令人難以相信的耐性。

我們在那天夜裏晚餐席上非常疲倦，因為我們睡眠的時間太少了，我們對伏特加的熱情漸漸衰退，直到後來竟一點都沒有了。

我們的主人有許多問題要問我們。他們要知道美國，要知道它的面積，它的農作物，和它的政治。而我們開始明白美國是一個極難說明的國家。美國有許多事情連我們自己都不懂。我們解釋我們的政府原則，說明政府的每一部份有另一部份牽制它。我們嘗試說明我們對獨裁制度的恐懼，說我們恐懼對我們的領袖賦與太大的權力，所以我們的政府，是根據不使任何人有太多的權力或持久保持權力那些原則而設計的。我們承認這使我們的國家行動比較的遲緩，但它顯然可以使它的行動比較確實。

他們問到工資、水活水準、一個勞動者所過的生活，一般人是否都有一輛汽車，他所住的是什麼樣的房子，他的孩子是否上學，以及進什麼樣的學校。

然後他們說到原子彈，他們說，他們並不怕它，史達林曾說原子彈不會應用於戰爭，而他們就絕不置疑地信任了那句話。有一個人說，即使它用起來，它也只能毀壞城市。「我們

的城市已經毀壞了，」他說。「它還能有什麼用呢？假如我們遭侵略，我們就要保衛我們自己，猶如我們對德國人那樣。我們將在雪裏、森林裏、和田野裏保衛我們自己。」

他們談到戰爭顯得很焦急，他們已受夠了戰爭了。他們問道，「美國會攻擊我們嗎？我們在這一一生中還得保衛我們的國家嗎？」

我們說，「不，我們並不以為美國會攻擊人。我們並不知道，誰都沒有對我們說過這些事情，但我們並不以為我國的人民要攻擊任何人。」於是我們就問他們，他們究竟從那兒得來的這個念頭，以為我們會攻擊俄國。

嗯，他們說，他們是從我們的報紙上得到那種觀念的。我們的某些報紙經常說要攻擊俄國：有些報紙談論他們所謂的防阻性戰爭。而他們又說，據他們所知，防阻性戰爭與其它任何戰爭並沒有差別。我們告訴他們說，我們並不相信他們所提及的那些報紙，也不相信那些只談戰爭的專欄作家是美國人民的真正代表。我們不相信美國人民要跟任何人打仗。

於是又引起了那個老問題：「那末你們的政府為什麼管制那些報紙和那些談論戰爭的人呢？」於是我們便得像我們以前解釋過許多次的那樣再解釋一遍，說我們不相信管制報紙的辦法，我們以為真理必勝，管制只會把壞東西驅逐到地下而已。在我們的國家裏，我們

甯願這些人公開談論到死，公開寫文章到死，而不願意把他們圍起來，以致逼迫他們偷偷地在暗中散佈他們的毒素。

他們也有許多對美國誤解的地方，因為他們也有他們的黃色記者。他們也有不探聽清楚就寫報告的記者，他們也有兇猛的打字機戰士。

我們的眼皮沉重下來，最後，我們只得道歉告退去睡覺。我走了很多的路，而我新近跌破的那個膝頭正在磨折我。我背上的肌肉緊張得像繩子一樣。我簡直站都站不穩了。我雖然恨躺下來，却不得不躺一會兒。

在睡覺以前，我們談了一會兒。假如美蘇之間戰爭爆發，這些人就會相信我們是惡人。假如戰爭爆發，則不論是由於宣傳、或恐懼、或不論什麼理由，他們總會責備我們。他們只想到他們的國家受侵略，他們懼怕受侵略，因為他們已經吃夠了侵略的苦頭。他們一再問道，『美國會侵略我們嗎？你們會派你們的轟炸機再來破壞我們嗎？』而他們從來不曾說『我們會派我們的轟炸機』或是『我們會侵略。』

我一早起身，寫完我的筆記。我的腿是這樣的僵硬，以致我們簡直不能用它走路了。我在向街的寫字台前坐下來，看街上來往的人們。街上有一個女警察在指揮交通，她穿着長

靴，一條藍色的褲子，一條白制服，腳間束着一條軍人的皮帶，頭上戴着一頂扁平的小帽子。她的指揮棍漆成黑白兩色，她用一種軍人那樣迅速的行動指揮交通。她長得非常漂亮。

我注意街上行走的女人，她們的行動像在跳舞一樣。她們的腳步輕鬆，姿態美麗。其中有許多長得非常美麗。這些人之所以遭受破壞，大半是因為他們的土地豐饒，引起了許多征服者的垂涎。假如美國從紐約到康薩斯完全被破壞，我們對烏克蘭遭受破壞的區域，才可以得到一個概念。假如不計士兵在內，有佔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六百萬人民被殺，你可以對烏克蘭的死傷有一個概念。把士兵計算在內，死傷的人數當更多，但在四千五百萬平民之中，有六百萬人被殺死了。有些礦穴是永遠不會重開的了，因為德國人把幾萬個屍體拋進了礦穴裏。烏克蘭的機器不是被搬走就是被破壞，所以現在，在新機器未造成以前，一切都得用手來做。這個被毀的城市的一磚一石都得用手來搬走，因為他們沒有碎石機。他們一面重新建設，一面又必須生產糧食，因為烏克蘭是國家的大穀倉。

他們說，收穫的時期是沒有假日的，而現在正是收穫的時期。在農場上，他們沒有星期日，沒有一天休假。

他們前途的工作非常艱鉅。要新造房子，必須先把舊的拆乾淨。一件用手工做須得幾星

期才能完成的工作用碎石機只要幾天就可以完成，但他們沒有碎石機。一切都必須重建，而且必須很快地完成。

我們經過破碎殘廢的市中心，經過那個德國虐待狂者在戰後被吊死的街角。博物館裏陳列着新城市的計劃。我們愈來愈明白俄國人民如何生活在希望上，希望明天可以比今天較好。這兒有一座用白色塑料製成的新城市模型。一座將用白色大理石修築的宏偉富麗的城市，線條典雅，建築物龐大，有圓形的廊柱，圓形的屋頂，拱門，和雄偉的紀念塔，這一切都將用大理石來修築。那座未來城市的塑體模型佔去了一個房間一大部份。博物館裏的指導員指示各種建築物。這是蘇維埃宮，這是博物館——老是有博物館。

卡柏說，博物館是俄國人的教堂。他們似乎很喜歡大廈和富麗的建築。他們喜歡豪華。譬如說，莫斯科沒有要建築摩天樓的理由，因為那兒的空地幾乎是無限的，地面又很平坦，可是他們都在計劃要建造摩天樓，幾乎也像紐約的那種樣子，而卻沒有紐約的需要。憑着一種遲緩的、螞蟻那樣的努力，他們將建造這些城市。但目前，人們穿過廢墟，穿過被破壞了的建築物，人們，男人，女人，甚至小孩子，都到博物館來看壓塑的未來城市。在俄國，人們所想的永遠是未來。他們所想的，是明年農作物的收穫，是那將在十年內到來的舒適，是

那不久就要製成的衣服。假如世界上的確有一個民族從希望中獲得精力的話，那就是俄國人
了。

我們從這個小小的尙未開始建築的塑體新城市轉到懸崖上古老的僧舍。它一度曾是俄國教會的中心，是俄羅斯最古老的宗教建築物之一。它以前非常富麗堂皇，它的建築物和壁畫可以上溯到十二世紀。然後德國人來了，而這座僧舍會藏着許多世界上的寶物。德國人把大部份寶物都偷了去，當他們離開這個城市的時候，他們用炮火毀壞了這些建築物，藉此掩飾他們的偷竊行爲。現在，它成了一大堆崩塌的石塊和破碎的圓形屋頂，僅有一些零落小塊的壁畫供人憑吊。它不會重建，它是不能重建的。它化了幾百年的時間才建造成功，而現在它已經完了。被毀以後，野草已在天井裏長起來。在一座半毀的禮拜堂裏，在那被毀的祭台前，我們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的女人俯伏在地上。一個眼光迷亂，半瘋的女人走過那座一度只有沙皇和他的家屬可以通過的門廊，單調地、啞啞有詞地在她自己的身上劃着十字。

77

僧舍的有一部份還兀立着，那是一座禮拜堂，在一個幾百年的期間內，只有沙皇和貴族可以到那兒去做禮拜。它的牆上滿佈着壁畫，是一個黑暗而陰森的地方。每一個來做禮拜的人都有一張刻着他的名字的小凳子，因爲這是非常高級的教民的地方。天花板上貼着閃閃發

光的金箔，但有一部份已經被香火所燻黑，而我們很容易在腦子裏想像那羣年老的貴族如何，在一個大概像這座教堂同樣陰森的天空下魚貫而入，坐在這裏作陰森的集會。卡柏說，『所有的好教堂都是陰森的。那就是使他們博得一個好字的理由。』

基輔還有一個更古老的教堂，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是『聰明王子』耶羅斯拉夫在一〇三四年的時候建造的，它依舊還兀立着，大概是因為那兒沒有什麼珍貴的東西可偷，所以德國人放過了它。但它也是一個高大陰森的地方。

在側邊的一座小教堂裏，在一具像小房子那樣的石棺裏，藏着『聰明王子』耶羅斯拉夫的屍體。據傳說，耶羅斯拉夫曾在戰爭中遭遇意外，折斷了他的腿。一千多年來，他的屍體始終躺在那具像小房子似的石棺裏，最近開棺檢視，發覺棺材裏的骸骨的確有一條折斷的腿，於是大家都很歡喜，因為這是真正的『聰明王子』耶羅斯拉夫了。那座教堂的陰森氣氛使我們的心境也陰森起來了。

午餐時，波塔拉士基先生談及德國人在戰時的行爲，談及千萬人民的被殺。戰爭對基輔不是新奇的事情，自從開始被韃靼野蠻民族的襲擊那個時候起，這個地方幾千年來就是爭伐之地。但沒有那個野蠻部落，沒有那一個侵略者可以比擬德國人那種愚蠢和胸有成竹的殘暴

行爲。他們像癡狂殘忍的小孩子似地在全國爛施破壞。現在，一長列穿着德國陸軍制服的俘虜穿過街道，清理他們自己造成的破壞。烏克蘭人民是不看他們的。當那些縱隊在街上經過的時候，他們就掉頭他顧。他們望這些俘虜後面的東西，望他們頭上的東西，但却不望他們。這或許就是對他們可能施行的最壞的懲罰了。

晚上，我們去看話劇『大雷雨』。那是一個用十九世紀的方式所表演的十九世紀的戲劇。佈景是古雅舊式的，表演方法也是舊式的。演出這個戲劇實在有點古怪，但它是一個烏克蘭戲劇，而他們愛他們自己的東西。女主角非常美麗。她看上有些像凱塞琳·康妮爾，在話劇界有很大的聲名。故事的内容是講一個在兇惡的俄羅斯人婆婆之下過生活的年青的妻子和一個詩人發生了戀愛。她雖然嫁給了另一個人，却依舊到花園裏去和詩人相會。我們所能看見的是：她在花園裏講了很多話，有一次讓那個詩人吻了一下她的手指尖，但這已經是夠大的罪名了，所以她終於在一座教堂裏承認她所犯的罪，投身到伏爾加河裏自殺。在我們看來，讓人吻一吻她的手指尖就受到這樣的懲罰，似乎太過份了。那個劇本還有一個附帶的劇情。劇中的婢女竟也喜劇地與她的女主人是同樣的悲劇。但她的愛人不是一個詩人，而是一個鄉下蠢夫。它是一個傳統的戲劇，觀眾很愛看。換一場佈置要化半個鐘頭，所以當那位女主角

最後投河自殺的時候，已經過了午夜了。看這個戲劇的觀衆會知道真正的悲劇，知道侵略、死亡、和絕望的悲劇，而他們竟會對一個在花園裏被人吻手指尖的貴婦人的命運這樣的感動，在我們看來似乎有點奇怪。

第二天早晨下雨，卡柏覺得雨是上天對他的一種迫害，因為當下午的時候，他就不能拍照片了。他用四五種方言責備天氣。卡柏在拍照相這件事上是一個多憂的人。或是光線不足，或是光線太強。沖洗不對，晒片不對，攝影機破了。他永遠是憂慮的。但當下雨的時候，那是老天對他個人的一種侮辱。他在房間裏踱個不停，直到我想殺死他，最後他去理了一次髮，一次真正烏克蘭式的鍋蓋形髮。

那天晚上我們去看馬戲。每一個路具規模的俄國市鎮都在一座永久性的建築物裏有它永久性的馬戲場。但是，當然囉，德國人焚毀了基輔的馬戲場，所以它現在只能在帳篷底下演出，但它依舊是全城最得人歡心的地方之一。我們得到很好的位置，卡柏已得到允許可以拍照，所以他比較快樂了一些。它不像我國的馬戲場，只是中央一個圓圈，四週密排座位。

開始的項目是走繩索和翻樞千。我們看出當演員在高空翻樞千的時候，他們的腰帶上綁着一隻鈎子和一條繩子，所以即使他們掉下來，也不會摔死或受傷，因為，我們的俄國主人

說，僅僅爲了使觀衆感到一陣刺激興奮而傷害一個人，那就未免太荒唐了。

漂亮的姑娘和英勇的男子在高高的繩索和秋千上表演了翻身打跟斗。接着是狗表演，和推出關在鐵籠裏的老虎和豹子到圓圈中央來表演。觀衆很愛看，每隔一個時候，馬戲團的樂隊便吹奏一次永不改變、全球一律的馬戲團音樂。

最妙的是丑角。當他們初進來的時候，我們注意到觀衆在向我們望，而我們不久就找出了其中的原因。他們現在的小丑必定是美國人。其中有一個是一個芝加哥的富婦，而俄國人所想出來的一個芝加哥富婦的樣子簡直妙極了。觀衆都等着看我們對這種諷刺是否會惱怒，但它實在非常有趣。而正如我國的某些丑角蓄着長長的黑鬍子、拿着炸彈、標稱爲俄國人那樣，俄國的丑角也標稱他們自己是美國人，觀衆開心地笑着。那個芝加哥富婦穿着紅色的長統絲襪和滿綴着水鑽的高跟皮鞋，頭戴一頂滑稽的反邊帽，身穿一件像是走了樣的睡衣那樣的晚禮服，她扭扭捏捏地在圈子裏走來走去，她那人工裝出來的肚子不住地震顫着，而她的丈夫則裝腔作勢地跳來跳去，因爲他是一個芝加哥有錢的百萬富翁。那些笑話一定是非常有趣的，因爲我們雖然聽不懂，但觀衆却常常哄堂大笑。他們似乎很高興與我們不會對小丑表示反感。芝加哥有錢的美國人那一幕完畢以後，小丑就表演狄斯第摩那「譯者按，狄斯第摩那

是莎士比亞奧賽羅一劇中的奧賽羅之妻——之妻。那一幕表演得非常有趣，狄斯第摩那不曾被絞死，但却被一把橡皮刀幾乎打死。

這是一個很好的馬戲團。坐在前排的孩子們像其他任何地方的孩子們那樣沉浸在馬戲團的夢想裏。這一隊人馬是永久性的，他們不到各處走動，馬戲團長年開演，只有在夏季停歇一個短時間。

雨停住了，所以在看過馬戲以後，我們就到一個名叫麗維泰的基輔夜總會去。它位於臨河的懸崖上，有一個四周圍着桌子的露天跳舞廳，從這裏可以俯視到那在平原上蜿蜒着的第聶伯河全景。食物好極了，有不可避免的魚子醬和喬其亞來的葡萄酒。使我們大為輕鬆的是：樂隊演奏俄羅斯樂曲、烏克蘭樂曲，和喬其亞樂曲，而並不演奏蹩腳的美國爵士音樂。他們演奏得非常好。

與我們同桌的，有烏克蘭的名劇作家亞歷山大·高尼諾克，一個很可愛和很富幽默感的人。他和波塔拉士基開始講烏克蘭的諺語。我們百聽不厭的，是『最好的鳥就是香腸』那則故事。後來高尼諾克講了一件事情，而我始終相信那則諺語發源於加里福尼亞的。那則諺語描寫一個大食者對火雞的判斷，他說，『火雞是一種令人不滿的鳥，一個人吃嫌它略微多了

一點，兩個人吃又不夠。」這則諺語烏克蘭人顯然已傳說了幾百年，但我以為它是在我的故鄉發明的。

他們教我們一種烏克蘭人祝杯時所說的話：『讓我們爲使家裏的人快樂而乾杯。』然後他們又爲和平祝杯——老是離不了和平。這兩個人都會當過兵，他們都會受過傷，而他們爲和平而乾杯。

然後，那會到美國去過一次的高尼諾克相當傷心地說，他曾去遊過海德公園，他在那兒曾看到羅斯福和邱吉爾合攝的照片或看到羅斯福和戴高樂合攝的照片，但在那兒却看不到羅斯福和史達林合攝的照片。他們，他們曾經會過面，他們曾經一同工作過，爲什麼海德公園裏要搬走他們的照片呢？

音樂愈奏愈快，跳舞的人也愈來愈多，彩色燈火射到地板上，在遠遠的下面，河水反映着城市之光。

兩個俄國軍人同跳了一曲狂舞，一曲蹺腳揮手的舞，一曲戰線上的舞。他們發瘋似地跳着，紅色和棕色和藍色的燈光瀉注在舞池上。

83
樂隊奏出一隻熱烈的喬其亞譜曲，有一張桌子上站出一個女郎，獨自舞蹈起來。她跳得

很美，當她在跳的時候，舞池裏再沒有第二個人。漸漸地，有幾個人開始隨着音樂的節奏擊起拍來，然後擊掌的人更多了，最後，全場以一片柔和的擊掌伴奏她的舞蹈。當音樂停止的時候，她回到她的桌子上，並沒有人鼓掌。這不是表演，她只是想跳而已。

隨着柔和的音樂，柔和的燈光，和下面平靜的河水，我們的朋友們又開始談起戰爭來，像是戰爭在追逐着他們，永遠無法使它遠離似的。他們談到史達林格勒城前可怕的寒冷，談到他們會躺在那兒的雪地裏，不知事情會如何結束。他們談到那些他們不能忘記的可怕的事情。談到有一個人如何在他那新死的朋友的血液裏溫暖他的手，以便他可以扳動槍機。

一位詩人到我們的桌子上來，他說，『我有一位岳母，當戰爭蔓延到羅斯托夫的時候，她不肯離開，因為她有一塊她非常寶貴的東方地氈。』他又說，『我們撤退了，我們打完了整個戰爭，我們回到羅斯托夫去。我到她的地方去，而她依舊還在那兒，那張東方地氈也還在那兒。』

『你知道，』他說，『當一支軍隊進入一個城市的時候，總要發生許多意外，許多人是被誤殺的。當我去看我的岳母的時候，她出來開門，我的腦子裏忽然閃出一個念頭，爲什麼她現在不會遭遇到一次意外呢？爲什麼我的槍不誤觸走火呢？』然後他結束道，『那種事情

並沒有發生。而我到現在還在奇怪爲什麼竟沒有發生。」

卡柏已把他的攝影機架在那座小天棚的頂上；他在拍攝跳舞的人，他很快樂。樂隊奏出高尼諾克的一個劇本裏的一支哀傷的歌曲。它是波羅的海水兵的歌。當他們要退的時候，他們炸沉了他們的船，這是哀悼他們那些沉沒的船隻的輓歌，一首哀傷淒涼的歌曲。

第五章

早晨，我們望一望日曆，日曆上是八月九日。我們到蘇聯才只有九天。但我們所得到的印象和所看到的東西是這樣的多，以致我們覺得似乎遠不止來了這樣幾天。

卡柏早晨醒來的動作緩慢而細緻，像一隻蝴蝶從它的蛹裏爬出來似的。在他醒後的一小時內，他目瞪口呆、默默無言地坐的，既非醒着也非睡着。我的問題是要不使他拿了一本書或一張報紙到浴室裏去，因為他一到浴室裏，便至少又要一個鐘頭。我開始每天早晨要為準備三個用智力的問題，關於社會學、歷史、哲學、和生物學的問題，總之，所提出的問題應該可以震醒他的頭腦，使他知道白天已經來了。

在實驗的第一天，我問了他下面這幾個問題：那一位希臘悲劇的作家曾參加過薩拉密斯之戰？一隻昆蟲有幾條腿，最後一個問題是，收集喬其亞民歌的那位教皇叫什麼名字？卡柏帶着一種痛苦的臉色從床上跳起來，向窗口凝視了一會兒，然後拿着一份他看不懂的俄國報

紙衝進到浴室裏去。而他一去就去了個半鐘頭。

接連兩三個星期，我每天早晨都爲他準備問題，而他一個都答不出。但他白天大部份時間却自言自語地唸着那些問題，而他痛苦地抱怨說，一想到早晨的問題，他就睡不着覺。但是，他睡不着覺那句話，除了他口頭這樣說以外，却沒有事實的證據。他宣稱我的問題在他頭腦裏所造成的恐怖已使他在智力上倒退了四十年，或是，粗粗地計算，已使他的年齡成爲負十歲。

卡柏在莫斯科偷了幾本書帶來，三本是偵探小說，一本『馬克沁·高爾基劄記』，一本『海市蜃樓』，和一本『一九二七年美國農業部報告書』。在我們離開俄國以前，這些書都還了給人，但我可以很確定地說，它們並沒有還給它們的主人。

這一天，八月九日，我們去拜訪一個名叫希夫欽柯的農村。我們此後將它稱爲希夫欽柯第一，因爲我們後來所訪的另一個農村也叫做希夫欽柯，它們都是爲了紀念一個心愛的烏克蘭民族詩人命名的。

我們所走的那條公路最初的幾哩是很平整的，然後我們向右轉彎，順着一條污穢、破碎的道路前進。我們穿過幾座松林和一片曾經發生過惡戰的平原。到處可以看到戰爭的遺跡。

松樹被機關槍火力掃射得拆裂零落。遍地是戰壕和機關槍障地，甚至公路本身也被坦克車的輪跡輾得歪歪斜斜，被炮彈轟成一個一個的小坑。四處偃臥着發鏽的軍用品的碎片、焚毀的坦克車、和破爛的貨車。這個地方曾在堅強抵抗以後陷落，反攻的進展很緩遲，是一吋一吋地打回來的。

希夫欽柯第一決不是最好的農村，因為它的土地不算頭等肥沃，但在戰前，它是一個相當繁榮的村莊，村裏有三百六十二座房屋，換一句話說，有三百六十二個家庭。它是一個很過得去的地方。

德國人來過以後，村裏只剩了八幢房子，而甚至那八幢房子，屋頂也已焚毀。人們流離四散，被殺的很多，男子避到森林裏作遊擊隊，而天知道那些孩子們是怎樣照顧他們自己的。

但戰爭結束以後，人們回到他們的村莊上來了。新房子像雨後春筍似的茁長起來，而由於現在是收穫時期，所以建屋工作只能在工作前後偷空進行，甚至在夜裏，憑藉風燈的光，男人和女人合力築造他們的小房子。方法是千遍一律的：他們先蓋好一個房間，住到那個房間裏面，然後再蓋其餘的部份。由於烏克蘭的冬天非常寒冷，所以房屋是這樣建築的：牆壁

是砍成方形的粗木條四角接榫搭成的。在這些木條上面，釘上很厚的板條，然後牆壁內外再塗上厚厚的泥灰，藉此抵擋嚴寒。

一進門就是一間廳堂，那間廳堂兼充貯藏室和過道。從廳堂向後走是廚房，那是一個石灰粉飾過的房間，有一座磚塊砌成的烘爐和一座灶供烹調之用。烘爐離地四呎高，麵包就是那兒烘烤出來的，是那種扁平的棕色的烏克蘭麵包，味道非常好。

廚房隔壁是起居室，裏面擺着餐桌，牆上掛着裝飾品。這也就是客廳，房間裏有紙花、聖像、和死者的照片。牆壁上掛着這個家庭出征軍人的勳章。牆壁是白色的，窗口裝有百葉窗，以備抵禦冬季的寒冷。

與這個房間相連的是一兩間寢室，寢室的多少視家庭大小而定。而由於這些人已喪失了一切，所以床上的鋪蓋他們能有什麼就用什麼。破地氈，羊皮，只要是能夠使他們保持溫暖的東西都行。烏克蘭人是一個愛清潔的民族，他們的房屋是纖塵不染的。

89

我們以前曾聽到過一種錯誤的消息，說是集體農場的人是住在像兵營那樣的宿舍裏的。這是不確實的。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座房子，一座花園，和一座菓園，每一家人可以自己種花，種蔬菜，和養蜂。花園的面積大約是一英畝左右。由於德國人毀壞了所有的菓樹，所以

他們已培植了新的樹本，有蘋果樹，桃樹，和梅樹。

我們首先去拜訪村公所，那兒歡迎我們的，有農場經理，他的會計員，和農會的三個老人。農場經理在作戰中喪失了一條手臂，他的會計員是剛才從陸軍裏復員回來的，依舊還穿着他的制服。我們告訴他們說，我們知道他們在收穫的期間是很忙的，但我們想親自看一看收穫的情形。

他們告訴我們以前的情形如何，現在的情形又如何。當德國人到來的時候，這個農場有七百頭成年的牲畜，而現在把老老小小都算在一起，也只有二百頭了。他們以前有兩架大汽油引擎，二輛貨車，三架曳引機，兩架打麥機。而現在他們只有一架小汽油引擎和一架小打麥機。他們自己沒有曳引機。在耕耘的時候，他們得從附近的曳引機站去借一架。他們以前有四十四匹馬，現在只有四匹馬。

全村損失了五十個作戰年齡的男子和五十個其他各種年齡的男女，還有許多人成了殘廢者。有些兒童沒有了腿，有些沒有了眼睛。但村裏對勞動力的需要是這樣的迫切，以致他們正在嘗試使每一個人都做他能夠做的工作。所有殘廢而還能工作的人都參加了工作，這使他們感到自己的重要性，使他們感到自己在農場生活裏有着一種地位，所以殘廢者之中極少有

精神病人。

他們不是抑鬱的人。他們之間充滿了笑聲，笑話，和歌唱。

農場出產一部份小麥，一部份粟米，和一部份玉蜀黍。但它是一片土質很鬆的沙地，所以它的主要農作物是胡瓜，洋芋，番茄，蜂蜜，和向日葵。他們所用的油大半是蔡花子油。

我們首先去看那一片有婦女和兒童在收割胡瓜的田地。她們分成幾隊，互相競爭，每一隊都想造成最大的收割量。她們穿着長裙短襖，頭包頭巾，而沒有一個人穿鞋子，因為鞋子依舊是很寶貴的東西，捨不得在田裏穿的。孩子們只穿褲子，他們的小身體已在夏季的太陽下變成棕褐色。田邊有成堆的胡瓜等待貨車來裝運。

一個名叫格里斯卡、戴着一頂用錦葵桿編成的好玩的小男孩子奔到他的母親那兒，嘴裏奇怪的喊道：『但這些美國人也是像我們一樣的人呀！』

卡柏的攝影機造成了一種轟動情緒。女人們吆喝他，然後綁好她們的頭巾，理一理她們的衣服，正像世界上其他各地的女人在拍照以前一個樣子。

那裏有一個善於面部表情和善於大笑的女人。卡柏選中了她拍照。她是這個村莊的智囊。她說，『我不但是一個偉大的勞動者，而且還做了兩次寡婦，許多男人現在都怕我了。』

於是她把一個胡瓜在卡柏的鏡頭前面搖來搖去。

卡柏就說，『或許你現在喜歡嫁給我吧？』

她仰頭大笑起來。『現在嫁給你，瞧！』她說。『假如上帝在創造男人以前先和這隻胡瓜商量一下，世界上不開心的女人就可以少得多了。』整個田野都對卡柏大笑起來。

她們是生氣勃勃和友善的人，她們使我們嘗嘗胡瓜和番茄的味道。胡瓜是一種重要的菜蔬。用鹽一醃，整個冬季都要用它。青番茄也用鹽醃，而這些東西就是人們當寒冷和冰雪到來時的生菜。這兩樣東西再加上椰菜和蕪菁，就是冬季的蔬菜。那些女人雖然又說又笑，與我們招呼，但却並沒有停止工作，因為今年是一個豐年，收穫比去年好百分之七十，是一九四一年以來第一個真正的豐年，她們對它寄托着很大的希望。

我們轉到一片花園上，那兒有幾百隻蜂房和一頂養蜂者所住的小篷帳。空氣裏充滿着那些在翹搖花園裏工作的蜜蜂的柔和的嗡嗡聲。那個有鬍子的養蜂老人急忙向我們走過來，給我們的臉上罩上網。我們戴上面網，把雙手插在口袋裏。蜜蜂忿怒地對我們嗡嗡作聲。

養蜂老人打開他的蜂房，給我們看蜂蜜。他說他已做了三十年的養蜂者，而他非常以此自傲。許多年來，他雖然養蜂，但關於蜜蜂的知識却知道得並不多。但現在他在閱讀和研究

了。他有一個大寶藏，他有六頭新蜂后。他說它們是從加里福尼亞來的。而我根據他的描寫來判斷，知道它們是意大利黑蜂的一種加里福尼亞變種。他說他非常歡喜他的新蜂。他說它們對霜的抵抗力較強，每季工作的時間較長。

然後他帶我們到他那座小篷帳裏，關上帳門，切下大片美味的烏克蘭燕麥酸麵包，把蜂蜜塗在上面，給我們吃。後來他再打開他的蜂箱，像大多數養蜂者那樣毫不恐懼地用手撈出成群的蜜蜂。但他警告我們不要除掉面網，因為蜜蜂是不喜歡生人的。

我們從那兒走到打麥場。設備缺乏得可憐。那兒只有一架陳舊的單汽缸汽油引擎在轉動一架古老的打麥機，他們的風箱是用手轉動的。這兒，我們又注意到了男子的缺乏。女人的數目比男人超出那樣多，而在那兒的男人中，又有這樣多的殘廢者。管理那架汽油引擎的工程師，一隻手上的手指全部沒有了。

由於地質不十分好，所以小麥的產量不富。從打麥機裏傾瀉出來的麥粒傾注到一隻大帆布口袋裏。孩子們駐守在帆布口袋旁邊，所以假如有任何麥粒碰巧跳出來掉到塵堆裏，就可以再捉它回去，因為每一粒麥子都是寶貴的。整個早晨，雲層都在堆積，現在已開始有稀稀朗朗的雨點下來。人們拿着油布衝上來遮在麥堆上。

幾個男人在爭論着一件事情，波塔拉士基輕輕地翻譯給我們聽。他們似乎是在爭論應該由誰邀請我們去用午膳。有一個人有一張較大的桌子，另一個人的太太在那天早晨烤了麵包。有一個人宣稱他的房子剛才完工，是新房子，所以他應該做主人。他們就這樣同意了。但這個人的餐具不多。其餘的人應該捐助玻璃杯、菜碟、和木匙羹。這件事情決定以後，他家裏的女人就撩起她們的裙裾，奔回到村裏去了。

我們從俄國回來以後，我們最常聽見的一句話就是「我想他們是這樣子給你們看的；我想他們實在預先安排好了的。他們並沒有給你們看真正的東西。」這個村裏的人的確爲我們安排了一番。他們就像一個康薩斯州的農民招待賓客那樣的安排。我國的人民也曾做着與他們同樣的事情，以致歐洲人說，「美國人是吃鷄過活的。」

他們的確爲我們安排了一番。他們從田野裏回來的時候是塵土滿身，他們洗了澡，穿上他們最好的衣服，女人從箱子裏拿出清潔的頭巾。他們洗了腳，穿上鞋子，換上新漿洗的襯衫和短襪。小姑娘採了一些花，插在瓶子裏，拿到清潔的客廳裏來。其他屋子裏的兒童代表拿來了玻璃杯、餐碟、和匙羹。一個女人拿來了她一瓶她特製的醃菜，全村的伏特加瓶都捐獻了出來。有一個男人還帶來一瓶喬其亞香檳酒，那是他爲着天知道的大事情珍藏着的。

在廚房裏，女人們也安排了一番。白色的新灶裏生起融融的爐火，扁平形的美味燕麥麵包正在烘焙，鷄蛋在鍋子裏煎，濃湯撲撲地滾。屋外大雨傾盆，所以我們並不感覺抱歉，因為我們並沒有打擾他們收穫時期的工作，他們反正是不能打麥子的了。

在那間兼充起居室的客廳一角，掛着一幅聖像，是一幅聖瑪利亞抱耶穌的像，裝在金邊的像框裏，像框上還罩着一幅手工繡花的白巾。德國人來的時候，他們一定是把這些東西埋在地下的，因為那幅聖像已很陳舊。牆上還有一幅放大着色的祖先像。這個家庭有兩個兒子參加陸軍戰死，他們的像片掛在一面牆上。他們穿着制服，看上去非常年青，非常嚴肅，非常鄉氣。

幾個男子走進客廳裏來，他們穿着很整潔的衣服，已經洗過澡，刮過鬍子，他們已穿上皮鞋。在田裏的時候，他們是不穿鞋子的。

男主人年約五十左右，有高聳的體骨，金黃的頭髮，和藍色的大眼睛。他滿面風霜，穿着束腰的短襖，綁着遊擊戰士的闊皮帶。他的臉孔繃得很緊，像是身上的一部份受了重傷似的。

95
最後，菜饌齊備了。烏克蘭濃湯——光是這隻湯就可以當一頓——、油煎荷包蛋、鹹肉

、新鮮番茄、新鮮胡瓜、洋葱片、熱騰騰的熱麥甜餅、蜂蜜、水果、香腸，一切都同時放到桌子上。然後男主人把胡椒伏特加斟滿玻璃杯，那種伏特加裏會浸有胡椒子，所以吃起來有點麻辣辣的味道。然後他叫他的妻子和他的兩個寡孀媳婦來入席，給他們一杯伏特加。

那個家庭的女主人首先祝杯。她說，「願上帝賜福給你們。」我們都對她乾杯。我們狼吞虎嚥地吃，味道非常好。

我們的男主人建議一種我們開始非常熟悉的祝杯——為全世界人民的和平而祝杯。奇怪得很，他們很少有恭祝私人小事的乾杯。他們祝杯的口彩通常總要比個人的前途範圍大一些。我們恭祝他們全家康健和農場繁榮。桌子末端的一個大個子站起來，為紀念羅斯福而乾了一杯。

我們開始懂得世界各地紀念羅斯福的性質和他逝世的悲劇意義了。我想起了有一次聽到的一個故事。林肯去世不到一星期，他的噩耗甚至已深入到非洲中部，有時用鼓聲來傳達那個消息，有時用接力賽跑來傳遞。消息傳播開來，說是一次世界悲劇已經發生了。我們覺得不論那些恨羅斯福的人怎麼想或怎麼說，甚至不論羅斯福實在也是一個血肉之軀，總之，他的名字已在全世界成爲一個智慧、慈愛、和理解的象徵。在全世界各地小百姓的頭腦裏，他

已不再是一個人而成了一種主義。那些現在攻擊他的爲人、攻擊人們對他的紀念的人，不但根本不能傷害他的聲名，而只會標明他們自己的卑賤、貪婪、自私、和愚蠢而已。羅斯福的聲名決不是那些褊狹的頭腦和污穢的手所能傷害的。

午餐用畢以後，就來了我們開始預期的時間。就是提出問題的時間。但這一次，我們覺得比較有趣，因爲那是農民問及農民和農場的問題。我們又明白各國人民之間互相有着一種籠統的觀念。像「一個農民在美國過怎樣的生活」這種問題是無法回答的。那得看他所有的是怎麼樣的農場，而且在什麼地方而定。我國的人民要想像俄國是怎麼樣的一個國家也是很困難的，因爲那兒有着從北極到熱帶的各種氣候，有許多種不同的人種和語言。

這些農民甚至連俄羅斯話都不會說，他們是說烏克蘭話的。他們問道：「一個農民在美國過怎樣的生活？」我們嘗試解釋道，正如俄國一樣，美國也有許多種類不同的農場。那兒有只用一頭驢子耕種的五畝大的小農場，那兒也有很大的合作農場，它們的經營方法像俄國的國營農場一樣，只是它們不是屬於國家所有的。那兒也有像這個村莊這樣的農村社會，那兒的社交生活也跟這兒差不多，只是那兒的土地却不是公有的。美國一百畝上好的低地可以抵得上一千畝壞地。這一點他們是懂得很清楚的，因爲他們本身也是農民。他們只是從未

想到美國也會那個樣子。

他們想聽一些美國農業機器的消息，因為那是他們最需要的東西。他們問及播種機、採棉機、和澆肥機；問及新農作物、禦寒穀物、和拒腐小麥的發展；問及曳引機的價錢。一個經營一片小農場的人是否能買得起一架？

坐在桌子末端的那個農民驕傲地告訴我們蘇聯政府如何借錢給農場，如何以極低的利息借錢給那些想在他們的農場上造房子的人。他講述蘇聯政府如何供給農業消息。

我們說，美國也有這種同樣的事情，而這是他們從來不曾聽到過的事情。他們從來不曾聽到過我國農業部的農貨或其它重要工作。這在他們都是消息。事實上，他們似乎以為那種制度是他們自己發明的？

大路對面，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正在冒雨工作，把搭屋頂的木材搬到他們新築成的牆壁頂上去。大路上，孩子們正在驅牛從牧場上回來。

包着潔淨的頭巾的女人們從廚房門裏探頭出來聽我們的談話。談話轉到外交政策上。問題很尖銳。

一個農民問道，『假如蘇聯政府貸款並且以軍事援助給墨西哥，公然聲言以阻止西方民

主政治的發展爲目的，美國政府怎麼辦？」

我們想了一會兒，然後說，『嗯，據我們的猜想，我們會宣戰。』

於是他說，『但你們却貸款給我們鄰境的土耳其，以阻止我們的制度發展爲目標。而我們並沒有宣戰。』

於是我們的男主人說，『據我們看來，美國人民似乎是民主的人民。你可能向我們解釋，爲什麼你們的政府要跟反動政府做朋友，例如佛朗哥，土耳其的軍事獨裁者杜魯其羅，和希臘腐敗的君主政體？』

我們不能回答他們的問題，因爲我們知道不夠清楚，同時也因爲我們並不信任我們外交政策的決定者。所以我們並不正面作答，却告訴他們一些美國人所問的問題：關於共黨控制東歐的問題；關於蘇聯在聯合國使用否決權的問題；以及關於蘇聯報紙責斥美國的問題。

96

這些事情似乎相抵銷了——他們對他們的外交政策，並不比我們對我們的外交政策知道得更多。他們的問題裏並無敵意，只是有些奇怪。最後，我們的男主人站起來，舉起他的玻璃杯，說，『這種種之中，必定有一個答案，而且必定很快地就有一個答案。讓我們爲希望獲得那個答案而乾杯，因爲世界需要和平，非常迫切地需要和平。』於是指着那兩個拚命扛

着那條笨重的屋樑在搭屋頂的人說，「自從一九四二年以來，這兩個人直到今年冬天才有一所房子住。他們必須得有和平，他們要他們的房子。他們有三個小孩子，那三個小孩子一生從來不會住過房子。世界上不能有這樣壞的人竟要把他們再推回到地洞裏去。但他們的確是一向住在地洞裏的。」

男主人打開那瓶香檳，在我們每只杯子裏斟一點那種寶貴的流質。席上變得非常肅靜。我們舉起我們的杯子，誰都沒有說祝杯的話。我們無言地喝了香檳。過了一會兒，我們謝謝我們的主人，驅車離開那個傷痕斑斑的鄉村。我們懷疑我們的男主人說得究竟是否對，世界上究竟是否真的有人要再毀壞這些新造的小房子，把孩子們趕回到地洞裏去。

第二天早晨，我們起得很遲，當我們醒來的時候，我們把那天到農場去的事情討論了一下，卡柏取出他攝好的軟片。我們應邀到亞歷山大·高尼諾克的家裏去午餐。他的妻子文姐·華塞麗絲喀是一個波蘭女詩人，在美國也小有聲名。他們住在一座令人愉快的房子裏，房子後面有一座大花園。午餐設在一架大葡萄棚蔭蔽下的門廊上。門廊後面是一塊方形的花園，種着玫瑰和花朵盛開的樹木，花園的後面是一個極大的菜園。

午餐是文妲·華塞麗絲略準備的。味道很美，數量很多。一道茄子魚子醬，一條第聶伯河裏捉來用番茄汁煮的魚，味道很古怪的蛋餃，還有一瓶顏色發黃而非常香美的陳年伏特加。然後來了味濃的清燉鷄湯，和油炸鷄。油炸鷄很像我們南方的油炸鷄，只是他們先拿雞塊在麵包屑裏醃一醃以後再入鍋。然後又來了餅，咖啡，和利口酒，最後，高尼諾克拿出裝在鉛質煙盒裏的烏潑曼雪茄煙。

這是一頓美麗的午餐。太陽光很溫暖，花園很可愛。當我們坐着抽雪茄和喝利口酒的時候，談話轉到了對蘇關係上。高尼諾克曾參加一個文化代表團到美國去。他們到紐約的時候，他和他的代表團都得蓋手指印，以外國間諜的身份登記。蓋指印這個舉動激怒了他們，他們不再作那次訪問就回國了。因為，高尼諾克說，『在我們，蓋指印只是對付罪犯的。我們並沒有要你們蓋指印，也沒有要你們拍照，強迫你們登記。』

我們嘗試解釋道，根據我國的規則，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或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都是政府的雇員，而所有外國政府的雇員是都要登記的。

而他答道，『英國有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而你們却並沒有要每一個英國人都登記，也沒有要他們蓋指印。』

由於高尼諾克和波塔拉士基都當過兵，我們就問這一帶的作戰情形。於是波塔拉士基講了一件使人很難忘記的事情。他說，有一次，他和一個俄羅斯哨兵受命去襲擊一個德國哨兵。他說，他們化了很多時間才到達那兒，而雪是這樣的深，天氣是這樣的嚴寒，以致最後當他們發動攻擊的時候，他們的手、手臂、和腿都已經凍僵了。

「我們沒有東西可以作戰，只有一樣，」他說。「那就是我們的牙齒。我事後曾夢見到那件事情。可怕極了。」

午餐以後，我們去到河邊，租了一艘小汽艇，在基輔的懸崖底下巡遊了一會兒，然後駛向對河平淺的沙灘。沙灘上有成千成百的人在那兒洗澡和躺在太陽底下。有些人帶着全家大小穿着花花綠綠的遊游衣躺在白色的沙灘上曬太陽。河上有許多小帆船在折來折去地行駛。也有滿載着人的遊艇。

我們脫掉衣服，跳出船邊，穿着短褲背心在汽船四週游泳。河水很暖，令人愉快。那天是星期天，大家都非常高興。懸崖上的花園裏和城裏都有人羣擁去。樂隊在懸崖頂上的音樂台裏演奏着樂曲。許多青年男女成雙成對地挽着手臂在河邊散步。

傍晚，我們回到懸崖上麗維拉露天舞廳，我們注視夜色漸漸籠罩住那一望無際的烏克蘭

平原，籠罩住那蜿蜒而去的銀色河流。

這天晚上跳舞的人多了許多，因為那是星期天。有些人跳得幾乎像職業舞蹈家那樣美妙。樂隊照常奏出它的吉卜賽曲、喬其亞曲、俄羅斯曲、猶太曲、烏克蘭曲。爲了對我們表示歡迎，他們演奏了一曲『我已懷春』，奏得雜亂無章，直到它過去了三分之二，我們才辨認出來。但他們演奏得很賣力。

露天舞池的四週圍着一圈茂密的有花的矮樹。在這道藩籬的一個小洞裏，躲着一個小孩子——一個小乞兒。他會從他的花洞裏爬出來，走到桌子面前來討一些零碎錢去看電影。

經理走過來說，『他是我們這兒最經常的顧客，他非常有錢。』

他溫和地趕走了那個孩子，但經理一走開，他就又回來討錢去看電影了。

夜總會裏的人愈來愈多，它已經很擁擠。約摸在十點鐘的時候，發生了一場毆鬥，一場發生在一羣青年人中間的橫衝直撞的毆鬥。但這場毆鬥不是爲了爭一位姑娘。它是爲了足球比賽。足球在烏克蘭人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基輔人對他們足球隊的情感，正如我們布洛克林的小伙子對他們的捧球隊同樣的強烈。那場毆鬥在舞池裏泛濫了一會兒，然後那件事情解決了，每一個人到一張桌子上去喝一杯酒，問題就此解決。

我們穿過花園步行回去。許多人還坐在那兒聽樂隊演奏。卡柏哀求我明天早晨不要再問他任何問題。

這兒有一種制度可以值得我們採用。在旅館和餐室裏，在顯明觸目的地方，有一本連着一支鉛筆的『抱怨簿』，不論你對服務、管理、或設備有任何可抱怨的事情，你都可以寫在上面，而且你不必簽名。每隔一個時候，一位視察員便會來巡視各餐館和各公共服務場所，假如有足夠的抱怨反對任何個人，或反對經理、或反對服務，就得加以調整。一次抱怨不會受到很嚴重的注意。但假如同樣的抱怨接連發現，那就很嚴重了。

蘇聯還有一種簿子，我們覺得有點可怕。那就是印象簿。不論你去參觀一家工廠、一座博物館、一次藝術展覽會、一家麵包廠、或甚至一個建築計劃，那兒必然有一本印象簿要你寫下你對所見到的東西的意見。照一般的情形，當你拿到那本印象簿的時候，你還不會認清你所見到的東西。它顯然是一本等候人恭維的簿子，假如所寫的話和所記下的印象不是恭維性的，就會使他們大感驚奇。印象這個東西，至少以我個人而論，是需要一點時間來培養的。它不是立刻就可以長成的。

我們應邀去參觀另一個農場，那個農場的土地比我們上次所見的那一個肥沃，德國人的

破壞也沒有那樣利害。第二天早晨，我們就循着與上次那個農場去的方向從基輔出發。我們的汽車是一輛戰前的蔡斯。在我們乘用他的期間，它是愈來愈衰老了。它的彈簧已不再有多大彈性，它的齒輪格格地作響，它屁股後面的洩氣管像一頭垂死的狼那樣的咆哮。

我們對我們的司機已發生了興趣。在蘇聯的汽車夫，決不是一種僕人的工作，而是一種報酬很好而尊嚴的職業。司機都是懂得機械的人，他們幾乎都當過軍人——不是坦克車就是飛機駕駛員。我們在基輔的那位司機是一個很嚴肅的人，他像看護一個小孩子似地看護他那輛垂死的車子。莫斯科還不曾有一輛新車子到來，誰都不知道它們什麼時候才可以來。每一輛可以轉動的車子都得繼續使用，雖然它們本來是早就應該送到廢鐵堆裏去的了。

作為一輛汽車，我們基輔的那輛車子實在乏善可陳，但作為一隻熱水器，它却美妙得很。我們每走三哩路就得停下來，從水溝裏，小溪裏，和有水的地洞裏去舀水來注滿水箱，而汽車很快地又把它化成蒸氣。我們的司機最後索性把水罐掛在車前的防撞擋上，以便隨時取用。

我們在一條路面還算平整的公路上駛行了二十公里左右，然後向左轉彎，慢慢地駛入鄉下。路根本就不是路，而只是一連串車輪的痕跡，由於曾經下過雨，所以我們得避開最近使

用過的輪轍。在田壟之間的凹地裏，不時可以看見小池塘，有白鷺和灰鶻在池塘邊上漫步。我們小心翼翼地駕着車子在池塘之間行進，每到一個池塘，就停下來讓它冒一會兒氣，給水箱裏注滿新鮮的冷水。

我們的司機說，他在戰時當過飛機駕駛員和坦克車駕駛兵。他有一項極大的天賦，他可以在任何時間睡覺，而且要睡多久就睡多久。假如我們的車子停五分鐘，他就睡着了，而一叫他他就立刻醒來，而且全部清醒，馬上就可以開車。他可以連睡十二時而同樣地醒來。我記得我們轟炸機裏的槍手也有這種同樣的天賦，可以在赴轟炸目的地和回來的途中睡覺。

我們約摸在中午時分到達那個農場和村莊。這個農場也叫做希夫欽珂。我們得稱它爲希夫欽珂第二。它和我們所見的第一個農場大不相同，因爲這兒的土地肥沃而富於適應性，村莊也曾被破壞。德軍曾在這兒受圍。他們殺死了所有的牲畜，但卻沒有時間來破壞村莊。這個農場曾養了許多馬，當德國人最後被俘的時候，所有的馬、牛、雞、鵝、和鴨都死了。這些德國人是難於令人想像的。我們很難想像他們的頭腦裏究竟在轉些什麼念頭，他們的思想過程究竟是怎麼樣的——這些可哀的、可怕的、好破壞的傢伙。

希夫欽柯第二農場的經理是一個著名的遊擊戰士，他依舊還穿着他那褐色的短襪和束着皮帶。他有一對藍眼睛，嘴巴兩旁有很深的縐紋。

這個農場有一千二百多人，很多男人已經被殺。那位經理對我們說，「我們可以彌補我們所喪失的馬匹！我們可以飼養出更多的家畜，但我們的人是不能再回來了，我們不能拿新的手臂和新的腿給我們那些殘廢的人。」

蘇聯需要許多人造假手脚，但我們却很少見到。或許這種工業還不曾充分發展，但它顯然是最需要的工業之一，因為有千千萬萬的人民喪失了手臂和腿。

希夫欽柯第二是一個興旺的農場。土地肥沃。農作物有小麥、燕麥、和玉蜀黍。今年春天意外地結了一場冰，凍壞了一部份冬季下種的小麥。人們趕到農田上，準備使它改種玉蜀黍，以免喪失一年的收穫。而它是一片很好的玉蜀黍田。莖桿長得八九呎高，玉蜀黍的顆粒很大，而且長得很密。

我們到田裏去看一架打麥機。田裏有許多隊人在收割小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農場，極目而望，我們只見人們都拿着鐮刀在工作，因為這個農場只有一架小收割機和一架小曳引機。大部份穀物都得用手去刈，用手去細。人們狂熱地工作。他們笑着談着，但他們從不停止。

他們的工作。他們不但在競賽，而且因為這是他們許久以來最豐收的一年，他們要把穀物收刈起來，他們的好景是完全依賴在這上面的。

我們去看貯藏產品的倉庫，一倉倉的燕麥、小麥、和榨油用的芝蔴。穀物正在分配：這一份是給國家的，這一份是留待明年下種的，其餘的分配給村裏的人。

村莊的房屋散佈在池塘四週，人們在池塘裏游泳、洗衣服、和飲馬。赤身裸體的小孩子騎着馬走入池塘裏，在馬的四週游泳，把它們洗刷乾淨。公共建築物都羣集在池塘旁邊：俱樂部裏有一個小小的舞台、一個舞池和幾排坐椅；磨坊裏碾軋當地出產的穀物；辦事處是記賬和收信的地方。這座辦事處裏有一架無線電收音機，它的擴音器裝在屋頂上。全村各家人家的擴音器都有電線和這座總機相連。這是一個電化的村莊，有電燈，有它自己的發電機。

在圓形的小山頭上，散佈着人們的房屋、花園、和菓園。這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小村莊。房屋粉飾得雪白，花園裏一片青翠，竹架上垂着鮮紅的番茄，房子週圍玉蜀黍長得非常高。

我們去作客的那座房子位於那塊高地的頂上，所以我們可以一覽無遺地俯視田野、菓園和波狀起伏的大地。那座房子也像大多數烏克蘭農家房屋一樣——一條進道、一間廚房、兩間寢室、和一間客廳。它是新粉飾過的。甚至地板也新粉飾過。房子裏有一股甜蜜的新鮮石

灰味。

我們的男主人是一個身體強壯、面帶微笑的人，年紀約在五十五到六十之間。他的妻子瑪牟芝喀是我平生所見最刻苦工作的女人。

他們歡迎我們進屋，讓我們使用那間客廳。牆壁粉飾成淺藍色，桌子上有幾隻用粉紅色紙蓋裏的瓶子，瓶子裏裝着五顏六色的紙花。

這個村莊顯然比希夫欽珂第一富庶。聖像比較大，聖像上覆着與牆壁相襯的淺藍色的花邊。這份人家本來不是一個大家庭。他們只有過一個兒子，他的照片就掛在客廳的牆上，一張非常大的彩色照，他們只提到他一次。

那做母親的說，「一九四〇年他在生物化學系畢業，一九四一年動員，一九四一年戰死」。

當瑪牟芝喀說這幾句話的時候，她的臉孔非常淒涼，她只是這樣提及他一次，而他是她的獨生子。

在靠牆的一邊，放着一架很舊的勝家縫衣機，縫衣機上蓋着一塊格子布，在另一邊靠牆的地方，放着一張很狹的床，床上輔着一張作被蓋用的絨氈。房間中央站着一張長桌，長桌

兩旁都有樣子。房子裏非常熱。窗子打不開。我們當即決定，假如不違背禮貌並且可能的話，我們情願睡到穀倉裏去。因為屋外的空氣涼爽悅人；在屋子裏，我們會悶死的。

我們到後天井裏洗了澡，洗完澡，晚餐已經準備好了。

瑪牟芝喀是村裏一個非常有名的廚娘，而且是一個非常好的廚娘，那天的晚餐開始是大杯的伏特加、醃菜、自己家裏烘焙的黑麥麵包、和那一隻瑪牟芝喀調製得非常美味的烏克蘭濃湯。還有一大碗番茄、洋蔥、和胡瓜；還有一種小小的煎餅，裏面塞滿酸梅醬，上面塗着蜜蜂，是一種富於烏克蘭民族風味的精緻點心。還有鮮牛奶和茶，然後是更多的伏特加。我們吃得太多了。我們吃着那種加蜜糖的小酥餅，直吃得眼睛都鼓了起來。

天開始在黑下來了，我們以為這是當天最後的一餐了。

傍晚時候，我們穿過村莊向俱樂部走去。當我們經過那個池塘時，對面來了一艘小船，船裏有一個樂隊，一個奇異的樂隊。樂器是一把二絃琴，一隻附有一付小鑼鼓的小鼓，和一架手風琴，而這就是村裏的跳舞樂隊。那幾個演奏的人乘船渡過小湖，在俱樂部門前上岸。

俱樂部是一個很大的建築物。它有一個小小的舞台，舞台前面有幾張放着棋盤棋子的桌子，再過來是一塊跳舞的空地，然後是一排排給觀眾坐的凳子。

我們進去的時候，俱樂部裏還只有幾個人，只有幾個下棋的人。我們聽說那些青年人從田裏面回來以後，便先吃晚餐，然後休息一個鐘頭，或甚至睡一個鐘頭，然後才到俱樂部來。

那天晚上的舞台已佈置好準備演一個小劇本。桌子上放着一大盆花，桌子兩旁各有一張櫈子，舞台正面上端掛着一幅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大畫像。三個小樂隊進來擺定他們的樂器，開始演奏起來。青年人陸續進來，大多是身強力壯的姑娘們，她們的臉孔洗得乾乾淨淨，紅光煥發。進來的青年男子不多。

姑娘們一同跳起舞來。她們穿着淺色的印花布衣服，彩色的絲頭巾或羊毛頭巾，幾乎全部赤腳。樂隊奏出一支很急促的曲子，在銅鼓和鐃鈸聲中愈奏愈快。光腳板擊着地板。小伙子們站在四週看。

我們問一個姑娘，問她爲什麼不跟小伙子跳舞。她說，『他們已經到了結婚的年齡了，但戰爭結束以後，他們的人數是這樣的少，一個姑娘和他們跳舞，只會惹起糾紛。而且，他們是非常怕羞的。』於是她大笑起來，又回去跳舞了。

適合結婚年齡的青年人是這樣的少。那兒有非常青年的小伙子，但應該在那兒和那些姑

娘們跳舞的男子却已經戰死了。

這些姑娘們的精力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她們整天在田裏工作，事實上，在天一亮就開始工作，可是，在一小時的睡眠以後，她們又準備整夜跳舞了。棋桌上的男人繼續下棋，對四週的鬧聲無動於中。

這當兒，演戲的那一隊人已在佈置舞台，卡柏也在佈置他的燈光準備拍攝劇照。據我們看，音樂停止的時候，姑娘們似乎有點兒不耐煩。她們並不要停止跳舞來看戲。

這是一個小小的宣傳戲劇，很天真有趣。故事是這樣的：農場裏有一個姑娘，但她是一個懶姑娘，她不想工作。她要到城裏去，塗紅她的指甲和嘴唇，過頹廢的生活。幕啓時，她正在和另一個姑娘爭論，另外那個姑娘是一個好姑娘，是一個工作隊的領袖；她在田裏的工作成績非常出色，因此極受人尊敬。那個要塗指甲的姑娘無精打采地在舞台上盪來盪去，顯然不是個好東西，而另一個姑娘，就是那個工作隊的領袖，則筆挺地站着，雙手貼在身邊，朗朗地背着她的台詞。那幕戲裏的第三個角色是一個英勇的曳引機駕駛員，而有趣的一點是：他實際上的確是一個曳引機駕駛員，這幕戲會因為他在修理那架他使用了一天的曳引機而就擱了一個半鐘頭。那位英勇的曳引機駕駛員有一個演劇手法，而且僅此一種——他在舞台

上來回地踱步，一面抽香煙，一面背台詞。

曳引機駕駛員愛上了那個愛塗指甲油的姑娘。他是真心愛她，而他已有喪失他的靈魂給她們的危險。事實上，隨着劇情的進展，他顯然幾乎已準備拋棄駕駛曳引機、幫助人民經濟的職務，想要搬到城市裏去弄一間房子，與那塗指甲油的姑娘過舒服的生活。但那工作隊的領袖筆挺地站在他的面前，對他講了一篇大道理。

那篇演講沒有用。他顯然已心智糊塗，他非常地愛那個懶惰的、不好的姑娘。他不知道怎麼樣辦才好。他應該放棄他所愛的那個姑娘呢，抑或跟她城裏去做一個蕩子呢？

這時那個墮落的姑娘出場，舞台上只留下工作隊領袖和曳引機駕駛員。於是，那個工作隊領袖就用女性的狡計對曳引機駕駛員說，這個姑娘並非真心愛他，她之所以想和他結婚，只是因為他是一個出色的曳引機駕駛員，不久就會對他厭倦的。曳引機駕駛員不相信這種話，於是，工作隊領袖突然靈機一動，說「我想出一個辦法了。你假裝跟我談戀愛，當她看見我們的時候，你就可以發現她究竟有幾分愛你了。」

這個新辦法被接受了。當那塗指甲油的姑娘入場時，她發現曳引機駕駛員把那個工作隊領袖擁在懷抱裏，於是，嘿，劇情並不像你所預期的那樣發展，因為那個墮落的姑娘決定也

要在社會主義經濟裏做一個工作者。她願意留在農場裏了。她把她的一腔怒氣發洩到工作隊領袖的身上。她說，『我也要組織一個工作隊。不要以為只有你可以出風頭佩勳章，我也可以做一個工作隊長，也可以佩勳章的。』

這就同時解決了那個曳引機駕駛員的戀愛問題和經濟問題。這個戲劇的結果使每一個人都覺得一切都很圓滿。

這是劇本的故事，但實際演出却並非如此。故事剛開始，那個曳引機駕駛員剛在舞台上踱了四五百步，卡柏就放射鎂光泡攝取他的第一張照片。這一來，整個戲劇就被破壞了。那個塗指甲油的姑娘退到一盆鳳尾草的後面，始終不會再走出到舞台前面來。曳引機駕駛員忘記了他的台詞。工作隊長也訥訥地講不出話來。此後，那幕戲的演出就像是一幕雙簧回聲。演員跟着提詞的人唸台詞，所以每一句話都可以聽到兩遍。每當他們快要記到他們的台詞的時候，卡柏一放鎂光泡，便又把他們弄糊塗了。

觀眾很開心。鎂光泡每一次閃亮，觀眾便熱烈地鼓掌。

那個墮落的姑娘塗着紅色的指甲油，項間掛着冒充珠寶的琉璃珠圈。鎂光泡使她變得這樣的慌張，以致她弄斷了她的珠鏈，玻璃珠散落到全台。那幕戲劇於是整個脫節了。

要不是那位充當提詞人的小學教師事後對我們說明，我們就不會知道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幕終於在一片激烈的掌聲中落了下來。我們覺得觀眾在全部劇中似乎最欣賞這一幕情景。落幕以後，他們唱了兩支烏克蘭歌。

姑娘們要跳舞。她們是一會兒不停的。不久，樂隊佈置就緒，熱烈的跳舞又繼續開始。她們直到俱樂部經理出來勸她們去睡覺的時候才停止。那時已是兩點一刻了，而她們在早晨五點半就得起來到田裏去工作。但她們實在不願意離開，假如可以的話，她們要跳個終宵。

到我們爬到小山頂上的時候，時間已是兩點三十分，我們準備立刻就上床。但瑪牟芝喀的計劃顯然並非如此。她一定是在我們吃完了我們所認爲的那頓晚餐離開以後就開始準備的。長桌子已鋪好，桌子上已堆滿了食物。在早晨兩點半鐘的時候，我們又吃了這樣的一頓東西：大杯的伏特加，醃菜，胡瓜，從本村池塘裏捉來的魚，加蜜糖的小煎餅，還有一隻鮮美的洋芋湯。

食物過飽和睡眠缺乏弄得我們半死不活。屋子裏非常熱，房間裏很不舒服。同時，我們又發覺卡柏和我所擬估據的那張床是瑪牟芝喀的床，所以我們要求睡到穀倉裏去。

他們爲我們鋪上新的稻草，並且在稻草上鋪了一張床單，於是我們就躺下來睡覺。我們

讓房門開着，門悄悄地關了攏來。顯然地，像歐洲的大部份地方一樣，這兒的夜氣是很利害的。我們在等了一會兒以後再起身去開門，但它又輕輕地關上了。他們不肯讓我們曝露在夜氣裏傷害我們自己。

小穀倉的稻草很香甜。關在靠牆的一隻籠子裏的兔子正在黑暗裏磨牙齒。在泥牆的那一邊，幾隻豬正在舒服地打呼嚕，母牛魯布喀正在睡夢中翻身。

魯布喀是新買的母牛，瑪牟芝喀對它不如對以前的那頭老母牛那樣歡喜。以前那頭老母牛名叫喀都希喀。瑪牟芝喀非常愛它；而她不知道她為什麼要賣掉它。魯布喀是一頭很好的母牛，但她不懂人情，它的奶也沒有喀都希喀那樣多。每天早晨，村裏的兒童來帶牛出去放牧，魯布喀就跟着牛羣一同去，而喀都希喀也在牛羣裏。每天傍晚，當牛羣回來的時候，每一頭牛都回到它自己的棚舍裏，那時，喀都希喀就想走進這兒的牛棚裏來，它想回它的老家，瑪牟芝喀就跟它談一會兒話，然後趕它出去。

而她說，『我賣掉喀都希喀的時候一定是發瘋了。當然囉，魯布喀是一頭比較年青的母牛，它或許可以多活幾年，但它沒有喀都希喀那樣好，也不如喀都希喀那樣有良心。』

夜是這樣的短促，實際上幾乎等於沒有。我們閉攏眼睛，翻了一次身，夜就過去了。畜

欄外的天井裏已有人在走動，牛牽了出去，豬咕嚕着，叫喚着等待喂早餐。我不知道瑪牟芝喀是什麼時候睡的。她簡直根本沒有睡覺的時間，因為她要準備早餐，比我們早起身了幾個鐘頭。

卡柏對於起身老是要有麻煩。他不肯起身。但他終於從稻草上被拉了起來。他呆瞪瞪地在一段木頭上坐了很多時候。

那頓早餐必須詳細記錄下來，因為世界上從來不會有過像這樣的早餐。首先是一玻璃杯伏特加，然後每人四隻煎雞蛋，兩大塊煎魚，三杯牛奶；然後是一碟醃菜，一杯家釀的利口酒，還有黑麵包和白脫；然後是一滿杯牛奶，又是兩杯牛奶，末了再來一杯伏特加。我們早餐吃了那麼多東西，聽來有點難以相信，但我們的確吃了那麼多，而且都吃得很有味道，只是事後我們覺得胃裏沉甸甸地有點兒不舒服。

我們以為自己起身很早，但在曙光初露的時候起，全村的人早已到田裏去了。我們到他們收刈燕麥的田裏去。拿着長鐮刀的男子排成一字形揮刀大割。他們的後面跟着女人，把割下的麥子用草繩細起來，女人的後面則是拾取麥穗的孩子，他們檢拾每一條麥稈和每一顆麥穗，不使有一點浪費。他們執拗地工作着，因為這是他們最忙碌的時候。卡柏走來走去拍照

，他們抬頭笑一笑，然後仍繼續工作。工作是沒有停歇的。這個民族已這樣工作了幾千年，有一個很短的期間，他們也曾用過機械，而現在，在他們新機器未造成以前，他們只能依舊用手工作。

我們去訪問他們磨麥子的磨坊，然後去看保存農場記錄的辦公處。

在村莊的邊上，他們正在建造一家磚瓦廠，他們要使每一座房子都用磚塊建築，要使每一個屋頂都舖上瓦片，因為木屋着火的危險給他們的印象是太深了。他們很高興能夠有原料可以就地製造磚瓦。他們說，當他們自己的村莊建築完成以後，他們就把磚瓦出賣給鄰近的農場。那家磚瓦廠將在冬季以前完成，當他們田裏沒有工作做的時候，他們就製造磚瓦。一堆堆的泥坯正壘在屋簷底下等待入窟。

中午，我們逛到一家人家去看他們吃午餐。這家人包括父母二人和兩個孩子，他們有一碗青菜牛肉湯放在桌子中央，每一個人有一隻木匙羹向桌子中央的那隻碗裏搯湯吃。他們還有一大碗茄片，一盤麵包，和一壺牛奶。這些人吃得非常好，而我們可以從男人腰間的皮帶上看出他們食物的改良的過程，因為皮帶上刻劃着歷年的痕跡，現在皮帶已放長，搭扣所在的地方已距舊痕二吋，三吋，或四吋遠。

瑪牟芝喀一定是洗淨了早餐碟子就立刻開始作午餐的。下午四點三十分，她已準備好一桌筵席。這是她的小型國宴。她非常以她的能幹自傲，而全村又非常以她自傲，這大概就是她當我們的女主人的理由之一。在這次席上，村裏的領袖們是她的來賓。列席的有農場主席，農場經理，小學男教師，農場專家，農業專家的太太——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人，是村裏的小學教員和戲劇指導員——男女主人，而當然更少不了我們。而假如我們以為以前那幾餐規模宏大的話，則這一餐又勝過了它們。桌子上放着一大壘伏特加，我們對伏特加已非常厭倦了。我們的胃已變得非常弱。我們先吃黑麵包，醃菜，番茄，和伏特加，然後再吃酸味的烏克蘭濃湯和一大塊煎肉餅。肉餅的燒法很特別，把肉的味道燒到了洋芋裏去。然後再是小餅，蜜糖，和牛奶。當一盤菜只吃掉一半的時候，瑪牟芝喀就又把它的裝滿。她差不多塞死了我們。

然後農場主席發表了一篇短短的歡迎辭，而我們也說了一篇短短的謝辭。然後他們就問我們是否願意回答幾個問題，因為我們是第一次到那個農場去的美國人，而他們對我們的國家有很大的好奇心。他們很想知道一些關於美國的事情。我們告訴他們說，美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關於它的事情，我們只知道一點點，或許有許多問題我們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我們

可以試試看。於是那位農業專家就問我們關於農業的事情。美國生長些什麼農作物，生長在什麼地方？美國是否有關於種子的實驗，是否專門有實驗站進行研究工作？美國有沒有農業學校？他說，蘇聯的每一個集體農場都特別闢出一些田地實驗土壤和種子，我們是否也有那樣的東西？他又問美國政府是否也用金錢和忠告幫助農民？這種問題是以前問過了，而當我們敘述我們的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關於農業方面的措置時，總是會引起一種小小的驚奇。然後農場經理問美國要多少土地才能支持一個家庭，一個家庭的收入有多少，它對食物、醫藥和衣着的關係如何；美國的一個農場上大概有些什麼配備，有些什麼機器和什麼牲口。他又問到美國對退伍士兵有什麼照顧。

然後那位小學教師問到我們的政府。他想知道最高法院的事情，想知道總統是如何選舉出來的。國會是如何選舉出來的。他問總統是否有引導國家進入戰爭的權力，國務院有什麼權力，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接近到何種程度。

我們答道，我們並不以為總統有極大的權力，但他或許暗中却有權力，至於究竟有沒有，我們却不知道。他們想知道杜魯門是一個怎樣的人，那一點我們也不知道，於是我們的男主人談起羅斯福。他說俄國人民非常愛他，非常信任他，他說他的死像是死了一位父親一

樣。

於是他問道，「你認識他嗎？你可曾會見過他嗎？」

我就說，「是的。」

他就說，「講講看，他講話的神情如何，他的態度如何？你可以講一些我們能夠懂得的關於他的小故事嗎？」

然從那位農業專家問到原子能，不是問製造炸彈的原子能，而是問美國是否要把原子分裂應用於建設性的工作。

我們就說，「我們不十分知道。想來是如此吧。據我們的印象，關於利用這種能力，已經做了許多事情和進行了許多實驗，醫藥研究方面，也在利用原子分裂的副產品。我們知道，這種新東西假如利用適當，可以改變世界，假如利用得不適當，也可以改變世界。」

於是席上的人談到他們農場的前途。在一年或兩年之內，它就可以電氣化和機械化了。他們說，新曳引機不久就可以開始來了，要不了多久，村裏的人就可以吃得好、住得好，那時，人們就可以不必工作得那樣辛苦了。「一年以後再來吧，」他們說，「來看看我們怎樣的進步。我們要開始建造磚頭房子了，我們的俱樂部將是磚頭造的了，我們的屋頂上將是瓦

片了，生活就不會這樣艱苦了。」

我們的司機幾乎從我們到達的時候起就一直在睡覺。他這個人睡覺真有出奇的本領。現在我們喚醒他，他就開了一半馬力上路。

我們道了再會。農場經理和那位農業專家坐着我們的車子送我們到十字路口。農場經理要求我們把所攝的農場照片送幾張給他們，因為他們很歡喜把那些照片掛在他們的俱樂部裏，這是我們可以辦得到的。

在回基輔的途中，由於疲倦和食物過飽，我們竟在汽車的後座裏睡着了。我們不知道司機究竟幾次停車加水，也不知道他的車子究竟壞了多少次。到了基輔，我們從車子裏滾出來就滾到床上，約摸睡了十二個鐘頭。

第二天早晨，我們到河邊去看從南北兩端運物產到基輔來趕市的船隻。大船裏裝着木柴，小船裏高高地堆着麥桿。大批番茄、洋芋、和蔬菜從河上運來，在城腳下起岸。這些都是集體農場的產品，運到公開市場上來出賣的。我們跟着那些東西爬坡上市場，到了市場，賣貨的人排成長行坐在地上，面前放着他們的東西，他們都是老年人和小孩子，因為青年人都

在收刈的田裏工作。

我們從市場走到一家極大的麵包廠裏，全城的黑麵包都是那家廠裏烤出來的。該廠經理在領我們進去以前先給我們穿上白衣服。那家麵包廠有一部份已毀壞，正在重建和擴大。經理告訴我們說，該城被圍的時候，麵包廠仍繼續工作，甚至炸彈落到廠房上的時候，烘爐裏還在出麵包。

廠裏麵包堆積成山。這是一家完全機械化了的麵包廠，有和粉機、搓捏機、烘爐，一切都是自動的。大串的黑麵包從烘爐裏出來，堆在車子裏，然後運出到城裏去。

當地的人非常以這家麵包廠自傲，那位經理問我們美國是否有這樣神奇的東西。在這件事情上，我們又發覺了一件我們常常發覺的事情，就是：俄國人民真正相信這些東西是他們發明的。他們愛自動機器，他們日夜夢想要把他的一切技術都全部機械化。在他們，機械化就等於安閒舒適、食物富足、和普遍的富庶。他們像美國人一樣的愛機器，一輛新汽車可以吸引一羣人站在四週，使他們幾乎帶着一種崇敬的神情向它凝視。

下午，一家烏克蘭文學雜誌來訪問我。那是一次歷時很久的痛苦的經驗。那位編輯是一個面目嚴肅機警的小個子，他所提出的問題常常是非常的長。譯員把他的問題翻譯給我聽，而等到我懂得下半段的時候，我已忘掉前半段了。我儘可能地詳細答覆。我的答覆仍由譯員

翻譯給那位編輯聽，然後全體問答都紀錄下來。提出的問題非常複雜和非常文學性。當我答覆一個問題的時候，我不能確定翻譯究竟對不對。這其中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與訪問者的意見完全不同，第二個問題是我的英語。我所用的是會話體英語，而譯員所學的是學院式英語，頗有格格不入之苦。爲了避免將來被人錯引我的話，我要求把俄文再翻譯到英語。我的猜想不錯，他們所紀錄下來的話與我所說的話並不十分接近。這不是故意的，也不盡是出於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困難。它不僅是一種語言問題，而等於是要把一種思想翻譯成另一種思想。他們是非常親切和忠實的人，但我們不能密切地溝通。而這是我最後一次的受訪問；此後我再不嘗試了。在莫斯科的時候，又有人要來訪問我，我就建議用書面向我提出問題，使我有考慮的機會，然後用英文答覆，再校對一遍譯文。由於這個建議沒有被接受，所以我也就不會再受訪問。

我們不論到什麼地方，問我們的問題總有某種類似的地方，而我們漸漸地發現，原來所有的問題都是從一個來源裏生長出來的。烏克蘭知識份子所提出的問題，不論是政治問題或文化問題，都是以他們在真理報上所讀到的文章爲基礎的。不久之後，他們還不會開口，我們就可以預料到他們要提出什麼問題，我們幾乎已可默誦他們所根據的那幾篇文章的內容。

有一個文學方面的問題是每次都要提出來的。我們甚至知道它會在什麼時候提出來，因為那時，我們那位問話者的眼光就會嚴肅起來，他會湊近身來，仔細觀察我們的臉色，而那時，我們知道就要問我們喜不喜歡西蒙諾夫的『俄羅斯問題』那個劇本了。

西蒙諾夫大概是蘇聯目前最受愛戴的作家了。不久以前，他到美國去了一次，回到俄國以後，他就寫了這個劇本。它大概是演出次數最多的一個劇本。蘇聯有三百多家戲院同時上演這個劇本。西蒙諾夫先生的劇本是講美國新聞界的，我必需在這兒把它作一個簡單的摘要。它的背景一部份在紐約，一部份在一個類似長島那樣的地方。紐約的背景很像先驅論壇報大廈附近的勃里克酒館。劇情大致是這樣的：——

有一個美國記者曾在幾年以前到過俄國，寫過一本贊賞俄國的書。他受雇於一個報紙大王，那個報紙大王是一個資本家，一個殘酷、粗魯、權力極大、作威作福的報業霸王，是一個不講信義、沒有德行的人。那個報紙大王，爲了想贏得一場選舉，要借他的報紙來證明蘇聯正準備要攻打美國。他要那個記者到俄國去一趟，回來就報告蘇聯準備要打美國。假如他肯做這件事情，報紙大王可給他一大筆錢——確數是五萬美金——並保證他將來絕對不愁沒有職業。這個記者很窮，他想娶一位姑娘，而那位姑娘想在長島鄉下有一座小小的房子。他

接受了那件工作。他到俄國去了，他發覺蘇聯並不要跟美國作戰。回國以後，他偷偷地寫了那本書。但內容却正巧與那個報紙大王所要他寫的相反。

這當兒，憑着他預支的那筆錢，他已在長島鄉下買了一座房子，他已娶了那位姑娘，生活已相當過得去。他那本書脫稿以後，那位報紙大王不但出版那本書，而且使那個記者不能拿它到任何其它地方去出版。而這個報業霸主的權力是這樣的大，以致那個記者從此再也找不到一個職業。他此後所寫的書和文章再也不能發表。他喪失他那座鄉村別墅，他那想過安定生活的妻子離開了他。這個時候，他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在一次飛機失事中跌死了（戲裏爲什麼要有這個插曲，沒有明白說明）。我們那位記者於是潦倒窮途，他覺得他已報導了事實的真相，而那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我們常常被人問及的『俄羅斯問題』，劇情大致如此。而我們通常是這樣回答的，（一）從文學的立場看，它不是一個好劇本；（二）演員的談吐不像美國人，而據我們所知，他們的舉動也不像美國人（三）美國雖有一些壞出版家，但他們決沒有像這個劇本裏所指出的那樣龐大的權力；（四）美國的出版家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證據是，西蒙諾夫先生的那本書已在美國有譯本發行。而最後，我們希望可以有一個描寫美國新聞界的好劇本，但這個劇

本却不是好劇本。這個劇本非但不會增加俄國人對美國和美國人的了解，而且大概還會發生相反的作用。

關於這個劇本，我們被問到的次數是這樣的多，以致我們後來寫了一個我們稱之為『美利堅問題』的劇本摘要。我們開始把那個摘要讀給我們的問話者聽。在我們的劇本裏，西蒙諾夫先生受真理報之命到美國去，要他去寫一連串證明美國是一個西方衰敗的民主國家的文章。西蒙諾夫到美國去了，而他發現美國非但沒有衰敗，而且，除非你從莫斯科望過去，它甚至並非在西方。西蒙諾夫回到俄國，偷偷地寫下他的信念，說美國不是一個衰敗的民主國家。他把他的原稿交給真理報。他立刻被作家協會開除會員資格。他喪失了他的鄉村別墅。他的太太，一個是共產黨黨員的好姑娘，捨棄了他，而他後來就像他劇本裏的那個美國人所不可避免的那樣餓死了。

這個摘要讀完時，我們的問話者之中通常會發出一些吃吃的笑聲。我們就說，『假如你們覺得這個劇本荒唐可笑，但它却並不比西蒙諾夫先生描寫美國的「俄羅斯問題」更荒唐可笑。這兩個劇本是同樣的壞，而它們之所以壞，是爲了同樣的理由。』

有一兩次，我們的摘要引起了一場劇烈的爭論，但在大多數場合，它只是引起人們大笑

，改換了談話的題目。

基輔有一個地方叫做鷄尾酒吧。它是用俄文字母拚出來的，所以我們讀不懂，但它的讀音是鷄尾酒吧。而它實在像美國的鷄尾酒吧，裏面有圓形的櫃台，櫃台前有椅子，另外還有幾張小桌子，基輔的一些青年人都在晚上到那兒去消磨時間。他們喝一種稱為鷄尾酒的混合飲料，而那是很妙的飲料。那兒有基輔鷄尾酒，莫斯科鷄尾酒，和庇弗里斯鷄尾酒，而夠奇怪的：它們的顏色總是粉紅的，而它們嘗起來總是帶着很強烈的豬油味。

俄國人在調製鷄尾酒的時候，似乎相信酒的成份愈複雜，調出來的鷄尾酒便味道愈好。我們嘗過一種由十二種酒調成的鷄尾酒。我們忘記了它叫什麼名稱。我們也不想記得它。我們在蘇聯找到鷄尾酒吧，不禁感到有點驚奇，因為鷄尾酒是一種非常頹廢的飲料。而基輔鷄尾酒和莫斯科鷄尾酒是我們生平所嘗到最頹廢的鷄尾酒了。

我們在基輔的時間已告終了，於是我們就準備飛回莫斯科。這兒的人最好客，最仁慈，也最慷慨，我們非常喜歡他們。他們是聰明善笑的人，有幽默感，有精力。在他們的廢墟上，他們正在孜孜不倦地建造新房子、新工廠、新機器、和一種新生活。他們一再對我們說，「幾年以後回來，來看看我們的成就。」

第六章

回到莫斯科，我們就恣意滿足需要聽我們自己的語言和看我們自己的人的那種饑餓，因為，烏克蘭人對我們雖然仁慈慷慨，但我們究竟是外國人。與那些知道「超人」是誰的人在一起談話，我們覺得很高興。「譯者按：超人是美國連載兒童漫畫的主角，猶如中國的三毛。」我們去到琪爾摩的愉快的家裏，聽他的歌舞唱片。那是豎笛名手 P·W·羅塞爾送給他的。琪爾摩說，假如不是羅塞爾送了熱情的唱片來，他就不知道怎樣挨過冬天了。

甜喬意·紐曼找到幾個俄國姑娘，我們到莫斯科夜總會去跳舞。甜喬意跳得非常出色，但卡柏跳闊大的免步，雖有趣却危險。

大使館裏的人待我們非常好。軍事參贊麥康將軍送了幾顆 DDT 彈給我們，以免我們在離開莫斯科以後受蒼蠅的攻擊，因為在某些受過轟炸破壞的區域裏，蒼蠅是非常討厭的。而在我們過夜的某一二處地方，還有其它討厭的小訪客。大使館裏的有些人已有許多時候不會

回國，他們想知道一些簡單的小事情，如棒球比賽的預測，足球季節的前途，以及全國各地的選舉情形。

星期天，我們到莫斯科河邊高爾基公園附近去看戰利品展覽。那兒有各種各樣的德國飛機，德國大炮，機關槍，運輸車，平射炮，以及其它種種被蘇軍俘獲的德軍配備的樣品。軍人們帶着他們的孩子和妻子在這些武器之間漫步，熟悉地說明這些東西。孩子們好奇地望着這些他們的父親幫助俘獲的配備。

河上在舉行駕駛比賽，與賽的都是馬達裝在船外的快速小艇，而我們注意到其中的許多馬達是伊文魯狄斯和其它各家美國公司的出品。比賽的單位是各俱樂部和各工人團體。有些快艇是姑娘們駕駛的。我們打賭一個白膚金髮特別美麗的姑娘可以獲勝，原因只是爲了她長得美，但她並沒有獲勝。假如還有其它理由的話，則是因爲姑娘們比男人更強硬更富於競爭心。她們肯作更冒險的轉彎，以一種不顧一切的精神駕駛她們的船。甜拉娜跟我們在一起，她穿着一套海軍藍的衣服；戴着一頂有一張小面紗的帽子，胸襟的鈕孔上佩着一枚銀星勳章。

後來我們到紅場去，那兒至少有一列四分之一哩長的人站着等在那兒去晉謁列寧的墳墓

。坟墓門前站着兩個像蠟人那樣的青年士兵。我們甚至看不見他們霎眼睛。整個下午，幾乎每一天下午，一長列人慢慢地穿過坟墓，去看玻璃棺材裏列甯的面孔；成千的人，他們經過玻璃棺材，向列甯的高額頭、尖鼻子、和翹下巴望一會兒。這像是一種宗教行爲，雖然他們自己不願意稱這是宗教行爲。

在紅場的另一端有一座圓形的大理石壇，以前，那是沙皇殺人的地方，現在，它的上面放着極大的紙花和插滿了紅旗。

我們到莫斯科來的目的只是爲了要到史達林格勒去。卡柏去沖洗了他的軟片。他很願意把軟片原封不動地帶回國去，因爲美國的沖洗設備和技術比較好一些。但他對這件事情有一種第六感，而他的直覺結果證明是非常有益。

我們照例不能在最好狀況下離開莫斯科，因爲他們又舉行了一次鬧到深夜的歡送會，而我們又只睡了極少的時間。我們又坐在特別候機室裏，在史達林的畫像下面喝了一個半鐘頭的茶才上機。我們所乘的飛機還是像以前所乘的一樣。這架飛機上的通風設備也是失了効用的。行李堆在甬道上，於是我們就起飛了。

在這次旅程中，乞瑪斯基先生的格里姆林非常活躍。他所安排和設計的每一件事情幾乎

都行不通。史達林格勒沒有文協的支會或分會，所以，當我們到達那座小小的飛機場辦公廳的時候，沒有一個人來迎接我們，乞瑪斯基先生得打電話到史達林格勒去叫車子。這當兒，我們走到機場外面，看見有一排女人在那兒賣西瓜和甜瓜，而那是非常好吃的西瓜和甜瓜。我們讓西瓜水在我們的襯衫前襟滴了一個半鐘頭，才有一輛車子開到，而由於我們使用了它不少時間，而它又有一些與眾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們必需把這輛汽車來描寫一番。它不是一輛小汽車而是一輛公共汽車。它是一輛準備可以容納二十個人的公共汽車，是一輛A式福特。當福特公司放棄A式車的製造時，蘇聯政府買下了那套機器。於是A式福特就在蘇聯製造起來，有小汽車，輕級貨車，和公共汽車，而這輛車便是其中之一。據我的猜想，它也是有彈簧的，但它的彈簧一定不多，不然，它們一定是已經折斷了。我們根本找不出具體的證據可以證明它有彈簧。駕駛這輛車子的司機是一個出色的合作人材，他對汽車幾乎抱着一種崇敬的態度。後來，當車子裏只有他和我們的時候，他會背誦一連串他所心愛的汽車的名稱。『別克』他會說，『凱特蘭克，林肯，邦坦克，史都背克，』於是他會深深地嘆一口氣。他所知道的英語只有這幾個字。

從飛機場到史達林格勒的路是全區最難走的一段路。從飛機場到市區有幾哩路，假如我

們走完了那一段，公路就比較平坦易行了。這條所謂公路是一連串土堆和泥洞和深水坑。路面是未曾鋪築過的，最近的幾場大雨已使公路的一部份變成水塘。在那開闊的、極目無際的草原上，羊羣和牛羣正在那兒吃草。鐵路軌道與公路平行，而沿着路軌，我們看見一排排在戰時被炮火轟毀的鐵皮車和貨車。整個幾哩方圓的區域內，在史達林格勒的四面八方，都狼籍着戰爭的渣滓：焚毀的坦克、鐵甲車、運兵車、和牛鏽的大砲碎片。拆卸隊的人員正在這一區收拾這些殘破的東西，把它們運到史達林格勒的曳引機廠裏當廢鐵用。

當我們的公共汽車蹦蹦跳跳前進的時候，我們得雙手抓住車子。我們似乎得無窮盡地在草原上顛簸過去了，直到最後，在一塊小高地的頂上，我們看見史達林格勒已躺在我們的下面，並看見了橫亘在史達林格勒後面的伏爾加河。

市區邊上已築起了幾百幢新造的小房子，但一旦進入市區本身，則除了滿目殘破以外，很難再看到別的東西了。史達林格勒是沿伏爾加河岸與築的一個狹長形的城市，幾乎有二十哩長，但最闊的地方也只有兩哩寬。我們以前也曾見過破毀的城市，但它們大多是被炸彈炸毀的。這個城市却不同。在一個炸彈炸毀的城市裏，可以看到幾架直立的危牆；這個城市則是被火箭和炮彈轟毀的。它曾經過幾個月的戰鬥，每一個地方幾次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大

多數牆壁已被轟平。殘剩的幾梁兀立着的牆壁上滿佈着機關槍彈的傷痕。我們當然會讀過令人難以相信的保衛戰，而當我們看見這個破毀的城市的時候，我們得到了一種印象，就是：當一個城市遭到攻擊，它的建築物被轟毀的時候，倒毀的建築物變成了守軍極好的掩護物——防空壕、地洞、和由這種地洞所改成的機關槍巢，可以使一支堅決的守軍幾乎不可能被驅出。這兒，在這一堆紛亂的廢墟裏，是戰爭的大轉捩點之一。經過幾個月圍困、攻擊、和反攻以後，當德軍終於被包圍和俘虜的時候，即使他們最愚蠢的軍人一定也已經在他們的靈魂裏多少感覺到戰爭已經是失敗的了。

中央廣場上躺着一家大百貨商店的殘骸，這兒，當德軍被包圍的時候，曾作過最後的抗拒。這兒是馮·保羅斯被俘和全部被圍困瓦解的地方。

對面街上就是我們要去住的那家修復了的旅行社旅館。我們派到兩個大房間。從我們的窗口望出去，是一片廣大的斷磚殘瓦、扭曲的鋼骨、和粉碎的水門汀，而在這一片粉碎的廢墟裏，已長出那種破毀地帶總是可以看到的奇異的黑色的野草。在我們逗留在史達林格勒的那個期間內，我們對於這一大片廢墟是愈來愈感到興趣了，因為它不是荒涼的。廢墟下面有地窖和地洞，而在這些地洞裏，住着許多人。史達林格勒是一個大城市，它以前有不少許多

層高的公寓房子，現在，除了郊外的房子以外，以前的建築物已盪然無存。但人們總得有一個地方住，所以他們就住在以前那些大公寓的地窖裏。我們從房間的窗口裏望出去，而從一大片瓦礫堆後面，會突然出現一個姑娘。她是到工廠裏上工去的，手裏的木梳還在對她的頭髮作幾下最後的梳理。她會打扮得很整潔，穿着乾淨的衣服，大踏步地穿過野草去上工。我們想像不出她們究竟是如何忍受的。她們怎麼能住在地下而依舊保持清潔、自尊、和女性的風格。家庭主婦從其它洞窟裏走出來去上菜場，頭上包着潔白的頭巾，手裏挽着菜籃。這是對現代生活的一種奇異而英勇的戲嘲。

但有一個很可怕的例外。就在旅館的後面，在一個從我們的窗口可以俯視得到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垃圾堆，拋着西瓜皮、骨頭、洋芋皮、和其它東西。過去幾碼遠，有一個圓形的小丘，像是一個穿山甲的洞口。每天早晨一大早，這個洞裏便會爬出一個年青的姑娘。她有兩條很長的腿子，赤着腳，手膀瘦細，頭髮污穢蓬亂。她的身上覆着一層經年的塵垢，所以皮膚已呈棕黑色。而當她抬起臉來的時候，那是一張我們生平所見到的最美麗的臉孔之一。她的眼睛詭譎猾狡，像是一隻狐狸的眼睛而不像是人的眼睛。那張臉孔長得很豐滿，但却沒有血色。她一定是在史達林格勒恐怖的戰鬥中不知遭到了什麼意外以致喪失了她的記憶力。

。她蹲在地上吃西瓜皮和啃嚼人家燒湯拋棄的肉骨頭。她通常要在那兒蹲兩個鐘頭左右才吃飽肚皮。然後她就走到野草堆裏，躺下來，在陽光底下睡去。她的臉孔輪廓分明，非常可愛，她用她那兩條長腿奔出像一頭野獸一樣優美的姿勢。住在那一帶其它地窖裏的人極少跟她講話。但有一天早晨，我看見從另外一個洞裏出來的女人給她半段麵包。那個姑娘幾乎像搶奪似地接過來，把麵包緊抱在她的胸口，她像一頭半瘋的狗似地望着那個給她麵包的女人，懷疑地注視着她，直到她退回到她自己的地窖裏，然後她轉過身來，把她的面孔埋在黑麵包裏，眼睛像一頭畜生似地左右轉來轉去。當她在啃麵包的時候，她那破爛污穢的披肩的一邊從她那污穢年青的胸部上滑了下來，她的手自動地把披肩拋回去遮住她的胸部，用一種傷心的女性的姿勢撫平那個地方。

我們不知道像這樣的情形究竟有多少，人類的頭腦已不再能忍受二十世紀的生活了，他們沒有退回到山裏，却退入了古代，退入了古代哀痛、喜樂、和自存的曠野裏。這是一張使人久久難以在夢中忘懷的臉孔。

那天下午很晚的時候，鄧欽科上校來訪問我們，問我們要不要去看一看史達林格勒的戰區。他是一個面目清秀的男子，剃光頭，年約五十左右。他穿着一件白制服，腰間束着皮帶

，胸上掛滿了勳章。他帶我們環遊全城，指給我們看，這是二十一軍防守的地方。這是六十一軍增援的地方。他帶着戰場地圖。他帶我們到德軍被阻的確實地點，指出德軍至此便無法再前進一步。在這條線的邊上，就是巴甫洛夫的房子，那個地方已成了一個國家的聖壇，而且將來大概還要繼續這樣被崇敬。

巴甫洛夫的房子是一座公寓，而巴甫洛夫是一個中士班長。巴甫洛夫帶着九個人把那座公寓守了五十二天，抵抗德軍所能拿得出的種種攻擊。而德軍從未攻下巴甫洛夫的房子，他們從未俘虜到巴甫洛夫。這是他們的侵略所到的最遠一點了。

鄧欽科上校帶我們到河邊，把蘇聯守軍的陣地指給我們看，指出德軍不能把他們迫下峻峭的河岸。到處都散亂着德軍帶來的發鏽的武器。上校是一個基輔人，他有一對烏克蘭人的淺藍色的眼睛。他已五十歲，他的兒子是在史達林格勒戰死的。

他把德軍發動最大攻勢的那個山頂指給我們看。山上有有人在活動，山邊陳列着坦克車。山脚下是幾排大炮。一家莫斯科來的記錄影片公司正在該城重建以前攝取史達林格勒被圍的歷史片。河裏泊着一艘遊艇。那家影片公司是從莫斯科順流而下到這兒來的，他們就住在那艘遊艇上。

而現在，乞瑪斯基的格里姆林又開始活動了。我們說，我們很想當他們在拍這張影片的時分來攝幾張照片。

乞瑪斯基就說，『好極了，今天晚上我去拜訪他們，看他們允不允許我們。』

於是我們就回到我們的旅館裏，而我們一到旅館，就聽到了大炮發射的聲音。第二天早晨，當他打電話去的時候，那一段片子已經拍完，我們已錯過機會了。我們每天都想拍幾張史達林格勒被圍的照片，而每天都碰巧錯過機會。乞瑪斯基的格里姆林隨時都在活躍。

下午，我們走近廣場，到河邊的一個小公園裏去，那兒，在一座高大的方形石塔之下，有一塊開滿紅花的花圃。在這一片花底下，埋着許多史達林格勒的保衛者。公園裏的人很少，但有一張椅子上坐着一個女人，一個年約五六歲的男孩子靠住欄干站在那兒，望着花圃裏面。他站了這麼久，以致我們要求乞瑪斯基去問問他。

乞瑪斯基用俄語問他道，『你在這兒做什麼？』

那個男孩子用一種平淡無奇的口吻答道，『我在拜訪我的父親。我是每天晚上都來看他的。』

這句話裏沒有痛苦，沒有哀傷。它只是敘述了一件事實，而那個坐在椅子上的女人抬起

眼來，向我們點點頭，微笑了一下。過了一會兒，她和那個小男孩走了開去，他們穿過公園，回到破毀的市區去了。

早晨，當早餐端進我們房間裏來的時候，我們還以為有人發了瘋。早餐包括生番茄，醃菜，西瓜，和奶油蘇打水。但並不是有人發瘋，它只是一頓正常的史達林格勒早餐。我們設法使奶油蘇打水換成茶。但不久以後，我們甚至漸漸歡喜吃番茄當早餐了。拆穿了講，它除了番茄汁之外還有什麼？但我們始終吃不慣奶油蘇打水。

我們旅館前面的那個廣場非常闊大，它的四週環繞着破毀的建築物。在有一道危牆頂上，裝着一隻擴音機，從清早到深夜都不停地在轉播。它播送演講，新聞報告，還有許多的歌唱節目。它是廣播得這樣的響，以致我們用被單蒙住我們的頭還能聽到它。它是廣播得這樣的響，以致它幾乎振破了它本身的音膜，而我們常常希望它會震破。

我們想去參觀和拍攝著名的史達林格勒曳引機廠。因為當德軍的炮火在轟擊這家工廠的時候，廠裏的人還在繼續製造坦克車。而當德軍迫得太近的時候，他們就放下工具，出去保衛那家工廠，然後回來繼續工作。乞瑪斯基先生這次勇敢地與他的格里姆林搏鬥，說他可以設法給我們辦到。而在早晨，果然，我們接到通知，說我們可以去參觀了。

那家工廠在市區的邊上，當我們驅車向它駛去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它那高聳的煙囪。工廠四週已被轟得粉碎，曳引機廠的建築物已有一半被毀。我們到達廠門口，出來兩個衛兵，一望卡柏的攝影機，要我們留在那輛公共汽車裏，就回去打電話，立刻又出來了幾個衛兵。他們望一望攝影機，於是又去打電話。規則是不可通融的。我們的攝影機甚至不許拿出汽車。該廠的經理現在已和我們在一起了，還有主任工程師和半打其他的職員。而一旦我們接受了規則，他們就是極其友善的人了。我們一切都可以看，但我們却什麼都不能拍攝。我們對這件事情非常傷心，因為這家曳引機廠是像烏克蘭的小農場那樣都是一種富於啓發性的東西。這兒，在這家工人會保衛了他們自己的廠，現在還在製造曳引機的工廠裏，可以找到俄國人的抵抗精神。而這兒，在那種防禦精神最崇高和最令人嘆服的一面上，我們發現了攝影機的恐怖。

工廠大門的裏面是一個令人驚奇的地方，因為一組工人在管理集體生產的融爐和碾壓機，另一組工人則在重建破毀的廠房。所有的建築物都曾中過炮彈，大多數被轟掉了屋頂，有些已完全被毀。恢復工作和曳引機的生產同時並進。我們看見傾瀉出金屬的融爐，一大塊一大塊德國的坦克碎片和大炮碎片被當作廢鐵拋進去。我們看見金屬板從轉軸下滾出來。我們

看見融鑄、碾軋、完工、磨車零件。而在集體生產線的盡頭，滾出了上了漆和擦亮了的新曳引機，放停在停車場裏等待火車運它們到田野裏去。而在半毀的建築物之間，拿着鋼鉄、磚塊、和玻璃的工人正在重建工廠。時間寶貴，他們不能等到工廠築成以後再開始生產。

我們不懂爲什麼不許我們拍攝這家工廠的照片，因爲在走過一轉以後，我們發覺所有的機器實際上都是美國製造的，而且據說這種集體生產的方法也是美國工程師和美國技術人員來裝置的。那些技術人員當然知道並且記得他們自己的工作，所以假如美國對這家工廠懷有惡意，想來炸毀它的話，一定會利用那種情報。可是，拍攝那個工廠是禁止的。實際上，我們也並不要拍攝那家工廠。我們所要拍攝的，是那些工作的男女。史達林格勒曳引機廠裏的大部份的工作是由女人做的。但禁令無洞可鑽。我們一張照片都不能拍攝。攝影機的恐懼是深刻而盲目的。

我們也無法知道每天出產了多少曳引機的數目，因爲這是違反『洩漏工業情報與洩漏軍事情報同爲叛國罪』那條新法律的。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百分比。他們告訴我們說，該廠現在的生產量只比戰前低百分之二，而我想，假如我們需要的話，我們可以找出戰前的生產數字，籍此估計出目前的曳引機生產量。完工的機器是標準化了的，只有一種式樣。它們是負

重任的機器，並不十分大，但却能夠做任何普通的農場工作。它們不是流線型化或美化的產品，它們沒有與實用無關的部份。據說它們是極好的曳引機，但它們不是造來給人家看的，因為蘇聯沒有競爭。一家製造廠並不用『式樣悅目』這種口號來與另一家製造廠競爭。在這個地方，當炮彈穿過建築物，把工廠一點一點毀壞的時候，工人們還在製造坦克車。這家工廠使人發生一種可怕的連想，因為這兒同時存在着人類兩大可能性的結果：生產和破壞。

當卡柏不能拍照片的時候，他就唉聲嘆氣，而在這兒，他唉聲嘆氣得尤其利害，因為他的眼睛到處都看到對照、角度、和言外之意的畫面。他痛苦地說，『這兒，只要用兩張照片，我就可以描繪出幾萬字所不能描繪的事情。』

卡柏的痛苦和傷心一直繼續到午餐時候，然後他感覺得好一點了。而當那天下午我們乘着一艘小江輪在伏爾加河上巡遊的時候，他就更開心了。伏爾加在此時此地是一條可愛的、寬闊的、平靜的河流，它是担负該區大部份運輸工作的一條大路。河上行駛着渡船、遊艇、小拖船、和滿載着穀物、礦苗、木材、和石油的貨輪。從河上望過去，你可以看到該城被毀的全景。

河上有大木筏，大木筏上建築着小市鎮，有時木筏上有五六間房子，還有養着牛、羊、

和鷄的小畜欄。這些木筏是從伏爾加河極北的支流來的，木材在那兒砍伐下來，慢慢地順流而下，每到一個會遭受破壞的城鎮就停留一下。地方當局有權要求他們所需要的木材。在每一處他們所停留的地方，被要求的木材就被解開來飄到岸上去，所以當木筏順河而下時，它們的體積漸漸縮小。但那種過程須經過很久的時間，所以那些生活在木筏上的船員已在他們的木筏上建立起小小的市鎮。

河上的生活非常有趣，它使我們想起了馬克吐溫所記載的密西西比河。輪盤裝在船邊的小火輪在河上衝來衝去，有少數幾艘笨重的木船甚至還在扯風帆行駛。

我們駛近一隻大木筏旁邊，我們看見一個女人在小畜欄裏擠牛奶，另一個女人在她的房子後面涼衣服，而男人們正在解開木頭，以便連到岸上去幫助重建史達林格勒。

乞瑪斯基先生的格里姆林在史達林格勒實在工作得太辛苦了。首先是對那家公司，然後又對那家工廠，而甚至對這次小船巡遊，他的格里姆林也起勁得很。我們所需要的本來是一艘輕便的小船，以便我們可以駕着它迅速地上下行駛，而我們所得到的像是一艘像蘇聯海軍的巡洋艦那樣的大船，而船上除了船員以外，就只有我們這幾個人。我們所需要的，本來是一艘吃水很淺的船，以便我們可以靠近岸邊，但我們所得到的那艘船却只能遠離河岸，因為

它吃水太深了。我們得在獨木舟那樣的小艇之間小心翼翼地航行。那些小艇裏裝載着幾家人家到史達林格勒市場上來出售的農產品，裝載着他們的番茄、西瓜、胡瓜、以及不可避免的椰菜。

在史達林格勒的一個市場裏，有一個攝影師和一架陳舊的方箱照相機。他正在為一個僵直地坐在橇子上的嚴肅年青的新兵拍照。那攝影師掉過頭來，看見卡柏正在拍攝他和那個軍人。他向卡柏作了一個同行打招呼的微笑，揮一揮他的帽子。那個青年軍人沒有動。他直瞪瞪地凝視着前方。

我們被帶去訪問那設計史達林格勒新城市的建築局。曾有人建議要把那個城市順河移上或移下一些，不要再在原址上重建，因為清除斷垣殘瓦須化很多的時間。從頭開始可以比較方便和容易。但有兩種理由反對這個建議：第一種理由是，大部份溝渠設備和地下電路大概還是完好的；第二種理由是，為了情緒上的理由，史達林格勒應該正確建築在它原來的位置上。而這大概就是最重要的理由了。清除斷磚殘瓦的多餘工作敵不了這種感情作用。

恢復這個城市的建築計劃大約有五種，現在還不會製出塑體模型，因為他們還沒有決定究竟採用其中的那一種計劃。那些計劃有兩點是共同的，其中的一點是：史達林格勒的整個

市中心都是公共建築物，那些建築物像他們在基輔所設計的一樣宏大——龐大無比的紀念性建築物，踏級一直通下到伏爾加河的大理石大碼頭、公園、廊柱、三角形和方形的紀念碑，以及史達林和列甯的大壁刻像。這些東西已繪成圖畫，擬定計劃，並製成藍圖。它使我們又想起美國人和俄國人在兩件事情上非常相似。兩國的人民都愛機械，兩國的人民都愛龐大的建築物。俄國最欽佩美國的兩樣東西，大概就是福特汽車廠和紐約帝國大廈了。

這批建築師一方面設計重建史達林格勒的大計劃，一方面却也在推動許多小事情，如建築學校，恢復村莊，和設計小房子，因為市區的邊緣已在從事重建工作，幾千幢小房子正在陸續完成，郊外正在建築許多公寓房子。但市中心區却要留待他們的計劃能實現的時候再動手興築。

我們對那位主任工程師談到我們所看見的那些生活在地下和廢墟裏的人，我們問他為什麼不到市區邊上為他們自己造房子。

他非常了解地微笑了一下，他說，「嗯，你們要知道，這些住在地窖裏的人，本來是住在那些地窖上面的大廈裏的，而他們之所以不想搬和堅持不願意搬，有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因為他們喜歡住在那兒，因為他們是一向在那兒的，人們不願意離開他們用慣的東西，

甚至當那些東西已被毀壞的時候仍是如此。第二個理由是交通運輸問題。我們的公共汽車不夠用，我們沒有電車，假如他們搬了家，他們上工下工就得走一大段路，而這似乎太麻煩了。」

我們就問道，「但你們準備對他們怎麼辦呢？」

他說，「當我們有房子給他們搬進去的時候，我們就得使他們搬。我們希望到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有公共汽車、電車、以及其它使他們不必化很大力量上工和下工的方法了。」

當我們在建築局裏的時候，一個職員進來問我們喜不喜歡看一看世界各地人民送給史達林格勒城的禮物。而我們，雖然我們已看夠了博物館，覺得我們還是得去看一看。我們回到旅館裏去休息一會兒，而我們剛才回到旅館裏，房門上就響起了叩擊聲。我們打開房門，門外就進來一行人，手裏捧着盒子、箱子、和文書夾。他們把那些東西放下來。而這些就是贈送給史達林格勒人民的禮物。其中有一頂阿比西尼亞國王送來的用金線繡製的紅色天鵝絨頭盔。有一個美國政府贈送，由羅斯福簽署，寫滿了讚美詞句的羊皮紙卷。有戴高樂送來的一塊金屬匾，和英國國王贈送給史達林格勒城的「史城之劍」。還有一塊繡着英國一個小市鎮裏一千五百個女人名字的格布。那些人之所以拿那些東西到我們的房間裏來，是因為史達林

格勒還沒有博物館。我們得看那偌大的紀念冊，裏面寫着各國政府、各國首相和總統贈給史達林格勒市民的最誇獎的讚美詞。

一種抑鬱感籠罩了我們，因為這些是各國政府首長的禮物，一把中古式的寶劍，一頂古代式的頭盔，幾句寫在羊皮紙上的話，和許多聽來非常悅耳的語句。當我們被要求在那本書裏題字的時候，我們沒有什麼話可說。那本書裏充滿了像『世界英雄』和『文明保衛者』這一類的話。那些文字和禮物都像是用來紀念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的那種碩大無比、筋骨畢露、醜陋、愚蠢的彫塑像一樣。我們所能想到的，只是曳引機廠裏鍊鋼工人的鐵一樣的臉孔，和那些從地洞裏出來梳着頭髮去上工的姑娘，和每天晚上到公墓裏去訪問他的父親的小男孩。這些人不是無意義的人物。他們是遭受侵略並且成功地保衛了他們自己的小百姓。

由於他們想像力的貧乏，那把中古式的寶劍和繡金的頭盔實在有一點兒荒唐。當史達林格勒所需要的是半打碎石機的時候，世界給它佩上了一個不中用的勳章。

我們去參觀爲史達林格勒各工廠工人重建和新築的公寓房子。我們對工資、房租、和食物很感興趣。

公寓很小，但却相當舒服。有一間廚房，一間或兩間寢室，和一間起居室。黑色工人，

那就是不熟練的勞働者，現在拿五百盧布一個月。半熟練工人每月一千盧布，熟練工人兩千盧布。這些數目需要從食物和房租來對比才得看出它們的意義。蘇聯各地的房租，只要你能住到一間公寓，是便宜得令人難以相信的。這些公寓的房租，連煤氣、電燈、自來水在內，是每月二十盧布，佔一個熟練工人月入的百分之二，半熟練工人的百分之四。配給店裏的食物非常便宜。買普通食物，如麵包、椰菜、牛肉、魚等工人的標準食物，簡直化不了什麼錢。但奢侈品，如罐頭食物和進口貨，却非常昂貴，而像巧克力這樣的東西幾乎是誰都買不起的。但在這方面，俄國人也一樣的抱着希望，他們希望當食物數量增加的時候，價錢便會跌下來。當奢侈品的數量增加的時候，他們大家都可以買得起了。譬如說，那種多少模倣德國的伏斯魏僅式樣製造的俄國小汽車，當它的產量充分，足夠分配的時候，它只要賣一萬盧布就夠了。這種價錢是固定的，汽車一製成就分配。當你想到現在一頭牛要賣到七千到九千盧布的時候，你對於那種比較價格就可以懂得幾分了。

史達林格勒有許多德國俘虜，而像在基輔一樣，人們是不看他們的。他們依舊穿着德軍的制服，但現在已經是破舊了。他們排着隊在街上走過，去上工或是回來，通常有一個兵押送他們。

我們本來想去看漁民捕捉製造魚子醬的伏爾加大鱈魚，但我們沒有時間，因為他們都是在夜裏捕魚的。但我們確實去看了他們早晨載魚回來的情形。鱈魚大得很。它們有兩種，一種生有許多鬚鬚，形狀像貓魚，另一種長着一種鍋鏟形的長鼻頭。那一天並沒有捉到真正的大魚。最大的一條稱一稱只有六百磅重。據說它們有時可以重達一千二百磅，肚子裏可以挖出許多魚子。魚一捕獲，便立刻把魚子挖出，冷藏起來。捕魚須用極堅固和極大的網。船一靠岸，冷藏的魚子就拿出來用飛機運送到蘇聯的各大城市。有些魚在當地出售，但大多數却在燻製以後收藏起來，留到將來出賣，而它們常常可以賣到極高的價錢。

卡柏又在抱怨了；他本來想拍工業的照片，但他卻不能夠拍。他覺得不但這次旅行是一個失敗，而且一切都是個失敗，他覺得他是一個失敗，我也是一個失敗。他的抱怨是非常的深。

我們的煩躁愈來愈增加了。乞瑪斯基的格里姆林是工作得這樣過度，以致他自己也感到煩惱了。我怕我們大概對他有點表示輕蔑，所以他給我們上了一課好奇的馬克思主義，結果我們像小學生似的大聲對叫了一陣了事。卡柏給乞瑪斯基改名為乞馬克斯，而這並沒有使乞瑪斯基發揮他的優點。拆穿了說，我們的煩惱只是爲了不能在那家曳引機廠裏拍照。假使我

們互相坦白的話，我們就會得出那個結論。

而這是卡柏與我合作的最好的考驗，因為我們動怒的時候，我們從不互相動怒，我們却合力對另外一個人動怒。在我們的全部旅程中，我們從未發生過一次嚴重的爭論，而我們以為這大概也可以稱是一種破天荒的紀錄。在我們辯論的時候，乞瑪斯基說我們是相對論者，我們雖然不十分知道相對論者是什麼東西，却相當成功地合力從相對論的觀點去攻擊他。並不是我們說服了他，但至少我們守住了我們自己的陣地，並沒有被他說服，而且我們叫得比他響。

我們第二天就要起程赴莫斯科，那天晚上，卡柏沒有睡覺。他抱怨和擔心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照片。他已經得到的那些好照片忽然都變壞了。卡柏是十足的不高興。而由於我們兩個人都不能睡很多時間，我們就寫了兩部電影的摘要。

第二天早晨，我們一早就艙進我們的福特式公共汽車開赴飛機場。而那個格里姆林又在工作了，因為當我們的飛機起飛的時候，發現了一項錯誤，原來我們並沒有預定那架飛機的座位。但等一會兒還有一架從亞斯特拉干來的飛機要去莫斯科，我們可以乘那架飛機走。

那架從亞斯特拉干來的飛機還沒有到。我們就在那炎熱的飛機場上喝茶、吃大餅干、和

受苦。到三點鐘，他們傳話出來，說那架飛機是不會到的了，或是，即使它到了，也不會去莫斯科，因為想在白天到莫斯科已經太遲了。我們就爬進我們的公共汽車開回史達林格勒。

我們約摸開了四哩路左右，忽然看見飛機場派來一輛小汽車瘋狂地趕我們。看來是飛機長似乎已改變主意。他在當天下午就要飛赴莫斯科。我們調過頭來開回飛機場，而正巧在他們作了一個新決定的時候到達。飛機長已決定不飛了。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行李再搬回到我們的公共汽車裏，再回頭走那條到史達林格勒去的可怕的公路。由於我們在那輛小公共汽車的硬座位上顛簸個不停，我們身上的某些部份感到非常酸疼。

吃午餐的時候，我們對乞瑪斯基很下流。我們大發脾氣，我們告訴他許多不愉快的事情，而其中只有一部份是真的。我們告訴他說，他應該控制他的格里姆林，我們說他已被他的格里姆林弄得團團轉了。我們批評他的態度，批評他的衣服，批評他對領帶的選擇。我們對他非常殘酷，而那只是因為我們對於在那炎熱的機場上坐了一整天感到苦惱而已。

乞瑪斯基先生很煩惱。我確信他已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但他對於我們的盛怒無法抵抗，因為他得對付我們兩個入，因為我們是連成一氣跟他作戰的，一個人停口，另一個就接上來。他上床以後，我們對於我們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抱歉，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是為什麼要那樣

做的。我們懷着安琪兒似的心情上床，準備在早晨向他道歉。

到了早晨，我們極早就起身，因為我們想在史達林格勒郊外拍幾張照片，我們想拍攝人們用木板和泥土建造他們小小的新房子的照片，還有幾家新造的小學和幼稚園也是我們想去看和拍攝的。我們在一座小房子前面停下來。一個在一家工廠裏當簿記員的人正在那兒造房子。他親自把木板釘上去，他正在親自調泥和石灰，他的兩個孩子正在他附近的花園裏遊嬉。他非常和善。他一面建造他自己的房子，一面讓我們爲他攝影。然後他去拿出他的貼像簿，表示他並非一向穿得這樣破爛，證明他一度也會在史達林格勒住過一間公寓。他的貼像簿像世界上所有的貼像簿一樣。那些照片顯露出他幼小時的情形，年青時的情形，其中有他初入軍隊、第一次穿上軍裝時的照片，有他從軍隊裏回來的照片。還有他結婚的照片，他的太太穿着一件長長的白色的結婚禮服。然後是他在黑海度假期的照片，他和他太太的游泳照，以及他的孩子們逐漸長大的照片。還有人家寄給他的圖畫明信片。他一生的全部歷史和他畢生所經歷的種種幸福都在這兒了。而除了這本照像簿以外，其它的一切他在戰爭中都喪失了。

我們問道，「你這本貼像簿怎麼保存下來的呢？」

他合上封面，他的手撫摸着這一生的紀錄，說，『我們非常小心地照顧這本東西。這是非常寶貴的。』

我們回到我們的公共汽車裏，又上路向飛機場前進，這條路我們已開始非常熟悉了。在機場上，乘客除了行李以外，還帶網線袋，網線袋裏是兩三個西瓜，因為西瓜在莫斯科很稀有，而史達林格勒却有很多極好的。我們也模仿他們弄到一隻網線袋，每人隨身帶兩隻西瓜去送給京都旅館的那些人。

機場監督對於昨天的錯誤極其抱歉。他要使我們非常高興。他親自叫人給我們端茶，甚至撤了一個小小的謊話使我們感到快樂。他說，我們的飛機不久就要從黑海飛來了，那架飛機上沒有別的乘客。原來當我們攻擊乞瑪斯基的時候，乞瑪斯基就已攻擊了他。每一個人的脾氣都急躁得很，空氣裏充滿了不公平。但飛機場上很熱，草原上括着一陣夾灰沙的乾燥的熱風。那種熱風使人焦躁暴戾，所以他們就互相下流，而我們是像旁人一樣的下流。

我們的飛機終於飛來了。它是一架吊桶式座位的飛機。但它並不僅僅載我們這幾個乘客，它已是一架載客過度的飛機。乘客大多是去慶祝莫斯科築城八百週年的喬其亞人。他們已把他們的行李堆在飛機中間，幾乎每一個座位都已坐了人。他們是準備好了食物來的。他們

的箱子裏裝滿了食物。

當我們進去，機門關上以後，飛機裏簡直要使人窒息了，因為，像大多數吊桶式座位的飛機一樣，機身沒有絕緣的設備，射在金屬機殼上的陽光一直熱到飛機內部。氣味怕人，是人的氣味，是疲倦的人的氣味。我們坐在金屬的吊桶式的座位裏，而那種座位也真像吊桶，坐在上面並不比坐在小咖啡館的高腳圓凳上舒服好多。

飛機終於起飛了，而它一起飛，坐在我旁邊的一個男人就打開他的衣箱，切下半磅熟得走油的冷鹹肉，坐着大嚼起來，他的下巴上直淌油脂。他是一個好人，有一對有趣的眼睛，他給了我一塊，但我那時並不想吃。

飛機裏本來很熱，但一旦它爬到高空，情形就改變了。金屬板上的水珠變成了冰和霜。我們在飛機裏就像在冰箱裏一樣。我們這次到莫斯科去接受了一次痛苦的旅程，因為我們只有很單薄的衣服，而那些可憐的喬其亞人在飛機裏縮成一團，因為他們是從熱帶來的，這種酷寒是他們所不習慣的。

乞瑪斯基在他的角落裏縮成一團。我們覺得他已開始在恨我們了，他只需要一樣東西，就是把我們送到莫斯科，擺脫我們。我們接受了四個鐘頭難受的冰凍才在莫斯科降落。而

乞瑪斯基的格里姆林一直跟他到盡頭。他曾拍電報要人派一輛汽車來接我們，但那個電報被人看錯了，所以沒有汽車來接我們。要等一輛車子來接我們，得化兩個鐘頭。但一個騙子出來了。當人們在痛苦的時候，總會出來一個騙子，這是世界各地的通例。這個騙子可以設法弄到一輛汽車，而他的確弄到了，只是要了一個極高的代價，而我們就乘着那輛汽車到薩服伊旅館。

我們談到一個共產主義政權或社會主義政權的領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長壽一定是感到非常厭倦的了。你剛在一個地方把它踏熄，它就又在另一個地方活了轉來。它就像是蚯蚓一樣，你把它割成兩段，每一段還是可以單獨活命。在莫斯科，資本主義的小而球到處在蠕蠕地活動：黑市場上的人，把他們雇主的車子出租的汽車夫，還有那些拿着什麼東西出租或出售的不可避免的騙子。什麼地方有騙子，什麼地方就有資本主義。我們化了五百盧布進莫斯科。我們的那位騙子對於交易有極敏銳的感覺。我確信他曾對我們的疲乏、我們的焦躁、和我們的經濟作了一個迅速的估計，他提出五百盧布這個鉄硬的價錢，而我們付出了那個價錢。

我們對清潔有一種強烈的慾望，因為在史達林格勒，除非穿了浴衣到河裏去洗，沒有洗澡的地方，所以我們切盼想爬進熱水缸裏，泡一泡，擦一個痛快。那尊「瘋」伊拉像對我們

是老朋友了，而我們把三層樓上那隻身體裏塞了稻草的熊確實擁抱了一下。我們覺得它一點都不兇猛了。而我們那隻搖擺蹣跚腳的浴缸變成了我們生平所見最美麗和最奢侈的東西。在我們新發現的那種渴望清潔的熱情下，我們洗脫了兩三層皮，而卡柏則一再擦洗他的頭髮。他有一頭好髮，非常厚，而且非常黑，而因為我依舊還感到有一點下流，所以當他第三次洗完頭出來以後，我就說，使人遺憾的是：他的腦後有一個小禿疤。他跳了起來，飛快地轉過來對我猛烈地否認。於是我就拿了他的一隻手指，把那隻手指放在那覆住瘡疤的頭髮上，而他似乎也摸到那兒的確有一個禿疤了。這是一件殘酷的事情，因為我引他的手指所摸的地方，是他在鏡子裏不可能照到的。他用他的手指在腦後偷偷地摸了很久。我之所以這樣做，只是因為我覺得下流。

後來甜喬意來看我們，我們吃了一頓輕鬆的午餐，往床上一倒，就死掉了。莫斯科的空氣濃厚而冷，天生適宜睡覺，我們睡了許多點鐘才起來。

信件終於到了；我們來俄國才只有二十五天，而我們似乎覺得已有幾年不通音訊。我們貪婪地讀信。而雖然我們以為已離國這麼久，國內寫信的人却毫不以為我們已來了很多時候。這是一個驚奇。我們收集我們的配備，把我們的髒衣服送出去洗，卡柏整理他的軟片，拿

出去沖洗。

他檢視送回來的底片，開始苛刻地抱怨起來。我本來可以預料得到。它們沖洗得不對。沒有一樣東西是對的。片上的顆粒太多，這一捲在定影藥水裏浸得時間太久，那一捲又時間不夠。他氣極了。而由於我會對他殘酷，我就嘗試安慰他，說它們是世界上最好的照片，但他却用鼻子向我哼了幾聲。而由於我會對他殘酷，我就把他所有非攝影的配備都整理好：給他的打火機加滿汽油，削尖他的鉛筆，給他的自來水筆灌上墨水。

卡柏有一種奇特的性格。他也買打火機，但一旦打火機裏的汽油用完，他就把它擱在一邊，永不再用它了。自來水筆也是如此。當自來水筆裏的墨水用完的時候，他決不再灌墨水。他用一支鉛筆，要一直用到把筆尖磨平，然後那支鉛筆也被擱在一邊了。他會另買一支鉛筆，但他却從不削鉛筆。我給他的打火機加火石加汽油，削尖他所有的鉛筆，給他的鋼筆灌滿墨水，使他可以再出去面對世界。

在我們到俄國去以前，我們不知道需要用到那一類的配備，所以我們在法國買了一把神妙的小刀。那把小刀的刀鋒幾乎可以救治世界上一切的物质情形，而且還可以救治幾種精神局勢。那把小刀上有剪刀、鑽子、鋸子、開罐頭刀、開啤酒瓶刀、拔瓶塞的螺旋鑽、從馬蹄

鉄上取出石子的工具、一柄進食的工具、一柄殺人的刀、一把螺絲旋、和一柄鑿子。你可以用它們來修理一隻鐘錶，也可以用它來修理巴拿馬運河。它是任何人生平所見的最神妙的小刀，我們已將近帶了它兩個月，而我們唯一曾對它的利用是用它來切香腸。但我們必須承認，那把刀切香腸的確切得非常妙。

我們到先驅論壇報辦事處，飢餓地閱讀過去兩星期來的消息和電報。我們讀大使館的公報，讀英國新聞處的新聞資料。我們甚至讀演講稿。卡柏在京都旅館外國記者的房間裏嗅來嗅去，轉來轉去地偷書。

我們甚至還去參加一次鷄尾酒會，那是英國大使館新聞處舉辦的，發給我們的請帖是勉強去要來的。我們的行為壞。我們向我們所認識的每一個人討、借、和哀聲苦惱地乞求香煙，並荒謬地答應我們在回國以後就立刻寄許多許多條香煙給他們。我們兩人每人每天洗三次澡，用完了我們所有的肥皂，於是又不得不向其他記者討肥皂用。

一個合法的抱怨

——羅拔脫·卡柏著——

我一點兒也不快樂。十年以前，當我開始靠拍攝那些被畫着小小的卍字徽的飛機轟炸的人們爲生的時候，我曾看見幾架畫着小小的紅星的小飛機擊落那些畫着卍字徽的飛機。這是瑪德里在內戰時期的事情，而這使我非常快樂。我那時就決定，我要去看看那些塌鼻子飛機和駕駛員所來的地方。我要去訪問蘇聯，並在蘇聯拍攝照片。我那時就送出了我的第一張申請書。在這過去的十年內，我的俄國朋友們常常很焦躁和難以接近，但當戰事開始嚴重的時候，他們多少與我所站着的這一邊消釋了一些舊嫌，而我就又送出了許多次申請書。那些申請書從來不會得到過答覆。

159

去年春天，我所站着的這一邊對俄國人突然非常的不高興了，這一次，有相當大的壓力要使我們互相撕打起來。飛盤和原子彈是非常難以攝影的，所以我就決定在時局尚未太晚以

前再作一次申請。這一次，我在一個有很大聲譽、相當熱忱、和對下層人民頗能了解的人的身上找到了某種支持。他的姓名叫約翰·史坦倍克，而他對我們這次旅程的準備工作是非常別開生面的。首先，他告訴俄國人說，把他看作世界無產階級的一根支柱是一個大錯，實際上，假如把他描寫為一個頹廢的西方國家的代表，倒更貼切一些，實際上，他的『西』，一直竟『西』到加里福尼亞的最下層社會裏。同時，他聲明他只能寫真理，而當人家客氣地問他真理是什麼東西的時候，他答道，『這個我倒不知道。』而正當開始允許我們去的時候，他從一個窗口裏跳出來，跌破了他的膝蓋。

那是幾個月以前的事了。現在已是深夜了，我正坐在一間極其陰森的旅館的房間中央，我的週圍是一億九千萬俄國人，四架照相機，幾打曝光過的軟片和更多未曝光的軟片，和一個睡着的史坦倍克，而我一點兒也不快樂。那一億九千萬俄國人反對我。他們沒有在街角上舉行瘋狂的集會，並不實行特別的自由戀愛，沒有任何種類的新花樣，他們是非常正直、規矩、和刻苦工作的人民，在一個攝影者看來是像嚼蘋果餅一樣的無味。同時，他們似乎很喜歡俄國的生活方式，不喜歡被人拍照。我那四架在歷次戰爭和革命應用過的攝影機遭到了人們的厭惡，每一次我喀嚓一聲用它們的時候，總是要出一些毛病。同時，跟我在一起的不是

一個史坦倍克而是三個史坦倍克。

我的日子非常長，而我每天開始的時候就和早晨的史坦倍克在一起。當我醒來的時候，我小心地張開我的眼睛，而我就看見他坐在寫字枱前面。他那本大筆記本已打開在那兒，他在假裝工作。實際上，他只是在等待着，注視着我的第一個動作。他已餓得發慌了。但早晨的史坦倍克是一個非常怕羞的人，絕對不能拿起電話來與俄國女侍者作明白的表示，甚至不敢有一點點那種企圖。所以我就只能放棄我的床，爬起身來，拿起電話，用英語、法語、和俄語要早餐。這一來，他的精神復活了，而且使他有點自大起來了。他會擺出一臉那種束脩拿得太多的鄉下哲學家的神氣說，「我今天早晨有幾個問題要問你。」他顯然是把他挨餓的那三個鐘頭化在設想這種混帳問題上的，問題的範圍從古代希臘人的吃飯習慣一直到魚類的性生活。我用一個美國好公民的態度對付他，而雖然我可以簡單明瞭地回答這些問題，我却堅持我的公民權，拒絕作答，聽任這件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他是不輕易罷休的，繼續自誇他這種天南地北的學識，想用幫助和教育來激怒我，而我就只能流亡了。我躲避到浴室裏，我本來很厭惡那個地方，但我強迫我自己留在那注滿了冷水的沙皮底浴缸裏直到早餐到來。這有時得化很多時候。吃過早餐，我得到幫手了。乞瑪斯基來了。乞瑪斯基的性格是沒有早晚

之分的，他是從早到晚都是壞的。

在白天，我得與那一億九千萬不願意被人拍照的人搏鬥，得與那輕視攝影的乞瑪斯基先生搏鬥，還得與那早晨的史坦倍克搏鬥。史坦倍克對那些好奇而英雄崇拜的俄國人所提出的一切問題都友善地咕嚕一聲『我不知道。』說了這句單調的話以後，他已精疲力盡了，像一隻蛤蜊似的閉緊嘴巴，他那賽拉諾式的臉孔上爆出大滴的汗珠。於是我不能拍照，只得爲史坦倍克先生這種古怪的沉默想出幾句聰明的遁辭，於是我們就糊里糊塗地混過了一天，擺脫了乞瑪斯基，又回到家裏來了。

經過一個短時間的智力的嬉謔以後，晚上的史坦倍克開始了。這個新角色是完全能夠拿起電話說『伏特加』或『啤酒』這一類即使最聾的侍者也能聽得懂的字眼的。有了相當數量的酒下肚以後，他就變得口齒明白流利，對一切事情都有許多確定的意見了。這種情形一直繼續下去，直到我們找到了幾個有香煙、酒、和差強人意的太太、並且尙未拒絕我們拜訪的美國人爲止。假如場面上有任何漂亮的姑娘的話，他就一定要保護我，把他的位置選擇在那位姑娘和我之間，假如我想以邀她跳舞來拯救那位天真的姑娘，則不論他的腿跌破到怎樣的程度也不足以阻止他幾乎立刻來攔截了去。

午夜以後，他的天真加倍有力了。他用一隻手指表演他的天真。他問那些天真的丈夫，問他們知不知道玩手指戲。於是那兩位先生就面對面地隔着一張桌子坐下來，把他們的手肘緊緊地按在桌布上，把他們的中指緊緊勾在一起。經過相當時間的扭絞以後，史坦倍克先生通常總是把那個丈夫的手指捺到桌布上，然後口若懸口河地爲他自己抱歉。有一次，甚至一個看上去顯然像一位將軍的俄國人也給他擊敗了。

經過相當時間的花言巧語和放浪形骸以後，我們回家了。這時已經是早晨三點多鐘了。那晚上的史坦倍克就化身爲深夜的史坦倍克了。他已睡在床上，緊緊地握着一部兩千年前寫成的厚厚的詩，那部詩的名字叫『虎皮騎士』。他的臉孔已完全鬆弛，他的嘴巴張開着，而那個說話很審慎的人就毫不知道自制地打起呼嚕來了。

我幸而從琪爾摩那兒借來一本偵探小說，我之所以借這本書，只是因爲我知道我無法睡覺，必須讀書到天明。

說到這裏，我要向高貴的美國讀者們告別了，而我在這裏向高貴的俄國讀者聲明！乞瑪斯基先生將來在真理報上所寫的關於我們的一切是絕對真實的。

抱怨完了。

第七章

不論我們到俄國的什麼地方，在莫斯科，在烏克蘭，在史達林格勒，人們常常提起喬其亞這個神奇的名字。那些從未到過那兒，並且可能永遠不能到那兒去的人，用一種渴望和極其羨慕的口吻談到喬其亞。在他們的談話中，喬其亞人是超人，是偉大的豪飲者，偉大的跳舞家，偉大的音樂家，偉大的工作者和情人。他們談到高加索和黑海週圍那一帶地方的時候，就像談到了第二天堂一樣。的確，我們已開始相信：大多數俄國人都希望，假如他們過着一種善良和道德的生活，則他們死後不會進天堂而會到喬其亞去。那個地方氣候優良，土質非常肥沃，並有它自己的小小的海洋。對國家有大功的人，可以獲得到喬其亞去旅行一次的報酬。它是一個人民在久病以後靜養的地方。甚至在大戰期間，它也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因為德國人從不會到過那兒，德國飛機或德國軍隊都不會到過那兒。它是毫無損傷的地方之一。

我們不可避免地一早就到莫斯科飛機場，在特別候機室史達林的畫像下面坐了一個半鐘頭，喝了一個半鐘頭的茶。前一天晚上照常有一個歡送會，而我們簡直不曾睡覺。我們上機以後就睡覺，一直睡到在羅斯托夫降落。這個飛機場會遭過極利害的破壞，一大批戰俘正在重建機場的設備。遠遠地，我們可以看見那座曾在戰爭期間發生過慘烈爭奪的破碎的城市。

然後我們飛越那一片無窮盡的平原，直到最後我們遠遠地看見了大山，而我們已有很多時候不會看見過任何大山了。那是極大的山脈。我們爬到高空，高高地飛越高加索山脈。我們的眼下是高峯和陡峭的山背，山背之間有溪流，那兒，我們可以看見古老的村落。有些山峯甚至在夏天也是戴着雪帽的。看過了這麼多的平地以後，再看見山脈使人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我們爬得非常的高，我們可以遠遠地看到黑海。我們的飛機向它飛下去，沿着陸地的邊緣飛。小山一直伸延到海邊，山坡邊上有可愛的樹木，黑色的杉柏和許多簇葉樹。小山之間有村莊、大房子、和醫院。這簡直是加里福尼亞沿岸，只是黑海不如太平洋那樣波濤洶湧，海岸也不是岩石的。海是非常的藍，非常的甯靜，海灘非常的白。

我們的飛機沿着海岸飛了很多時候。最後它在蘇克享機場降落了。那個機場是海邊一條

狹長形的平坦的草地。草是非常的綠，機場週圍排列着友加利樹，我們在俄國看見友加利樹，這還是第一次。建築是東方式的，到處都是花和開花的樹。那個小飛機場的前面站着一行賣水果的女人：葡萄，甜瓜，無花果，西瓜，和顏色很美麗的桃子。我們買了一些葡萄和幾隻桃子和無花果。飛機上的人向水果進攻，因為他們是北方人，從來不會真正吃夠水果。他們大嚼了一頓，其中有許多人等一會兒必定要生病，因為他們的腸胃系統是不習慣水果的，一次吃得太多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後來果真如此。

我們以為在二十分鐘之內就要飛赴底弗里斯，但機上的人員却並不這樣想。他們乘了一輛汽車到海裏游泳去了。他們去了兩個鐘頭，而我們則在機場的花園裏漫步。我們本來也很願意去游泳，但我們不能那樣做，因為我們不知道那架飛機不會在二十分鐘之內離開。空氣溫暖、潤濕、並且帶鹹味，植物粗大、碧綠而飽滿。這真正是一個熱帶的花園。

這些喬其亞人的面貌與其他的俄國人不同。他們的皮膚很黑，幾乎像吉卜賽人，有發光的牙齒，長而端正的鼻子，和鬆曲的黑髮。幾乎所有的男人都蓄鬍鬚，他們比女人更漂亮。他們瘦而有力，他們的眼睛黑而發光。我們從書上讀到並且聽到人家說，這是一支古老的猶太民族，是在巴比倫尚未成爲一個城市以前從幼發拉底流域遷徙來的；他們是索馬人，是世

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人種之一。他們暴躁、驕傲、兇猛、而樂觀，俄國的其它民族非常崇拜他們。他們老是談到他們的精力、活力、和能力——是偉大的騎兵和良好的戰士。這兒的男子是俄國女人追求的對象。他們是一個擅長詩歌，擅長音樂，和擅長跳舞的民族，而按照傳統來說，又是偉大的情人。他們生活在一個得天獨厚的地方，而爲了確保這個地方，他們曾打了二千年的仗。

快要兩點鐘的時候，機上的人員回來了，他們的頭髮依舊還潤濕着在黑海裏游泳所沾到的水。我們希望我們也曾跟他們一起去，因爲我們已遍身是汗。天氣非常熱，有些乘客已開始感覺到水果吃得太多的效果。有幾個孩子已經病了。

我們又離開地面，低低地在海面上飛，然後開始爬高，爬得非常高，飛越消瘦的、棕褐色的、像加里福尼亞的山脈那樣的大山。山脈的摺縫深處有小小的溪流，我們可以在溪流兩旁看到蔬菜和市鎮。山脈的這一部份光禿而猙獰可怖，它所反映的陽光刺得人眼花。然後我們飛過一個兩旁的山頭與我們齊平的山隘，飛越到底弗里斯平原上空。

這是一個廣闊乾燥的平原，看上去很像美國的新墨西哥州。當我們降落的時候，空氣熱而乾爽，因爲這兒已經離海很遠了。但這兒的熱使人熱得爽快，並沒有不舒服的感覺。這個

包圍在高山之間的大平原從空中看去似乎是荒蕪的。

我們降落在一個很大的飛機場上。那兒有許多飛機——俄國戰鬥機。每次有兩架飛來就有兩架起飛，它們經常在機場四週回旋。它們大概是在巡邏離此並不很遠的土耳其邊境。

在我們西邊的一個高山背上有一座大古堡，城梁高聳，黑黯黯地襯托着天空。

乞瑪斯基先生又跟我們在一起。我們已宣佈休戰：我們當比在史達林格勒的時候對他好，而他對我們也當比在史達林格勒的時候好。他也從來不會到過喬其亞。

文協底弗里斯分會派了一個代表團來迎接我們，他們有一輛很好很大的汽車，而他們都是好人。我們驅車駛過那坦盪乾燥的平原，駛進一個山隘。而在這個山隘裏，就躺着許多世紀以來自南至北的大道上的一個美麗城市——底弗里斯。兩旁的山脊上排列着古老的碉堡，甚至那個城市本身也在山脊上的一個堡壘的控制之下。山隘那一段的口上也有一座堡壘，因為歷代的移民——從南方來的波斯人、伊朗人、伊拉克人，以及從北方來的韃靼人和其他劫奪者——都曾經過這個狹隘的山隘。戰爭就發生在這個狹隘的山隘裏，所以他們在這兒築起了防禦工事。

城市的一部份非常古老，一條河流穿過山隘，河的一邊是很高的懸崖。在那個懸崖上，

叢集着古老的房屋。它確實是一個古老的城市，因為莫斯科今年慶祝它的築城八百週年紀念，但底弗里斯却將在明年慶祝它的一千五百週年紀念了。而這是新都，舊都在那條流河下游三十公里的地方。

底弗里斯的街道很寬闊，街道兩旁樹蔭濃密，許多建築物是現代化的。街道向兩旁的山上爬。在西邊的山頂上，有一個運動場和公園，有一條繙車鐵路沿着懸崖直身上去。它是一個極大的公園，附設着一家大酒館，可以遠眺到許多哩以外的平原。在山脊上，正在市中心，兀立着頹毀而可怖的大圓塔和高聳的鋸齒形的城堞。

在市區和山脊上，有古老的教堂，因為喬其亞人在四世紀的時候就已接受基督教，那時所建築的教堂現在還在使用。這個城市流傳着許多古老的故事，大概也有許多古老的鬼魂。據有一個故事說，一個信奉回教的伊朗國王曾聚集大軍逼迫被俘的底弗里斯人民走到跨越河流的那道橋上，在橋上豎起一幅聖母像，誰要是肯向那幅聖像吐口水，就可以釋放，凡是拒絕的人就被殺頭。而據那則故事說，那天竟有幾千個人頭落到河裏。

底弗里斯的人比我們在俄國其它任何地方所見到的人穿得更好，長得更好看，也更精神飽滿。衣服很漂亮，女人的頭上包着彩色的頭巾。

這個城市清潔得令人難以相信。它是我生平所見的第一個清潔的東方城市。在那條穿越市中心而過的河流裏，有成百的小孩子在游泳。除了時間對古老的建築物所作的破壞以外，那兒不會遭到其它的破壞。

文協在庇弗里斯有一個非常大和非常有效率的機構。因為這是一個遊客的城市，文協不但與外國人聯絡，而且還得與那些從蘇聯其它共和國來的訪客聯絡。他們邀請我們到他們那座極其富麗的大廈裏，而雖然時間已在深夜，他們還爲我們預備了極妙的餅，極好的喬其亞酒，他們還要跟我們談話。與我們喝酒。但我們已疲倦得一塌糊塗了。我們答應我們將來可以跟他們稱心如意地詳談，但現在我們要上床了。

在我們逗留在喬其亞的那個期間內，乞瑪斯基先生的格里姆林簡直毫未活動，這使我們對他增加了幾分好感，也使他對我們增加了幾分好感。

我們在旅行社旅館裏得到兩個大房間。那兩個房間是向街的，三面有窗，所以任何方向的風都可以吹進來。地方使人非常愉快。只有一項困難：我們弄不到早餐吃。在我們逗留在那裏的全部期間中，我們曾嘗試想一早就吃早餐，而我們從未成功。它總是要等到他們弄好的時候才拿來。

早晨我們起身得非常早，因為那個城市迷惑了我們，我們想多看到一點東西。我們的司機照例是一個好人，是一個退伍的騎兵，而更好的是，他有一輛吉普車。吉普車並不是在每一個人手裏都能發揮它的優點的，但到了一個騎兵手裏，它就像一頭牛到了牧童手裏一樣了。他愛這輛吉普車，因為它幾乎可以筆直地爬山，因為他可以駕着它稱心如意地轉彎抹角，可以使它跳過溝渠。它衝到溪溝裏，潑起一片水花，爬到對面的岸上。他駛車像一個瘋子一樣，他是誰都不怕的。有好幾次，在交叉口上，其他盛怒的司機迫他停下來，於是大家就交換幾句兇惡的喬其亞話，然後我們那位司機就微笑着駛車走開。他每次都打勝仗。我們愛他。在我們所遇到的俄國人之中，對警察與我們有同感的，他是第一個。當他駛車的時候，他那黑色的鬚髮在他的頭上狂舞。他從不想停止。

他把吉普車虎虎地開上山，開到該城最古老的一部分。那兒還保存着古色古香的喬其亞木頭房子。那些房子的建築很奇怪，通常有三四層高，有露天的大陽台。牆壁上的彫刻和繪畫是外國風味的。

我們順着山脊去看那座有圓塔和又高又厚的城牆的古堡壘；假如沒有大炮，它或許是永遠難以攻陷的，因為除了炮轟以外，簡直沒有方法可以攻擊它。

我們步行穿過該城的熱帶花園。開花的樹和許多我們生平從未見過的奇花異草把那座花園點綴得很美麗。花園裏很涼爽，園旁有一條溪水流過。

我們在庇弗里斯並無陌生的感覺，因為庇弗里斯有許多遊客，它已看慣了外國人，所以我們並不像在基輔那樣的引人觸目，我們感覺很自在。

庇弗里斯有許多教堂，它在過去和現在都一定都是一個宗教上很寬容的城市，因為那兒有古老的猶太教堂和回教寺院，而它們從來不曾遭到過破壞。

在山的高處、俯視着全城的，是那樸素美麗的大衛教堂，那座教堂我相信是在七世紀的時候建築起來的、我們的司機把他的吉普車盡可能地駛到最高的地方，其餘的那一段路由我們自己徒步爬了上去。許多人從曲折的山道爬上那座教堂裏去，許多人到那兒去做禮拜。

這座古老的教堂極為喬其亞人民所喜愛，喬其亞大作家、大作曲家的坟墓都築在那座教堂的院子裏。史達林的母親也在那兒埋在一塊非常簡單的墓碑下面。一位作曲家的墓旁坐着三個老婦人和一個老頭子，他們正在用一種古老的、柔和的、像唸咒似的音調唱悼歌。

老教堂裏正在做禮拜，有很多人在那兒唱讚美詩。上山的人走完那段羊腸小道踏進教堂的園地以後，每一個人都跪下來吻一吻教堂的一角。

這是一個僻遠靜穆的地方，屋瓦連片的城市遠在下面。我們可以看到那座由泰瑪拉女皇建立的植物園。泰瑪拉是十二世紀時鼎鼎大名的一個女皇，她在這個城市上留了一個英勇的陰影。泰瑪拉女皇美麗、仁慈，而兇猛。她懂得治國的經略和建築學。她建築堡壘，鼓勵詩人和音樂家聚在一起——是世界上的神化女皇之一，像伊麗薩白女皇，阿拉貢的凱塞琳女皇，和亞昆丁的伊麗諾女皇一樣。

當我們從大衛教堂下來的時候，大教堂的鐘正在猛敲，我們就走了進去。那家教堂很富麗，有東方色彩，它的壁畫已因香火燻蒸和年代久遠而變得非常黑。儀式由一個老頭子領導進行。他滿頭白髮，頭戴金冠，看上去是這樣的美麗，簡直不像是真的人。這個老頭子稱爲大主教，他是喬其亞教堂的首長，他身上那件長袍是金線織成的。儀式非常莊嚴，大合唱的音樂是無可比擬的。香烟昇到教堂高高的天花板上，陽光透過香烟，照亮了它。

卡柏攝了許多照片。看他悄悄地溜來溜去在人不知鬼不覺之中拍照，實在令人驚奇。後來他又走到合唱壇上，拍了更多的照片。

且慢，在我這篇記載裏，我已開始在漏過博物館了，但我們是見到博物館的，我們在每一個地方都看見它們。正如卡柏所說的，博物館是現代俄國的教堂，拒絕去參觀一家博物館

有一點兒像拒絕去訪問一家教堂。而它們是大體類似的。博物館裏有一部份陳列革命以前俄國過去的史實；從一九一八年的歷史開始，至少博物館的一半地方是講俄國革命以來的事情的，敘述革命的種種收穫，革命所牽涉的人，陳列着革命英雄和革命史實的大幅圖畫。

底弗里斯有兩家博物館。其中的一家是市博物館，就在該市的山脊上，其中有非常精美的雛型古代房屋和古代城市的圖樣。但最有趣的是，這家博物館裏有一個導遊者。那個人一定會當做演員，因為他高聲大叫，手舞足蹈，他發表演講，戲劇化地大哭大笑。他講話講得這樣的快，以致不可能翻譯，而本來也就無法翻譯，因為乞瑪斯基先生是不懂喬其亞話的。我們像聾子似地走出這家博物館，但很快樂。

在到這家博物館去的山脊路旁，有一幅大概是蘇聯最大和最壯觀的史達林像。它是一個似乎有幾百呎高的龐然大物，用霓虹燈勾出輪廓，它現在雖然壞了，但據說在未壞的時候，在二十八哩路以外都可以看到它。

可看的東西是這樣的多，而去看它們的時間却是這樣的少，以致我們在全部訪問期間內都像跑短跑似地衝來衝去。

下午我們去看一場底弗里斯代表隊和基輔代表隊的足球比賽。他們在大體育場裏表演又

快、又好、又兇猛的足球比賽。觀眾至少有四萬人，他們興奮得很，因為這種兩個共和國之間的比賽是非常吸引人的。比賽雖然粗魯而快速，競爭雖然非常劇烈，但却毫不動火。那天下午只發了一次小小的爭論。比賽以二對二宣告結束，當比賽完畢的時候，放了兩隻白鴿子。根據喬其亞往常的慣例，不論什麼比賽，甚至打仗也是一樣，假如勝利了，就放一隻白鴿子，假如失敗，就放一隻黑鴿子。這種鴿子把消息帶到喬其亞全國的其它城市。這一天，因為比賽的結果是一個和局，所以白鴿子和黑鴿子都放了出去，它們在體育場上空漸漸飛遠。

足球在蘇聯是最普遍的運動，共和國與共和國之間的足球賽比任何其它體育事件更能轟動。我們逗留在蘇聯的期間內，我們所聽到的唯一真正熱烈的爭論都是關於足球的。

我們去遊覽庇弗里斯的百貨商店。百貨商店裏塞滿了人。貨架上的商品很充足，但價錢，尤其是衣服的價錢，却非常高：棉質襯衫六十五盧布；橡皮套鞋三百盧布；一架手提打字機三千盧布。

我們化了一整天的時間去玩該城的公共游泳池和公園。在工人公園裏，我們看見一種很有趣的兒童火車。它是一種真正的小火車，一切都應有盡有。駕駛員、撥道夫、站長、火夫、都是兒童。他們是在效率競賽中獲得他們的職位的，他們的火車不論小孩子或大人都可以

乘坐。我們與烏茲貝克的一個兒童代表團一同乘那種火車。那個代表團是應底弗里斯兒童的邀請而來的，這下午的火車已撥歸他們乘坐。當駕駛員的那個小男孩非常自傲。車站上的設備也是應有盡有，只是規模較小而已。孩子們非常正經地執行他們的任務。在兒童鐵路上面做一個職員，在一個底弗里斯的孩子是一個很大的光榮，所以他努力工作保持他的職位。

喬其亞的食物是蘇聯全國聞名的，但我們的弗家旅館却與那種名聲無關。它的菜單幾乎總是一道湯和一盤番茄片，我們已有點兒吃厭了。那天晚上，乞瑪斯基和卡柏和我決定到另一家餐館去實驗一番。我們到底弗里斯旅館，那兒的餐廳大得像一家教堂的聚會廳一樣。餐廳裏的大理石柱直頂到屋頂，還有一個奏得極響但却奏得極壞的樂隊，而根本沒有食物。我們沒有吃到湯，却吃到幾小塊煎肉——還有番茄片。

當我們正在吃的時候，侍者過來說，「有一位女太太很願意跟你們兩位先生之中的任何一位跳舞。」

乞瑪斯基為我們翻譯，他帶着一種不以為然的神色望着那侍者。他說，「那無疑地是一個娼妓。」

我們就說，「一個娼妓有什麼關係呢？她長得漂亮嗎？」

乞瑪斯基繃起他的臉。我們這一桌上只有他可以看得見她。『不，』他說，『她醜極了』

我們說，『我們認為應該取締她。我們認為她是一個社會的禍害。我們以為一個醜陋的娼妓是對整個社會機構的一個威脅，是對家庭、公共安全、母愛等等的一種威脅。』

於是乞瑪斯基就陰沉沉地點點頭，表示同意我們的意見。這實在是我們在任何事情上第一次取得同意。

我們又說，『在另一方面，假如她長得漂亮，那就情有可原了。那或許是由於某種社會的不公。假如她長得漂亮，我們就主張調查她的背景，找出是什麼社會困難使她淪為一個娼妓，然後，或許設法使她恢復為一個良家婦女。』

乞瑪斯基開始用一種懷疑、詢問的眼光看我們了。他不十分信任我們。

我們是背對着那個娼妓的，但我們終於偷看了一眼，而他說得很對，她長得並不漂亮，我們不知道他們究竟取締了她沒有。

底弗里斯夏天的晚上妙極了，空氣柔和、輕鬆、並且乾爽。青年男女漫無目的地在街上漫步，享受着他們的青春。青年男子的衣服相當好；上身穿制服，有時是厚厚的綢子做的翻

服，腰間束皮帶，下身穿褲腳管很狹的長褲，腳上穿着柔軟的黑皮靴。喬其亞的男人是一種非常漂亮的人種。

從那些古老的房子的陽台上，我們可以在夜裏聽到溫柔的歌聲，有一種像曼特林那樣的挑撥的樂器隨歌伴奏，偶或也可以在一條黑洞洞的街裏聽到笛聲。

在我們看來，喬其亞人似乎比我們前此所見任何地方的人更輕鬆，他們輕鬆而兇猛，充滿了歡笑。而這或許就是俄國人這樣崇拜他們的原因。這或許就是他們所喜歡過的生活方式。

西邊的山頭上有一個大月亮，它使那個城市似乎更神祕和古老了，山脊上的那座大碉堡黑黝黝地兀立在月亮前面。假如世界上有什麼地方的確有鬼的話，它們一定就在這兒，假如泰瑪拉的鬼魂的確是有的話，那天晚上她一定在月光下的山脊上散步。

第八章

庇弗里斯的作家協會邀請我們去參加一次小小的招待會。我們必須承認有一點兒嚇慌了，因為這種集會照例是極其文學性的，而我們却不是十足學文學的人。而且，我們現在已知道喬其亞人對文學的態度非常嚴肅：詩和音樂是他們對世界文化的大貢獻，而他們的詩是非常古老的。他們的詩不是只有少數人讀而是每一個人都讀的。在山上的墓地裏，我們曾看到他們的詩人埋葬得像他們的國王一樣的煥赫，而常常是：一位詩人有人記得，一位國王却被人忘記了。一位曾寫過一首長篇史詩『虎皮騎士』的古代詩人羅斯維里在喬其亞幾乎被尊為一個民族英雄，他的詩甚至小孩子都能記得，他的畫像是無所不在的。

179

我們很怕那次作家的聚會或許會使我們難以應付，但我們還是去了。召待我們的約摸有二十個男人和三個女人。一個大房間的四週擺着椅子，我們就面對面地在椅子裏坐下來。首先發表了一篇歡迎我們的演講，那篇演講未經翻譯，我們的那位歡迎者就說，『現在請某某

先生來讀一篇喬其亞文學的簡短概述。」

坐在我右手的一個男人打開一夾文件，我可以看到那是密密地用打字機打成的。他開始誦讀，而我則等待翻譯。聽了一段以後，我突然明白他原來是用英語讀的。我開始感到興趣了，因為在十個字裏面，我只能懂得一個。他的發音是這樣的奇特，以致那些字眼雖然是十足的英語，但當他讀出來的時候，聽來却簡直不像英語。他讀了二十張打字紙。

後來我弄到那份原稿來看，那原來是一份簡明精緻的喬其亞文學史，從最早的年代一直講到現在。

由於房間裏的大多數人都根本不懂英語，所以他們都坐在那兒親切地微笑，因為在他們聽來，他所讀的是十足的標準英語。他讀完以後，首先演講的那個人說，「你現在有什麼問題嗎？」

而由於我對於聽到的東西只懂得極少的一點點，所以我只得承認我沒有問題。
房間裏很熱，卡柏和我的胃都已有一點兒小毛病，所以我們覺得並不舒服。

現在一位女太太站起來了，她也有一夾文件，而她說，「我現在來讀幾首譯成英語的喬其亞詩。」

她的英語很好，但因為我的胃裏正在劇烈地抽搐，我只得抗議了。我對她說——而那確是眞話，我很喜歡自己讀詩，那樣我就可多領略到詩的眞味，我懇求她把那些詩給我，讓我在只有一個人的時候去讀，以便我可以仔細地欣賞它。我覺得這幾句話傷了她的情感，但我希望她不會介意。我實在很難過。她有一點兒不客氣。她說詩稿只有一份，她不敢借給人。

像以前一樣，他們又提出了關於美國著作界的問題。而像往常一樣，我們又覺得自己毫無準備。假如我們在離開美國以前早知道要被問到這種問題，我們或許會先研究一下。我們被問到新起的作家，我們就啞啞地說了一些關於 J·赫賽，和寫『苦工船』的 J·H·布恩斯，以及看來有成爲小說家的希望的 B·穆爾亨的話。回答這種問題我們在非常不相當，但實際上，我們對於最近出版的新小說的確也讀得太少了。然後，有一個人問我們在美國知名的喬其亞人有那幾個。但除了舞曲作家 G·拜倫欽以外，我們所記得的，只有那與美國百萬富婦集體結婚的三兄弟。曼特凡蒂這個名字在目前的喬其亞作家之間似乎引不起多大的熱情。

這些喬其亞作家非常嚴肅和專忱，而最難告訴他們的是：雖然史達林會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築建師，但在美國，作家却任何建築師的銜頭都挨不上，他們只有在死後才能受人容認

，在二十五年以後，就沒有人再記得他們了。

美蘇兩國人民之間最明顯的差異，不但在於他們對作家的態度，而且作家對他們政治制度的態度也大不相同。因為在蘇聯，作家的任務是鼓勵、慶賀、解釋、並用各種方法推進蘇維埃制度。而在美國和英國，一位良好的作家是社會的守望犬。他的任務是諷刺社會的病態，攻擊社會的不公，指斥社會的過錯。由於這個理由，所以在美國，社會或政府都不十分喜歡作家。這兩種對文學的態度是完全相反的。但這兒必須指出，在俄國產生偉大的作家的時代，在托爾斯泰、杜斯退益夫斯基、屠格涅夫、契柯夫、和早期高爾基的時代，俄國也是一樣的。只有時間能夠證明靈魂建築師那種寫作態度是否也能像社會守望犬那種寫作態度那樣產生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必須承認建築師派還不曾產生出一部偉大的作品。

當我們與那些作家們的會談完畢的時候，房間裏已非常熱，我們與他們一一握手，每握幾次手，就把我們的手掌在褲子上抹一抹，因為我們出汗出得非常多。

他們所提出的有一個問題我們要考慮了以後再回答。那個問題是，「美國人喜不喜歡詩

？」

我們只能回答說，任何形式的文學在美國是否受人喜歡，唯一衡量的標準是人們買不買它，而買詩集的人當然並不多。所以我們不得不說，美國人大概是不喜歡詩的。

於是他們就問道，『那是因為美國詩人不十分與人民接近，是嗎？』

這倒也是不對的，因為美國詩人與人民接近的程度與美國小說家與人民接近的程度不相上下。W·衛脫門和C·桑特堡當然是離人民不太遠的，但人們總是不很喜歡讀詩。在我看來，美國人究竟是否喜歡讀詩，似乎沒有多大關係。但在有愛詩的傳統的喬其亞人，對詩缺乏愛好簡直是一種罪。

底弗里斯雖然古老，它却是新都。一千五百年以前，權力的寶座是在此去以北約摸三十公里的地方，那天下午，我們坐進吉普車裏，我們那位騎兵司機就驅車送我們到那兒去。那是一條很好的碎石路，路上擁擠着騾子拖的大車，軍用貨車，以及坐着軍人的有邊車的德國機器腳踏車。兩邊的山上有幾乎無法攀登的碉堡和古老的教堂。在這個三千年來設防抵抗侵入者的山隘裏，使人幽然發生一種懷古的感覺。那條公路是沿着河岸修築的，河上有兩座發電的水閘，但當卡柏要對它們拍照的時候，就立刻遭到了拒絕。在水閘上去不遠的地方，我們看到一座橋址，羅馬人侵入這個山隘的時候，龐培〔譯者按：龐培是紀元前一〇六——四八年

的羅馬帝國大將」曾在這兒造過一條橋，中央的一個橋墩現在還兀立在河當中。

那個古都的名字叫做麥特斯克哈脫，而我到現在還讀不清楚。在那俯視全城的山巔上，有一座五世紀時建築的教堂，建築已半毀，氣象非常森嚴。要到那座教堂，你必須爬一大段羊腸小道。市區裏也有一座美麗的教堂，教堂四面都是高牆，牆上有碉堡設備，是為防禦而建築的。

牆內是一片極大的青草園地，牆壁有踏級可登，所以在古時候，戰士們可以登牆保衛教堂。教堂的大門是鉄製的，有一把極大的掛鎖鎖着。門洞裏面有許多小蠟燭黏在石牆上。黏蠟燭的方法似乎是先把蠟燭屁股點起來，當它已燃着的時候，把它向石頭上一貼，它就黏住了，然後再把另一端點起來，那支燃點着的蠟燭就黏附在教堂的石壁上了。

一陣乾燥的熱風咆哮着穿過那古城所在的山隘，吹得教堂的四角呼呼地發響。在教堂園地的一個角落裏，正在表演一種古怪的舞蹈。一個又長又瘦，筋骨畢露的男人穿着破爛的衣服在那兒跳來跳去。他就是我們稱爲「聖靈附體」的那種人。在他那隻瘦骨嶙嶙的右手裏，他拿着一根大羽毛，一面拿着那根羽毛做種種姿勢，一面向三隻站在那兒急速地嚼嘴並注視着他的山羊大聲演講。他揮舞羽毛，暫停演講，向山羊們進攻，山羊就像鬥拳者似的地輕蔑

地讓到一邊，然後站停下來再望着他，他就再向它們大聲演講。

管教堂的人終於來了——是一個膚色淺黑、長着一隻鸞鼻子的女人。她穿着一件黑衣服，一塊黑頭巾包下來一直圍住項子，所以只露出一張臉。她有一對沉思的黑眼睛。她似乎像是一個在家尼姑。她拿着一支開那把掛鎖的大鑰匙。她打開教堂的大門，我們就走進那個陰森古老的地方。

牆上的壁畫生硬、陳舊，並且很單調，顏色已經衰退。那些裝在泥金木籠和嵌在泥金鏡框裏的較近代的聖像也已發黑。那個嚴肅的女人開始對我們講那家教堂的起源。

現在產生了我們後來所謂的「鄧格到伊佛斯到乞瑪斯基」的翻譯。乞瑪斯基是不懂喬其亞話的。那一番話得先說給一個喬其亞人聽，由那個喬其亞人翻譯成俄羅斯語，再由乞瑪斯基從俄羅斯語翻譯給我們聽。這比普通談話要多化很多時候。

那個黑女人告訴我們說，這座教堂是在五世紀的時候完工的，但開始興築却更早得多。關於它的修築，她對我們講了一個奇怪的故事，像是那些你常常聽到的令人難以相信的東方故事一樣。

從前有兩兄弟和一個妹妹。他們聽到天上或是聽到風對他們說，耶穌已經降生，並且已

經長大成人了。他們夢見他的情形，並且有種種朕兆報導他的情形。最後，那兩兄弟動身到耶路撒冷去了，留下他們的妹妹在這個地方看家。他們到達的那一天，正是耶穌釘上十字架的時候，所以他們只看到了他的死。於是，從喬其亞這個山隘裏去的兩兄弟心碎了，他們乞得了一片耶穌身上的衣服，把那塊布片帶回家來給他們的妹妹。她聽說釘十字架的情形，傷心得不得了，她抓緊那塊布片，就此懨懨成疾，傷心而死，死後，她的手依舊緊緊地抓住那塊布片按在她的心口上。於是那兩兄弟想扯脫那塊布片，但她的手抓得非常緊，他們無法扯脫。所以她埋葬的時候，她的手裏依舊拿着那片布。她就葬在現在建築教堂的這個地方。她的坟墓上幾乎立刻長出一棵植物，漸漸長成一棵極大的樹。多少年以後，大家想在這個地方建造一座教堂來紀念那件事情。木匠想來砍斷那棵樹，但他們的斧頭一碰到樹桿上就衝得粉碎。每一個人都曾嘗試來砍那棵樹，但他們甚至砍不出一條凹影。最後兩位安琪兒來砍倒了那棵樹，於是教堂就在這個地點上建築起來了。那個黑女人在教堂裏面指出一個用泥土築成的像篷帳那樣的古怪建築物，她說，這就是坟墓的所在地，這就是那棵樹所生長的地方。而在這座泥土的篷帳下面，無疑地躺着那個聖女的身體，手裏還依舊緊緊地抓着那片從耶穌身上撕下來的衣服。

她還用她那嚴肅枯燥的音調講了一些其它的故事，但以這個故事為最好，這是那座教堂起源的故事。

當她在講話的時候，風呼呼地從那有裂縫的鉄門裏鑽進來。而她說，這個地方現在雖然荒涼無人，但在每年的某些時候，幾萬個人聚集到這座教堂裏來，庭園裏是這樣的擁擠，以致你想坐下來或一轉身都不行。甚至牆頭上都爬滿了人。逢到那些節日，那座古老的教堂裏就舉行禮拜，許多許多哩以內的人都趕來參加這種典禮，教堂四週的牆壁上都黏着小蠟燭，徹夜燈火通明。

我們離開那家教堂，眼看着鉄門上鎖，而在庭園的那個角落裏，那個『聖靈附體』的人依舊還在揮舞他的羽毛和向山羊發表他那嘶啞的演說。

我們去參觀一家城邊的僧舍。那兒依舊還住着一批和尚，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禮拜堂和他們自己的起居房舍。

這些地方已經信奉基督教的時候，法國、德國、和英國依舊還是異教徒的地方。所以美國所流傳的基督教故事帶着一種東方色彩。

庇弗里斯以北的這個長山隘是一個考古家的天堂，因為那兒有幾千年文明的殘跡。在懸

崖高處有埋藏遠古祖先的方形洞窟。蘇聯政府的考察隊經年不斷地在從事發掘。不久以前，他們發現了一個貯滿了金幣的大油罐！是一位古代國王的軍餉，大概是在被圍的時候把他的寶藏埋在這個地方的。發掘者每天發現人力加工品，把喬其亞的歷史一再追溯到以前從未懷疑過的遠古文明時期。從那種時期的眼光來看，龐培將軍的一個橋礮成了一种較新的建築物，而以這種遠古的背景來看，發電水閘簡直是新問世的嬰兒了。

卡柏在一個鏡頭裏排定了他想拍攝的四個目標：發電水閘，一尊列寧的壁像，一座五世紀的教堂，和一個四方形的敘麥利人的墓穴。但他們不讓他拍那張照片，因為其中有最重要的發電水閘，拍攝水閘是被認為越規的。

到傍晚時分，我們已被風吹得頭昏腦脹，感到很疲倦，卡柏、乞瑪斯基、和我的胃都在拚命作怪。我們曾喝了一種名叫「寶琴」的泉水，那種泉水喝來帶一種使人愉快的酸味。而我們事後才發覺它原來有一種溫和的清瀉劑的作用，但以我們所喝的數量來講，它已大大地超過一種溫和的清瀉劑了。我們在找出我們的病源以前，已經變得很衰弱了。

美國，有千百家喬琪·華盛頓會睡過的房子，俄國則有許多約瑟夫·史達林曾工作過的地方。庇弗里斯鐵路商店的外牆有一道花堤，並掛着一塊極大的匾額，宣稱約瑟夫·史達林

這家舖子裏做過事。史達林生於喬其亞，他的誕生地點約在底弗里斯七十公里以外，地名叫做高里，那個地方幾乎已成了一個國家的聖地。我們要去訪問一下。

乘吉普車去似乎是一段很長的路程，因為吉普車的實際速率並不如坐在車子裏的人所感覺到的那樣快。我們又穿出那曲折的山隘，駛入山隘那一端的平原，穿過其它的山隘，最後終於到達了高里鎮。那是一個座落在叢山之間的市鎮，市鎮中央是一個我們所謂的高丘，就是一座孤另另的圓頂的小山，山頂上有一座大碉堡，以前，這是防衛市鎮和收容難民的地方。那座碉堡現在已經頹毀。這就是史達林降生和度過他的童年時代的地方。

史達林的降生地點還保存着舊時的原狀，全部東西都用一個極大的天棚覆蓋着以抗風雨。天棚的頂蓋是用厚玻璃搭成的。誕生的地點是一座用泥灰和碎石築成的兩層樓的小房子，全屋只有兩個房間，房屋正面有一道小小的門廊。而雖然如此，史達林的家庭是這樣的貧窮，以致他們只能住那座房子的一半，住在一個房間裏。門口攔着一條繩子，但你可以一眼就望到裏面的床、扁扁的衣櫃，一張小桌子、一把銅茶壺、和一盞扭曲的油燈。在這個房間裏，那一家人就在這兒住，在這兒煮食，在這兒睡覺。包金的方形大理石柱支撐着厚玻璃的天棚。這個建築物設在一個種滿玫瑰的大花園裏。在那個玫瑰花園的邊上，就是史達林紀念館。

，裏面保存着可能收集到的與他的童年時代和青年時代有關的一切物件——有早年的照片，和他一生種種事業的圖畫，和他被捕時警察局所拍攝的照片。他那時是一個非常漂亮的青年，有一對兇猛熱情的眼睛。牆上掛着一幅大地圖，畫着他的旅行路線，他被囚禁的監獄，以及他被放逐的西伯利亞市鎮。這兒有他的書籍和文件，還有他爲小報所寫的社評。他一生的言行是一致的，從開始到目前，始終走着一條路線。

在所有的歷史裏，我們想不出任何人會在他還活着的時候受到過這樣的尊榮。在這方面，我們只能想到凱撒大帝，而我們懷疑甚至凱撒大帝究竟在他活着的時候曾否對人民有過像史達林這樣的威望、崇敬、和神一樣的地位。史達林所說的話在他們聽來永遠是對的，即使那些話似乎違反自然律也是對的。他的誕生地已經成了一個聖地。我們去訪問這個地方的那一天，管理那座紀念館的，是一個非常可愛的青年女郎，她向我們這一羣人講演了一番以後，就到花園裏去採玫瑰，給每個人一朵花。這種玫瑰花被人小心地珍藏起來，當作聖地的一種紀念。不，在所有的歷史裏，我們不知道有任何事情可以與這個比擬。

假如史達林在生時已有這樣的力量，他死後將會變成什麼？在俄國的許多次演講裏，我們常常聽到演講者突然引證史達林某一篇演詞裏的一句話，像是中世紀的學者引用亞里斯多

德的話來證明他的論據一樣。在俄國，史達林的話是沒有人懷疑的，不論他說什麼，都不會
有反對的論調。而不論這是由於宣傳、或訓練、或經常的引證、或無所不在的肖像所完成的
，它總是真的。而只有當你像我們會聽到過許多次的那樣聽到人說『史達林決不會錯。他一
生從未錯過一次，』那種話的時候，你才會感覺到這種力量之大。說那種話的人並不以為這
是一個辯論的題目，它是不容反駁的，他說那種話，就像是說一件完全真實而且無庸爭論的
事實一樣。

我們又坐進吉普車裏，我們的那位騎兵就驅車帶我們到側邊的一個山谷裏，因為我們想
去看一看出產喬其亞葡萄酒的葡萄園。我們駛進一個狹隘的山谷裏，又在山坡上看到了碉堡
。山谷和兩旁的山上有小農場。葡萄園從山谷底下向山上爬。葡萄已快要成熟。還有菓園，
菓園裏有橘子樹、蘋果樹、李樹、和楊莓樹。路很狹，而且高低不平，有時還有小溪越路而
過。我們的司機高興得大叫起來，因為這正中了他的所好。他以瘋狂的速率在那條狹路上疾
馳，並小心注意我們，看我們怕不怕——而我們是怕的。我們雙手抓住，以免被拋到吉普車
外面去。他駛進小溪裏去的去勢是這樣的猛烈，以致水花濺滿全車，溼得我們週身盡濕。我
們駛過一連串藏在山谷裏的小農場。每一個山隘口都有一個碉堡，在古時候，當侵略者到來

的時候，農場上的人就到礮堡裏去求保護。

我們終於在一個山間葡萄園裏的一叢房屋前面停下來，準備在那兒用午餐。那兒約摸聚集着一百個人，穿着他們最好的衣服，靜悄悄地站在那兒。不久，四個男子走進一間屋子裏去，扛出一口棺材來。全體男女就開始搖搖擺擺地上山去，扛着死者去葬在山坡的高處。我們很久還能看到他們，看他們彎彎曲曲地循着山上的小道到高高的墳場上去，人影愈去愈小。

我們走出車子到葡萄園裏大嚼了一頓，東西是我們自己帶來的——魚子醬、香腸、烤羊腩、鮮蕃茄、葡萄酒、和黑麵包。我們採摘那些剛才成熟的葡萄，塞滿了一肚子。而這一切碰巧對我們那衰弱的胃毫無好處。那個小山谷一片綠色，空氣溫暖悅人。到處迷漫着綠色植物的好氣味。過了一會兒，我們回到吉普車裏，一路巔巔衝衝地再回到高里。

一個去訪問美國城鎮的人會被帶去參觀商務局、飛機場、新建的法院、游泳地、和軍火庫。一個到俄國去的訪客則被帶去參觀博物館和文化休息公園。每一個城鎮都有一個文化休息公園，我們已看慣了那些東西——靠椅，一長行一長行的花，史達林和列寧的彫像，紀念革命時代這個市鎮的戰蹟的石碑。拒絕去看當地的文化休息公園，像在一個美國市鎮裏拒絕

去看一種新建設一樣的將被認為是一種不恭的態度。我們雖然已被吉普車顛得疲倦欲死，我們雖然因為沒有戴帽子而被太陽晒得頭昏腦脹，但我們還得到高里的文化休息公園裏去。

我們順着鵝卵石鋪築的小徑散步看花，突然地，我們發覺園背後在演奏一種奇異的音樂。它聽來幾乎像是蘇格蘭人的風笛，隱隱地有鼓聲伴奏。我們循着聲音的來源走過去，就看見有三個男人，兩個在吹笛，一個在打一面小鼓。我們不久就看出那種聲音爲什麼聽來像風笛了，因爲吹笛的人鼓起他們的臉頰，當他們在吸氣的時候，他們那充滿了空氣的臉頰繼續使笛子發音，所以聲音是沒有間斷的。音樂野蠻熱烈。笛手和鼓手站在一道木板圍牆的進口，圍牆四週的樹上爬滿了小孩子在向圍牆裏面看。

我們很高興會到公園裏來，因爲這兒在舉行喬其亞的全國摔角比賽，而這是決賽的日子。比賽已進行了三天，今天可以選出共和國的冠軍。

在圓形的木板圍牆裏面，是一個像競技場那樣的地方，四面都有座位。舉行摔角比賽的那個圓周約有三十五呎直徑，地上鋪着很厚的木屑。比賽場的一邊安着裁判席，裁判員後面有一間披屋供比賽者換衣服。

人們對我們非常客氣；他們在一張凳子上給我們找了一個地位，他們肅清一條路以便讓

卡柏可以拍攝比賽的照片。

那兩個笛手和那個鼓手在前排坐下來，然後對比賽者點名。他們穿着一種奇怪的服裝——上身穿帆布馬甲，腰間束帆布帶，下身穿短褲，赤腳不穿鞋襪。

每一對比賽者都得到裁判席前經正式辨認，然後他們分坐在圓周的兩邊。在那個時候，笛手開始吹奏野蠻的樂曲，沉重的鼓聲隨笛伴奏。比賽者漸漸接近，扭鬥起來。

那是一種古怪的摔角。據我看，它最接近的親屬是日本的柔術。比賽者不准抓住對方身體的任何部份。唯一允許着手的地方是馬甲和腰帶。一旦抓住，就互相扭扭，拋舉，強迫你的對手失掉平衡，直到你把他拋到地上，按住他為止。在全部攻防戰中，那種野蠻的音樂始終奏個不停，直到有一個戰士失敗了才止住。

比賽的時間不長，通常只要一分鐘便已足夠使一個戰士摔倒。一場比賽結束，另一對便立刻走到裁判席前受辨認。這種運動需要極大的速度，氣力，和技巧。有幾次拋擲是這樣的猛烈和迅速，以致在一場攻擊結束時，一個人會被高高地拋到空中，手脚朝天地仰跌到地上。

隨着比賽的進行，被淘汰的選手愈來愈多，觀眾也愈來愈興奮。但我們得走了。我們要

乘夜車到黑海去，而在去黑海以前，我們又曾被邀去參加底弗里斯歌劇院的開幕典禮。而且，我們的吉普車已鞍馬勞頓，發生了一點毛病，而我們在企圖到歌劇院以前，還有七十公里的路得走。車子的毛病在油管，我們一蹶一跛地回去，每走一個時候就停下來吹通油管。

當我們回到底弗里斯的時候，我們已非常疲倦了，疲倦得我們竟拒絕去參加歌劇院的開幕典禮。我那摔破的膝頭在那輛瘋狂的吉普車裏受了一頓可怕的敲打。我僅能勉強走路。我要在沸滾的熱水裏鉤一個鐘頭來鬆一鬆我那疼痛的膝蓋。

火車站，當我們終於到達那兒的時候，是既熱而又擁擠。我們順着一列非常擁擠的火車走，最後走到了我們的車箱——一節屬於快樂的記憶裏的一九二二年的頭等臥車。它那綠色的絲絨正如我們所記得的一樣綠。它的烏木擦得油光閃閃，金屬亮光照人，還有那種我們記得非常清楚的發霉的氣味。我們奇怪這麼多年來它究竟是放在什麼地方的。許多年前建造這種車箱的比利時人把它們造得可以長生不老。它是四十年前世界上最好的鐵路車箱，而它現在依舊還很舒服，依舊還保持着完好的形狀。它使人想到過去那些工作道地實在的日子。

火車裏非常熱，我們就打開我們房間裏的窗子。立刻走來一個衛兵把它關上，並申斥我們。他一走開，我們就又打開車窗，但他似乎已嗅出我們會反抗。他立刻回來，關上窗子，

用手指指着我們的臉用俄語向我們演講了一番。他對於這窗子是這樣的兇惡，以致我們雖然在那酷熱的火車裏幾乎悶死，也不敢再去開它。他的意思經翻譯以後是：在那天晚上的路途上，我們得經過許多隧道。假如窗子開着，火車頭的煙灰就會鑽進車子裏來，弄髒綠色的窗幔。我們懇求他讓我們打開那扇窗子，說我們甚至願意幫助掃清窗幔，但他只是更嚴肅地向我們揮動他的指頭，又向我們演說了一番。當一種俄國規定已被確立的時候，是沒有變通的餘地的。

那件事情使我們想起了一個美國軍官在莫斯科講給我們聽的一個故事。他說，在大戰期間，當他所乘坐的一架美國飛機在莫斯科降落的時候，他們派來一個哨兵，受命不讓任何人上飛機。而當他們一行人要上飛機的時候，那個哨兵不肯讓人上去。我們那個人說，他因為硬要上去，幾乎被槍殺，他的命令、護照、和身份證書都不起作用。最後是換了那個哨兵而不是換命令。負責的軍官解釋說，命令是固定的，換哨兵比換命令要容易得多。第二個哨兵所得的命令是『讓人上機』，而第一個哨兵所得的命令是『不要讓人上機』。兩套命令或改換命令會把一個人弄糊塗。換哨兵就簡單得多了。而且，這或許也容易訓練得多。一個執行一種命令的人比一個得在兩種命令之間作決定的人可以更忠誠地履行他的責任。

那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火車上的那個衛兵毫無讓我們打開窗子的意思。我們即使悶死也不關事。我們不知道開着窗子乘火車會受到怎樣的處罰，但我們從那個衛軍的態度上嚴重上來判斷，大概得坐十年監牢。

我們的火車終於開動了，我們那一夜就得在我們那流汗的小房間裏過去。但火車才一開就又停止。它整夜差不多每隔兩哩路就要停一停。我們終於混身大汗地沉沉睡去，做夢夢到被關在一個煤礦裏。

我們一早醒來，發覺我們自己已到了一種新的地方，一種完全改變了的地方。我們已到了一個熱帶區域，鐵路兩旁林木叢密，可以看到長在樹上的香蕉，和呼吸到潮濕的空氣。底弗里斯週圍的土地和空氣是乾燥的。

鐵路兩旁的小房子包裹在花叢裏，樹葉茂密得很。開着花的檳樹爬到小山上。這是一個最富庶和美麗的地方。到處都可以看到橘子樹。在沿鐵路的小田壠裏，玉蜀黍長得像康薩斯州的一樣高，有些地方竟有兩個人那樣高，有些田裏種着甜瓜。清晨，人們從他們那開朗和空氣通暢的房屋裏走出到門口，看火車過去。女人們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像其它熱帶地方的人一樣。她們的頭巾有紅的、藍的、和黃的，她們的衣衫是淺色印花布做的。我們穿過竹

林、碩大的羊齒類植物、和高大的煙草田。現在所看到的房子是用柱腳撐起來的了，有很高的梯子通到第一層樓去。在那些屋子底下，小孩子和狗在清晨的光線裏遊嬉。

小山上長着茂密的大樹，眼睛所能看得到的每一個地方都被覆蓋着綠油油的植物。

然後我們來到了茶園區，茶樹大概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農作物了。一行行低矮的茶樹綿延幾哩長，一直爬上山坡。甚至在清晨，一行行的女人已在茶樹尖上採摘新葉，她們的手指像小鳥似的在樹叢間飛舞。

我們一醒來就餓得不得了，但饑餓對我們並無任何好處。火車裏沒有東西可吃。事實上，在我們逗留在蘇聯的全部時間內，我們從未在任何交通工具上找到任何可吃的東西。你或是自帶飯菜，不然你就得挨餓。這與旅客帶大批行李有關：十分之一是衣服和鋪蓋，十分之九是食物。我們又嘗試想打開一扇窗，但前面還有隧道，我們被禁止不許再開窗。在遠處，我們下面很遠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藍色的海。

我們的火車下降到黑海岸邊，沿着海岸走。這一帶的全部海岸是一個極大的夏季遊樂地。每隔一小段路就有一所大療養院或一家旅館，甚至早晨的海灘都擠滿了洗澡的人。因為這幾乎是蘇聯全國的休息地點和度假期的地方。

我們的火車現在似乎每隔幾呎就要停一停了。每一次停車，就有成羣的人出去，每一羣人都被派定住在那一家休息所裏。這種假期幾乎是俄國所有的工人都盼望的。它是長期辛苦工作的報酬，這是傷病人員休養的地點。看到這一片鄉村景色，再加上它那平靜的海和它那溫暖的空氣，我們明白爲什麼蘇聯各地的人要一再對我們說『等你們看了喬其亞再說吧』那句話了。

巴統是一個非常愉快的熱帶小城市，一個海灘和旅館的城市，又是黑海的一個重要口岸。城裏到處都是旅館和樹蔭掩映的街道，從海上吹來的微風使它不致於太熱。

這兒的旅行社旅館是蘇聯最好和最奢侈的一家。房間是新修飾過的，看了使人愉快，每一個房間都有一個擺着椅子的陽台。齊地窗可以使整個房間與外面打成一片。在一輛屬於博物館的車箱裏住過一夜以後，我們戀慕地望着床鋪，但鋪床不是我們的。我們僅僅脫身洗了一個澡。我們的時間已愈來愈少，而我們得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看許多東西。

下午，我們去訪問幾家休息所。它們是座落在華麗的花園裏的大宮殿，幾乎所有的房子都是面海的。在這些事情上充專家是危險的。幾乎每一個會到俄國去旅行過的人都成了一個專家，而幾乎每一個專家都取消了其他一切專家的話。我們在敘述這些休息所的時候，說話

必須非常小心。我們對於所眼見的事情，必須只有重覆旁人告訴過我們的話，而即使如此我們敢打賭還是有人要和我們起爭論的。

我們去訪問的第一家看來像是一家非常奢侈的旅館。門口有一排長長的踏級通到海灘上，四週圍着大樹，前面是一個面海極大的門廊。這一家休息所是屬於電機匠協會莫斯科分會的，裏面住的都是電機員工。我們問他們如何到這兒來的，他們告訴我們說，在每一家工廠和每一個工場裏，有一個由工人代表和一個工廠醫生所組成的委員會。來度假的人由那個委員會指定，而委員會得考慮幾種因素：服務時間的長短，體力狀況，疲勞程度，以及超額工作。假如一個工人生了病，需要長期的休息，工廠委員會的醫藥組就派他到一家休息所來

這一家休息所的一部份劃定給單身男子住，另一部份劃給單身女子，第三部份供全家居住，他們在假期中也有自成單位的房子住。那兒有一家每一個人都到那兒進餐的餐室，有遊戲室，有閱覽室，和音樂室。在一間遊戲室裏，人們在下棋。在另一間遊戲室裏，正在進行劇烈的乒乓球比賽。網球場上擠滿了打球的人和看球的人，踏級上擠滿了從沙灘上爬上來的人 and 下去游泳的人。旅館有它自己的小船和釣魚設備。許多人只是坐在椅子裏眺望海景。這兒是

病後等待復原的人，那兒有因工廠意外事件的犧牲者，他們被派到這兒來，在黑海溫暖的空氣裏休養。一般的假期是二十八天，但病人逗留的期間可以由工廠委員會任意延長。

他們告訴我們說，許多許多種工會爲它們的會員在海濱築有休息所。這一家休息所約摸可以同時容納三百人。

我們驅車沿着海濱再走幾哩路去看一家療養院，那又是一個看來像一家大旅館的地方。這是一家國營療養院，專容結核病人和患其它呼吸器病的人。它又是醫院又是休息所。它是一個非常愉快和陽光充足的地方。臥床的病人連床被推到那可以眺望花園和海的陽台上，可以行動的人則在四處漫步，聽聽音樂，玩那不可避免的象棋，象棋是一種其重要性僅次於足球的遊戲。

這所療養院裏的病人是由他們當地的醫藥局派來的，這是一個休養的地方。當我們去的時候，它幾乎像是沒有人的，因爲所有的病人都上床了。但當我們還在那兒的時候，聽到一陣鈴聲，於是他們漸漸地都踱出來了。

據說海濱有幾百家這樣的療養院，我們的車子沿海邊公路行駛的時候，可以看到許多家兀立在樹林裏和山坡上。

當我們的車子在行駛的時候，忽然開始下起一場熱帶的豪雨來，於是我們回到旅館裏，終於得到了兩小時的午睡。我們被一種不尋常的音樂所喚醒。先是一段豎笛雜奏，奏來不容錯認地有B·高特曼的風味。然後那一段戛然而止，第二隻豎笛也來奏那一段，但却不容錯認地並無高特曼的風味。那樣反覆地玩了五六遍以後，我們才明白我們鄰近的一個房間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有一個人聽一段B·高特曼的唱片，然後嘗試模倣它，但却模倣得很少成功。它這樣繼續下去，一段樂曲重覆了又重覆。只有當你看到大多數歐洲人玩美國的熱情音樂時所造成的那種一團糟的情形，你才能明白美國的音樂是多麼的確定、專門、和一致。或許我們的音樂家對喬其亞樂曲那種錯綜複雜的旋律也會有同樣的困難。俄國人對我們的音樂當然有很大的麻煩。但他們有很大的熱情去忍受那種麻煩。我們在底弗里斯不大聽到美國的熱情音樂，但巴統却多得很多。各家旅館裏就充滿了那種音樂。因為許多訪客是從莫斯科來的，那兒奏那種音樂的地方較多。

晚上，我們應邀去參加所謂底弗里斯爵士樂隊的海濱音樂會。樂隊在海濱一個貝殼形的小音樂台上演奏，它演奏美國的爵士音樂——「晴天」，「中國孩子」，和「我已懷春」——老是離不了「我已懷春」。當卡柏和我到音樂會的時候，他們拿大柵的鮮花讓我們捧着，

我們覺得有一點兒獸氣。我們兩個都不像是捧着十五磅重的洋水仙聽音樂會的人。花東大得很，而我們對它毫無辦法。我們不能把它們放下來，我們得從花瓣間窺視音樂台上的樂隊。

我們明白他們爲什麼玩不好美國音樂的理由了。我們的熱情音樂是一種臨時創作。音樂家把他自己和他的想像織入他的演奏裏，但這個俄國音樂隊則一味模仿它所聽到的唱片，而那種唱片是無法模仿的。假如他們要奏熱情音樂，他們應該採取像『狄娜』這一類的主题，然後根據那種主题來臨時創作，假如那樣，他們奏出來的東西就像音樂了。那不會是美國的熱情音樂，但它或許會成爲喬其亞的熱情音樂。

後來樂隊終於鬆了一口氣，開始演奏它自己的音樂，演奏喬其亞山人的熱烈舞曲。而我們也鬆了一口氣，因爲他們現在自在了，而奏出來的也是音樂了。演奏完畢以後，樂隊領袖和幾個演奏者和我們一同回旅館用晚餐。樂隊領袖是一個倔強熱忱的人，而憑着我們那種『鄧格到伊佛斯到乞瑪斯基』的翻譯，我們嘗試告訴他關於美國熱情音樂的背景，它的發展過程，以及它的性質。他對於那種音樂的理論極感興趣，他和他的演奏者會插嘴進來，用喬其亞語熱烈地解釋一番。演奏者能以一個簡單的旋律爲基礎而成爲樂曲的創造者，不必寫下來，不必保存，而只是即興演奏，這種辦法是他聞所未聞的。他和他的演奏者愈聽愈興奮。

我們告訴他們說，他們沒有理由要用一個美國的主題。一個喬其亞主題照樣也可以用來即興演奏；而且他們大概還可更容易發揮。過了一會兒，他們跳起來，道了再會，離開我們了。而據我們的想像，在黑海海濱的某一個地方，那天晚上一定有人在用美國方式進行熱烈的即興演奏的實驗。

我們似乎永遠睡不夠，但使我們疲倦的倒並不是完全爲了那個原因。我們隨時都在奔走，我們從來不會能夠靜下來把事情細細地想一想。卡柏的照相機像放爆竹似地辟辟拍拍地響，他弄到了一大批曝光過的軟片。我們疲倦的原因或許是爲了這種情形：我們隨時都在看東西。我們隨時都得看東西。當我們在過着一種正常的、並不十分有效率的生活的時候，我們只在一小部份的時間看東西，其餘的時間只是舒暢舒暢，什麼都不看。但憑着我們這次旅行的有限的時間，我們每一分鐘都得看一些東西，於是我們就弄得極其疲倦了。還有一個原因。我們正在過着一個世界史上僅有一兩次先例的道德生活。關於這一點，一部份原因是我們自願的，因爲我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一部份原因則由於沒有讓我們作惡的機會。我們是相當正常的人。我們愛看一隻光滑細圓的膝頭，或甚至比膝頭更高幾吋的地方，假如可能的話，最好是看到那隻膝頭被包裹在一隻寬鬆合宜的玻璃絲襪裏面。我們喜歡一個女人用來愚弄

那些無辜和愚蠢的男子的那種種詭計和謊話。我們非常愛好這些東西——好看的頭髮式樣，脂粉，美麗的衣服，指甲油，唇膏，黑眼圈，和假睫毛。我們實在切盼想上當和受愚弄。我們喜歡怪味的法國醬油，葡萄酒，和一九三四年釀造的「比里——僑意德」牌香檳酒。我們喜歡聽一大隊小提琴演奏吉卜賽音樂。我們喜歡聽阿姆斯特德郎喇叭的狂鳴和羅塞爾豎笛的歇斯底里的雜奏。而我們却在過着一種纖塵不染的道德生活。我們隨時在瞻前顧後。蘇聯報紙上對外國人最普通的攻擊是酗酒和好色。而由於我們的好酒尚屬合理，而且並不比大多數人更好色——雖然這是一件變化多端的事情——所以我們就決定過一種聖人的生活。這一點我們是做到了，但我們自己却並不完全滿意。

我們的疲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談話。我們的談話經常保持在一種很高的智識水準上。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俄國人是通人情、不酗酒、不好色的人。他們私底下究竟是否如此，我們並不知道，但可能我們都有一點兒裝腔作勢，就像家庭主婦在宴會席上擺一點兒小架子一樣。總之，我們這時非但已極端疲倦，而且感覺到頹廢的暗流已在我們的皮膚底下蠕蠕地在騷動了。

早晨雨下得很大，是一場溫暖柔和的雨。我們翻了一個身，又沉沉睡去。大約十點鐘左

右，太陽破雲而出，我們的委員會便來接我們去看一家國營茶場。

我們的汽車沿着海濱行駛，然後在綠色的山頭間鑽過一條縫，鑽到山背後的山谷裏。那兒，一行行暗綠色的茶樹綿延達幾哩之長，還有散散落落的橘樹叢。這是一片可愛的鄉村，是我們所訪問的第一個國營農場。

我們在這兒也不能作概括的敘說，我們只能敘述我們所看見和聽見的事情。國營農場的經營方法像一家美國公司。它有經理，有理事會，和雇員。農場工人住在清潔愉快和簇新的公寓房子裏。每一個家庭都有幾個成單位的房間，假如女人也在參加工作，他們的孩子可以寄到托兒所裏去。他們的地位是與工廠工人一樣的。

那是一家極大的農場，有它自己的學校和它自己的樂隊。經理是一個像商人模樣的人，他很有資格在一家美國公司裏當一個分廠經理。它與集體農場大不相同，因為集體農場裏的每一個農民都可以分到農場的紅利。這只是一家種茶造茶的工廠。

男人從事土地的施肥工作。採茶大多由女人担任，因為她們的手指比較靈敏。女人們排成長長的行列在茶園裏移動，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和談話，非常富於畫意。卡柏對她們拍了許多照片。而這兒，象在其他每一個地方一樣，也有獎章贈給工作效率特高的人。有一位姑

娘贏得了一個採茶迅速的獎章，她的雙手像閃電似的在茶樹叢上震動，採摘嫩綠色的新葉放進她帶着的籃子裏。暗綠色的茶叢和花花綠綠的女人衣服在山邊構成一幅非常美麗的畫面。山脚下有一輛貨車，準備接採下的新鮮茶葉到加工廠裏去。

我們跟着那輛貨車到茶葉工廠去。那家工廠是完全用自動機器工作的。機器搗爛茶葉，任其氧化，無窮盡的皮帶穿過烘爐。那家工廠幾乎完全是由女人管理的。廠長是一個女人，品茶員也是女人。女人管理搗爛茶葉和氧化茶葉的機器，女人照顧烘乾茶葉的大烘爐。女人區分茶葉的等級和包裝茶葉。只有搬運茶包的是男人。

該廠的廠長是一個年約四十五歲的漂亮的女人，是一家農業學校茶葉系的畢業生。她的工廠出產許多等級的茶葉，從最好的細小芽茶到運赴西伯利亞的茶磚都有出產。由於茶是俄國人民最重要的飲料，所以茶園和茶廠被認為是該區最重要的企業之一。

當我們離開的時候，廠長送我們每人一大包該區最好的產品，而它是上好的茶葉。我們早就已經放棄咖啡了，因為所能找到的咖啡都是不好的。我們已改爲喝茶，而從現在起，我們在吃早餐的時候就自己煮茶，而我們的茶葉比我們能夠買得到的好得多。

我們行經一家小小的托兒所，就停車去參觀。那兒有五六十個小孩在青草地上跳舞！

都是那些在茶園工作的女人的孩子。卡柏找到一個有長長的髮髮和一對大眼睛的美麗的小姑娘，他想給她拍照，但她扭妮起來，哭了，哄騙也無用。他給一個小男孩拍照，他也哭了。卡柏是孩子們的朋友。托兒所的教師說，那個姑娘是很難哄她歡喜的，因為她不是一個喬其亞人，她是一個烏克蘭的孤兒，是由一個喬其亞家庭領來的，而她感到很怕生，因為她還不會說喬其亞話。許多喬其亞家庭從曾受破壞的區域領了孩子來撫養，因為這個富庶的地方不會受到戰爭的接觸，人們亦覺得他們對國家的其它地方負有一種責任。我們時時在一座小房子前面停下來去訪問。他們在房屋的週圍有花園和菓園。而在每一個地方，我們吃一把榛子，或一些鄉下牛油和新鮮的黑麵包，或一隻剛從屋外樹上採下來的桃子，或一束葡萄。我們似乎不住口地在吃東西，而我們無法拒絕。我們嘗了喬其亞伏特加，那種酒我們不向任何人推荐，因為它有一股子後勁。它是一種確確實實的火箭酒，我們的胃受不了它。實際上，它根本不是伏特加，而是我們通常所謂的蒸溜酒。這種酒在我們喝來是太兇了。

當我們的胃已開始脹滿了食物時，農場經理趕到我們這兒來了。他是一個高大、挺直、和節儉的人，穿着一套遊擊隊的制服，戴着一頂硬硬的帽子。他請我們順路到他的家裏去轉一下，去吃一點點東西。上帝幫助我們！我們通過乞瑪斯基和另一位翻譯者解釋道，再多吃

一口東西，我們的身體就會爆炸開來。答覆是：那只是意思意思吃一口，假如我們去訪問他的家，與他喝一杯酒，那就是一種很大的榮幸了。

我們那時已開始相信俄國的祕密武器就是食物，至少對賓客是如此。但我們當然不拒絕吃一口東西和喝一杯酒。於是我們就跟他到他的家裏，到一座小山上的一座整潔的小房子裏。

這種情形是我們應該曉得的。他園子裏那片修剪得很整齊的草地上四處站着很多人，看樣子決非僅僅吃一口東西和喝一杯酒所可了事。兩個漂亮的姑娘拿着水瓶從房子裏出來。她們把水傾倒在我們的手上，我們就洗洗臉和手。姑娘們又拿出繡紅花的白毛巾讓我們自己抹乾手臉。

然後我們被邀請到屋子裏去。我們走過門廊到一個大房間裏。房間裏掛着色彩燦爛的窗幃；其中的某些花樣使我們想到意大利的毛氈。地板上鋪着一種很像墨西哥草蓆的地毯。但幾乎嚇死了我們的，是桌子上的景象。桌子有十四呎長，上面堆滿了食物，一共約有二十位賓客。我認爲在我們生平所赴的歷次大小宴會中，只有這一次拿油炸鷄作第一道特別菜，而且每一道特別菜就是半隻鷄。油炸鷄以後就是一道冷的紅燒鷄，鷄上澆着一種綠色的醬汁，

酸溜溜地非常美味。然後是牛油和生蕃茄和喬其亞醃菜。然後又是一道噴香的、帶着一種濃稠的滷汁的嫩羊肉。然後又是一種油煎的鄉下起士。扁形的喬其亞燕麥麵包像撲克牌似的疊在一起，桌子中央擺着葡萄、桃子、和蘋果等水果。而可怕的是，樣樣東西都好吃得很。

一切都別有風味，而我們樣樣都要嘗一嘗。我們幾乎吃得脹死。卡柏一向以他那三十二吋的腰圍自傲，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肯放鬆他的褲帶，這一次吃得他下巴底下脹鼓鼓地，眼睛微微凸出和充血。而我則覺得假如我可以兩三天不吃任何東西，我或許可以恢復正常了。

我想起並且終於懂得一個英國人告訴我的故事了。他是在大戰期間派到美國來担任某項購買職務的，而他得到中西部去。他每到一個地方就被塞一個飽。他一天要吃三四頓飯。他的正餐把他的胃裝得沉甸甸地，而在正餐之間，人們還是塞東西到他的嘴巴裏。他們可憐他，因為英國的食物是這樣的少。他們要餓飽他，使他可以憑貯積的脂肪多支持一會兒。三天以後，他病了，但他得繼續奔走。一星期以後，他的病已非常嚴重。他那個習慣了英國清淡的食品的胃，已完全反抗了，而由於他的病，人們就更可憐他過去所接受的饑餓，塞更多的東西給他吃。最初，由於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他嘗試解釋說，吃這樣多的食物是要塞死他的，但那種說法人們只是不相信。然後他撒了一些謊，說他國內的人民沒有這樣的好東西吃，

他覺得自己吃得這樣多是不對的。但他們嘲笑他那種說法，而他就得繼續吃。他說，他每到一個農場，農場裏的鷄便得可憐地遭受一次大屠殺，當他在早晨刮鬚的時候，他曾發現他的剃刀上有鷄毛。在兩星期的訪問以後，他病倒了，被送到一家醫院裏，在那兒，他們把他胃裏的東西都挖了出來。而醫生警告他說，按照他這種情形，即使他感覺到極點，他也不應該吃得太多。於是他瘋狂地大笑，翻身把他的頭埋在枕頭裏。當時我以為這個故事未免過甚其詞，但我漸漸地開始相信它是一個確實的故事了。

我們被介紹給那二十位來賓，然後大家坐下來。而我們的問題就此開始了。假如我們不吃，我們就被硬勸着吃，假如我們吃了，我們的碟子就立刻又被加滿。這當兒，裝着當地出產的葡萄酒的酒罇輪流傳遞。那是一種美味的葡萄酒，味淡而香氣很濃，而它大概救了我們的命。喝過幾杯以後，我們的男主人站了起來，他的太太，一個黑眼睛，方臉盤的美麗的女人，從廚房裏出來站在他的旁邊。經理喝一杯祝我們康健，再喝一杯祝美國康健。然後他指定他最要好的那位朋友當「餐桌主人」，而這個，就是主人指定他的朋友當發言的主人，據說是喬其亞鄉下一種古老的習慣。從那時起，席上的任何人都不能再建議祝杯。假如有人要建議祝杯，他必須傳話給通常以發言能力高強被選中的那位餐桌主人，由餐桌主人代他祝杯。

。這節省了來賓的很多話。

那位新餐桌主人發表了一篇很長的談話。而必須記得的是，即使一篇很短的演講在這兒也是長的，因為每一句話都得從喬其亞語譯成俄羅斯語，再從俄羅斯語譯成英語。而只有上帝才知道這其間究竟纏錯或遺漏了多少意思，尤其是在這種進餐的時候。餐桌主人是當地的一位農業專家，在循例講了幾句客氣話以後，他就開始顯出他的本色。他慨嘆那些迫使美蘇兩國分離的事件和誤會，他說，他對這種情形有一個辦法，而他的辦法就是通商。他說，俄國和美國之間應該訂立一個通商條約，因為俄國亟需美國的製造品——農業機器、曳引機、貨車、和火車頭。而他認為美國大概也需要某些俄國的產品，他提及寶石、黃金、木漿、鉛，和錫。他顯然已對這個問題想過很多時候。他多半並不知道阻礙這種諒解的許多困難，而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也不知道。

由於我們是外國人，無法寫字條給餐桌主人，所以我們可以答覆他的祝杯。我們就建議為取消所有的「幕」——鐵幕、尼龍幕、政治幕、虛偽幕、和迷信幕而乾杯。我們建議道，幕是戰爭的前奏，假如戰爭果真會到來，那就不外乎兩種理由——不是由於愚蠢，便是出於故意。假如任何領袖蓄意要戰爭，那末就應該把那些領袖去掉，假如是由於愚蠢，那末就應

該更仔細地查考它的原因。我們建議道，既然不論那一個人，甚至最愚蠢和最好戰的人也不能想像在一次現代戰爭中有人可以得勝，那末，凡是真正蓄意想要戰爭的任何方面的任何領袖，都應該當作一條瘋狗那樣的被趕下來，使他與人羣隔離。卡柏曾見過很多戰爭，我曾見過一點兒，我們兩個在這個題目上都感到非常激動。

我們那一篇祝杯的話講完以後，葡萄酒咯咯地從酒罇裏跳出來，席上的每一個人都站起來，每一個人都堅持要與同席的每一個人碰杯。這是喬其亞親蜜的祝杯方式。每一個人把他那隻拿酒杯的手與隣座的手臂勾起來，然後從他自己的酒杯裏喝酒。女人們從廚房裡挨進來，隣居們已聚集在房門口，葡萄酒罇就傳遞給他們。

我們所遇到的喬其亞人像威爾斯人。在任何一羣十個男人之中，至少有七條好嗓子。在這個席上，現在歌聲爆發了，是宏壯的合唱。他們唱喬其亞山上牧童的歌和舊時的戰歌。聲音是這樣的好聽，合唱是這樣的嚴整，看來他們簡直和一個職業歌唱團體一樣，但他們實際上却並不是。然後音節加快了，兩個男人拿起椅子，把椅子反轉來攔在他們的膝頭上，把它們用來當鼓敲，於是跳舞就開始了。女人從廚房裏出來跳舞，男人從椅子上跳起來跳舞。音樂是男音的合唱、拍椅子底、和擊手掌。

那是宏壯的跳舞音樂。有的時候一個男人獨跳，有的時候一個女人獨跳，有的時候他們一起跳，用嚴正的快步跳喬其亞的傳統舞。而這就是當我們到喬其亞一家農舍裏只去吃一口東西和喝一杯酒時所經歷到的情形。我們再三告辭後才脫身。

當我們的汽車衝下山頭回巴統去的時候，天又開始下雨了。

我們那天晚上就要乘火車回底弗里斯，而在上車以前，我們還被邀去看戲。我們身上是負着這樣沉重的疲乏、食物、酒、和印象，以致那家戲院不會在我們的腦子裏留下多少記憶。那天的劇目是用喬其亞語演的『奧狄波斯王』，但我們的眼睛是這樣的疲倦，以致我們只看到那個奧狄波斯是一個有一顆閃閃發光的金牙齒的漂亮的男子，還有他那紅色的假頭髮是非常的紅。他在一座樓梯上表演，一會兒上，一會兒下。他有力而美妙地唸唱他的台詞。而當奧狄波斯挖出他自己的眼睛和撕毀他那血跡斑斑的襯衫的時候，我們的眼睛幾乎已經閉攏了，但我們勉強睜開了它們。觀眾化一半的時間回頭來看我們，看我們這兩個美國訪客。我們在這兒所引起的稀奇，僅次於火星上來的訪客，而我們不會得到有利的印象，因為我們是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中。我們的東道主人領我們走出戲院，推我們到一輛汽車裏，帶我們上火車踏級，而我們就像是夢遊者一樣。那天晚上我們不會因開窗的事情與衛兵發生任何爭吵。

我們倒入床位裏，幾乎立刻就睡着了。

在這些可怕的喬其亞人間，我們深感自己非他們的敵手。他們可以在吃東西上壓倒我們，在喝酒上壓倒我們，在跳舞上壓倒我們，在唱歌上壓倒我們。他們有意大利人那種兇猛的高興和法國東部人的那種體力。他們與我們所遇到的俄羅斯人大不相同，而我們很容易了解爲什麼其它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民會對他們這樣崇拜。他們的精力不但能忍受熱帶氣候，而且因熱帶氣候而更趨強盛。什麼都擊不破他們的個性和他們的精神。許多世紀以來，歷代的侵略者、沙皇的軍隊、專制暴君、和當地小貴族都嘗試過那種打擊。他們的精神會受過各種打擊，但沒有一種打擊會對那種精神造成一分損傷。

我們的火車在十一點左右駛入底弗里斯，我們一直睡到快要到達的時候，然後懶洋洋地穿上衣服，回到旅館裏，再多睡一會兒。我們並未吃東西，甚至未喝一杯茶，因爲我們在第二天早晨飛回莫斯科以前，還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天晚上，我們已受邀去參加底弗里斯的文化和藝術家所舉辦的招待會。假如這個招待會似乎會變成一次吃東西的紀錄，那種解釋是不會錯的。我們不是似乎隨時在吃東西，我們是確確實實隨時在吃東西。

正如肚子吃得太飽以後會不注意珍饈美酒，辨不出肉香酒醇一樣，一個人的腦子裏如裝

了太多的印象，看了太多的場面，便也會喪失色彩和動作的感覺力。我們已犯了吃得太多、喝得太多、和看得太多的毛病了。據說一個人到外國，一個月之內的印象是敏銳和正確的，以後便模糊了，在五年之內不會再得到正確的反應，所以一個人到外國去，應該或是只住一個月，或是索興住五年。

我們已經感覺到我們已不再能敏銳地觀察東西。我們對那天晚上喬其亞文化人的那頓晚餐懷着某種恐怖。我們是這樣的疲倦，以致我們不想再聽演說，尤其是文化人的演說。我們不想再去想到藝術、或政治、或經濟、或國際關係，尤其是，我們不想再吃東西或喝酒。但喬其亞人待我們是這樣的仁慈和親切，以致我們知道非去吃那頓晚餐不可。他們向我們所提出的正式要求，只有這一件事情。而我們應該多信任一些喬其亞人和他們的民族天才，因為那頓晚餐結果根本並不如像我們所猜疑的那種情形。

我們衣服的情形已非常糟糕。我們不會帶來許多衣服，你不能帶着許多衣服乘飛機，而我們的褲子自從踏進蘇聯以後就不會上過夾子。吃東西時的小意外在我們的上裝上留下了紀錄。我們的襯衫很乾淨，但熨得很壞。我們絕不能充當衣着講究的美國人的好榜樣。但卡柏洗了一次頭，於是我也洗了一次頭。我們抹掉衣服上比較容易除掉的污垢，換上乾淨襯衫，

於是我們已準備好了。

他們帶我們乘鋼纜火車直上懸崖，到那家懸崖頂上俯視整個山谷的大酒館裏。我們上去的時候已是黃昏，我們下面的城市已燈火輝煌。那黑黯黯的高加索山峯後面的黃昏天空是金黃色的。

那是一次盛大的招待會。餐桌似乎有一哩長。它是爲八十個人而設的，因爲席間有喬其亞的跳舞家，還有歌唱家、作曲家、電影製片家、詩人和小說家。桌子上擺滿了花，裝飾得美麗而妥貼，懸崖下面的城市像是一串串的鑽石。席間有許多漂亮的女歌唱家和女跳舞家。

晚餐開始了，而像所有這一類的晚餐一樣，開始的時候免不了要有幾篇沉悶的演講，但喬其亞人的性格和喬其亞人的天才不能容忍它，它幾乎立刻就粉碎了。他們不是沉悶的民族，他們不能很久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歌唱爆發了，有獨唱和合唱。跳舞爆發了。酒瓶傳來傳去。卡柏開始跳他那著名的『喀柴斯基』舞，他跳得並不好看，但他能跳就已經很不錯。或許是睡眠給了我們新生命，或許是葡萄酒有了一些幫助，因爲那次招待會一直繼續到深夜很晚。我記得一個喬其亞作曲家舉起酒杯大笑着說，『滾他媽的政治！』我記得曾與一個漂亮的女人學跳一次喬其亞舞，而那個漂亮的女人原來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喬其亞跳舞家。我記

得最後在街上舉行合唱，以致引起國民兵來看究竟爲了什麼事情唱歌，結果他們也參加了合唱。乞瑪斯基先生也開心了一點兒。他對喬其亞是像我們一樣的陌生。語言的障礙倒下去了，國界的障礙倒下去了，再無須乎翻譯的人了。

我們享受了一個絕好的時光，而這一頓我們事先懷着恐怖和不願去的晚餐，結果竟是一次極妙的招待會。

天將黎明時，我們拖着脚步回到我們的旅館裏。上床是沒有用的了，因爲我們的飛機在幾小時內就要起飛。我們半死半活地收拾我們的行李，但我們終於到了飛機場上，可是我們永遠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去的。

在黎明前的黑暗裏到飛機場去是老規矩。我們的主人們乘着一輛大汽車來送我們到那兒去。他們的臉頰看上去有一點發綠，我們覺得自己也是那樣。那次通宵的歡會並沒有使我們最後還能精力充沛。我們正巧在黎明以前帶着我們的行李、攝影機、和軟片到飛機場，而像往常一樣，也是到餐室裏去喝茶和吃大餅干。在飛機場跑道的那一端，俄國的陸軍戰鬥機成對起飛，出去巡邏。

乞瑪斯基先生很疲倦了，未免有一點兒疎忽。在靠我們這一邊的飛機場上，停着一架大

運輸機，又是一架C——四七，已昇火待發，有人在陸續進去，我們問那是不是我們的飛機，而他們說不是的。那架飛機就飛掉了。不到一小時，我們再去問我們的飛機。現在似乎是那架飛走的飛機就是我們的飛機。克里姆林的格里姆林又在活動了。我們苛刻地抱怨了一陣。誰都不曾告訴我們是搭那一架飛機的。甚至乞瑪斯基都氣憤了，他與機場監督作了一次長時間的爆發性的談話，談話時做了許多手勢，用了許多那種我們唸不清音節的俄國字，聽來像在放一串爆竹似的。乞瑪斯基先生恐嚇要把全部事件到負責處理這種事件的地方去報告。那位監督聽了很擔心。然後他的臉孔突然光彩起來，他說，『你們可以乘一架專機去。它現在就要準備好了。』

我們聽了很感動，非常快樂，因為我們一生從來不曾乘過一架專機，而我們幻想我們可以躺在地板上睡覺。那架飛機將在一小時內起飛。它需要那樣多的準備時間。於是我們就回到餐室裏，再喝幾杯茶，再吃幾塊大餅干。

一小時以後，我們再去問。似乎有一隻引擎須得小小地修理一下，我們的『專機』或許可能要再等三十五分鐘才能起飛。

這當兒，我們的主人們已萬分憔悴，奄奄待斃。我們嘗試勸他們回底弗里斯去睡覺，但

他們非常客氣，他們不肯去。他們要親眼看着我們起程赴莫斯科。再喝了兩杯茶，再過了四十五分鐘，我們又去問。監督說，有一個代表土耳其政府的土耳其代表團要到莫斯科去參加慶祝該城的八百週年紀念。假如我們不在乎的話，他們將跟我們一同去；假如我們允許的話，他們將分享我們的專機。我們並不很喜歡土耳其政府，但在這種情況之下，既然一個主權完全獨立的國家的代表懇求乘我們那架小小的專機去莫斯科，我們也不願拒絕。我們非常大方，我們賜予了那種許可。

『讓他們上機吧，他們可以跟我們一起去』，我們說。

但還有一點點小麻煩，他們還沒到這兒。他們依舊還在底弗里斯，他們在半小時內可以出來了。

我們回到餐室裏，再喝了兩杯茶，再吃幾塊大餅干，太陽昇起來了，空氣熱起來了，俄國的巡邏機一批起飛，一批進來。我們的眼睛，因為疲乏過度，而有些啾啾然了。一小時以後，我們回到監督那兒，而甚至乞瑪斯基先生現在也有些不耐煩了。土耳其人究竟在那兒？

『噢，似乎是他們的火車還不會到底弗里斯。它大概在路上的那一個地方就攔住了，而既然他們已被允許可以乘我們的飛機去，監督覺得他不好意思讓土耳其代表團擱淺在這兒，我

們是否可以再等待半個鐘頭呢。

我們身體裏的茶已經齊到喉嚨口。我們回到餐室裏，再喝了一杯，茶就從我們的嘴巴裏倒流出來。乞瑪斯基把他的頭埋在兩隻手裏，我就提醒他我們對於格里姆林的定義，以及他說蘇聯人不相信鬼的那句答語。

我說，「乞瑪斯基先生，你現在可相信鬼了嗎？」

他就抬起他那對疲倦的眼睛，把雙拳在桌子上「碰」地一拍，喊叫着奔出去找那位監督了。

我們那批從底弗里斯來的主人們已蹲在機場花園一棵樹底下，在地上呼呼地睡着了。但我們可不能睡，因為我們的飛機在三十五分鐘之內就要起飛了。

兩個半鐘頭以後，土耳其人的行李到了——一輛貨車裝來二十隻胖胖的箱子——但土耳其人却沒有到。原來是，經過火車上一夜的旅行以後，土耳其人已覺得有一點兒疲倦和一點兒肚餓了，他們已到一家旅館裏去洗一個澡，吃一點兒東西，和休息一會兒去了。監督非常抱歉，說這是一個國際事件，而假如我們可以讓土耳其人搭我們的飛機，我們將使他成爲世界上最快樂的人，而或許因此就保全了他的職位和名譽。

我們又慷慨了一次。而我們發現了一條科學的真理：我們正確地知道人類的體質究竟能忍受到怎樣的限度，而我們已達到那種限度了。

十二點三十分，土耳其人到了。他們是肥胖的土耳其人——四個男人，兩個女人。我們不知道他們對一次最多不過兩星期的逗留爲什麼竟要帶那樣的二十隻大箱子。我們以爲他們或許是隨身帶着拆搭房子的。他們大模大樣地走進飛機場，走上飛機，正要扣機門關上的時候，我們親自出馬去包圍了那架飛機。機艙門口發生了一場小小的舌戰，但土耳其人終於讓我們進去了。原來這根本不是我們的飛機，這是土耳其人的飛機。不是我們讓他們搭我們的飛機，而是他們讓我們搭他們的飛機，而他們一點兒都不喜歡讓我們搭。我們不想提醒他們：作爲美國納稅人的我們，正在供給美元保存他們泱泱大國的民主制度。我們所需要的只是走上那架飛機，快點滾出底弗里斯。乞瑪斯基先生現在忍不住大喊大叫起來，他對一切能走動的東西都搖晃着他的拳頭。他有一個計劃，他要把那件事情寫信給莫斯科所有的報館。

我們終於被允許進那架飛機，而那些土耳其人——他們是吃得胖胖的、修飾得漂漂亮亮的土耳其人——則安坐在他們的座位上，對於我們的上來不住地發出厭惡的咕嚕聲。他們猜疑地望望我們的行李袋。我們必須承認他們是我們生平所遇到的氣息最美妙的土耳其人。他

們每一個人的身上都帶着一種化過兩塊美金理一次髮的氣息。我有一種感覺，覺得當我們等候在炎熱的飛機場上的時候，他們正在玫瑰油裏沐浴。

我們使勁地向我們底弗里斯的主人們揮手告別。他們待我們是這樣仁慈和盛意，而我們却給他們招來相當大的麻煩。我們那位騎兵司機朋友熱烈地揮手。他是怎麼都不會疲倦的。

飛機裏密不通風，因為那空氣調節設備照例是失了作用的。玫瑰油氣味壓倒了一切。我們的飛機笨拙地昇到空中，開始急速地爬高以求飛越高加索山脈。在山背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的堡壘和防禦工事。

喬其亞是一個神奇的地方，當你已離開它的時候，它變成了一個像夢似的境界。那兒的人民是神奇的人民。不錯，他們佔有着世界上最富庶和最美麗的地方之一，但他們配得上那個地方。我們現在澈底懂得爲什麼俄國人老是對我們說『在沒有看見喬其亞以前，你是什麼都不曾看見』那句話了。

我們飛越黑海，又在蘇克亨中途停留。這一次，機上的人員並沒有去游泳。那一排女人依舊在那兒賣水果，我們買了一大箱桃子帶去送給莫斯科的記者。我們故意買生硬的，使它們不致於立刻都熟透。傷心的是：它們根本就不會再成熟。它們就在我們買下它們的那種狀

況下爛掉了。

我們飛越高加索山脈的第二道山背，飛下到無盡頭的平原裏。我們不會在羅斯托夫降落，却直飛莫斯科。莫斯科很冷，因為冬季已在非常迅速地接近了。

乞瑪斯基先生是一個非常神經質的人。這一次，我們幾乎斷送了他。甚至乞瑪斯基的格里姆林也疲倦了。我們有人來接。汽車等待着，我們毫無任何困難地進入了莫斯科。我們非常高興再看見薩伏伊旅館裏畫着瘋猴、瘋羊、和被刺死的魚的那個房間。當我們踏着樓梯走上我們的房間去的時候，「瘋」伊拉的半身像向我們霎霎眼睛點點頭，三樓上那隻身體裏塞了草的態挺身向我們致敬。

卡柏帶着一份過時的美國金融報告書到浴缸裏去了，當我睡覺的時候，他依舊還在那兒。據我所知，他是在浴缸裏過夜的。

第九章

莫斯科在一種狂熱的活動狀態中。大羣的人們正在建築物上張貼巨幅標語和民族英雄的畫像，面積有幾畝大。橋樑都穿綴起電光燈球。克里姆林的城垣、尖塔、甚至城梁都用電光圍出輪廓。每座公共建築物都燈光耀目。公共廣場上都搭起了跳舞台，有些廣場裏並搭起了販賣糖果、冰結璉和紀念品的小棚，搭得像俄國童話房屋的樣兒一樣。一種特別的、佩戴在胸前紐孔上的小金屬飾物是官方規定的，每個人都佩上一個。

幾乎每點鐘都有從許多國家來的代表到達。公共汽車和火車都裝得滿滿的。路上全是進城來的人，他們不僅帶着衣服，而且帶着幾天的糧食。他們因為曾經好幾次挨過餓，所以在這次動身時便不願再冒險，每個人都多少帶上幾段麵包。每座建築物上都掛滿彩牌、旗幟和紙花。政府各部都在它們辦公處所在的建築物上懸起它們的徽章。地下鐵道托辣斯懸了一幅莫斯科地下鐵道的巨大地圖，圖底下有一列小型的地道火車在那兒來回奔跑。這吸引了一羣

羣的人，他們整天和遲至深夜都在那兒呆望着它。滿載食料、椰菜、甜瓜、番茄和胡瓜的馬車及卡車不斷地滾進城來——這是集體農場對這個城市在它八百週年紀念的禮物。

街上的每一個人都戴上一枚勳章、或是錦帶、或是紀念戰爭的飾物。這個城市活躍得沸騰了。

我走到先驅論壇報的辦事處去，看到甜喬意·紐曼寄來的一封信。他在斯篤霍姆還有耽擱，要我代表先驅論壇報出席集會，因為他無法趕回來做那項工作。

卡柏狂熱地在他的膠片上下工夫，自己批評着他的工作，從沖洗的好壞到其他種種。他到現在已經有一大堆底片，他要在窗前搞上幾小時，觀察底片，苛刻地抱怨着。一切都不對，一切都不滿意。

我們到文協去看卡拉加諾夫先生，請他確實打聽我們要把膠片帶出俄國必須作些什麼事。我們猜想可能有一種檢查制度的，我們要事先儘量地知道，以便對它能有些準備。他保證我們他立刻就去作這件事，並隨時通知我們。

我們在慶祝的頭天晚上被邀請到波爾索伊劇院去，但沒有說明是什麼事。我們因為發生一件幸運的意外事件，結果沒有能去成。後來我們聽說它是六個鐘頭長的演講，而且沒有人

能離席，因為政府包廂裏有政府人員在座。它是我們曾經碰到的最幸運的意外事件之一。

餐室和酒館都擠滿了人，而且有許多是預留給來自蘇聯其他共和國及其他國家的代表的，因之我們根本就無法插進去。在那天晚上要吃到晚飯確實是非常困難的。這座城市僅是擁擠着人，他們在街頭踟躕，在這個廣場停下來聽一歇音樂，然後又向另一個廣場擠過去。他們東望望西望望，走幾步，再東望西望。鄉下人都張大着眼睛。他們有些人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座城市，更沒有人看到過這座城市這樣地大放光明。廣場上有些人在跳舞，但並不很多。人們大多在那兒擠動着和凝視着，或擠上前去凝視着另外的某樣東西。博物館裏是這樣地擁擠，以致你根本無法插進去。劇院也是軋得滿滿的。沒有那一座建築物不至少掛着一張史達林的巨幅畫像，次大的是莫洛托夫的像。還有各加盟共和國主席和蘇聯其他英雄們的巨幅畫像，它們的大小依次遞減。

傍晚我們到一個美國駐莫斯科記者的住處去參加一個小宴會，這位記者已經在俄國呆了好多年。他能很容易地說俄語和看俄文，他告訴了我們許多關於在目前的俄國維持一所房子的種種困難的故事。正如旅館的經營一樣，大多數的困難多是從一種官僚制度的無效率來的——這樣多的登記和這樣煩的會計使得要做到任何修理幾乎是不可能的。

飯後他從書架上拿下一本書來。「我要你們聽聽這個，」他說，並開始從俄文翻譯，慢慢地讀着。他讀了一些像這樣的東西——這雖不是一個確切的抄錄，但它却是夠近似的。

「莫斯科的俄國人極其懷疑外國人，他們經常受到祕密警察的監視。每一個行動都被注意，並被呈報到中央總部。所有外國人都派有一名衛兵。而且，俄國人不招待外國人進他們的房子，他們似乎甚至害怕同他們多談話。給政府中人的信通常都得不到回答，再送信去也一樣地沒回音。如果誰要堅持下去，他便被告訴說這位官員已經不在城裏了或是生病了。外國人祇有經過了極大的困難才能得到在俄國遊歷的准許，在遊歷期中他們要受到極其嚴密的監視。由於這種普遍的冷淡和懷疑，居留在莫斯科的外國人便被迫得孤伶伶地彼此爲友。」

他還唸了很多像這一類的話，唸完時，我們的朋友抬起頭來說，「你們覺得它如何？」

我們回答說，「我們不以爲你能夠使它通過檢查官。」

他大笑起來。「這是在一六三四年寫的。它是從一個名叫亞丹·奧里爾納斯的人寫的一本名叫「俄羅斯、韃靼及波斯遊歷記」的書上來的，」他接着又說，「你們願意聽一段關於莫斯科會議的記載嗎？」

於是他就從另一本書上讀了一些像這樣的事。「在外交上俄國人是非常難打交道的。如

果誰要提出一個計劃來，他們便拿另一個計劃來打銷它。他們的外交官不僅不是在大的世界裏訓練的，而且大半都是從來沒有離開過俄國的人。實際上，一個在法國呆過的俄國人便被認爲是一個法國人；誰在德國呆過誰就被看作是一個德國人，而這些人在國內便不再被信任。

『俄國人不可能在外交上直截了當地說話。他們從來不坦坦白白地把目的說出來，總是繞着彎兒爭論。儘在字句上挑剔和反覆耍弄，到頭來任何會議的結果都是一團糟。』

他頓了一頓說，『那是一位法國外交官梅耶堡男爵與古斯汀在一六六一年寫的。這些事情使人對目前的待遇可以減少一些煩惱。我並不以爲俄國在某些方面已經有很大的改變。外國來的大使和外交官已經在這兒弄得發狂了六百年。』

深夜我們的主人嘗試駕車送我們回去，但是走到半路他的車子把汽油跑完了。他走出車去，喊停經過的第一個駕車人。經過一陣快速的俄語談話。他給了那個人一百盧布，於是我們就坐進去，由這個陌生人駕車送我們回家。而且我們發覺這差不多是隨時都可辦到的。幾乎是任何汽車一到深夜都變成了出租車子，索求一個非常高的代價。這倒是很幸運的，因爲這兒實際上並沒有正式的出租汽車行駛。出租車子通常都走一定的路線，並照例要把車子裝

得滿滿的。你必須先說明你要到那兒去，然後出租汽車的司機便告訴你他是否朝那個方向去。它們實際上和街車差不多。

除了那種種的佈置裝修以外，還有一大批新的設備正湧出來參加這個週年紀念的慶祝。巨型的新電車和無軌電車都爲了這個慶祝日而上街行駛。蔡斯汽車廠有大批豪華的新車出廠，不過它們幾乎是單供外國來的大代表們用的。

雖然才是九月六日，但莫斯科的天氣已一天天地變得很快了。我們的房間裏冷冰冰的，而熱氣還得再過一個月才開放。我們一下床就得穿上大衣。京都旅館的其他記者們也正在把夏天丟開了的電火爐搬出來。

在慶祝日那天，卡柏幾乎天一亮就拿着他的照像機到街上酣鬥去了。他現在有一位俄國攝影師同他在一起，藉以方便他在城中的行動和向警察解釋他的正當。後來在紅場裏他又帶着一個指派給他的國民兵，以便事情進行順利及避免任何不愉快。他拍攝建築物、羣衆、人面、以及鑽動的人羣，他開心得像他在工作的時候可能那樣的開心。

在許多街道上都擺起了路邊小食攤——我們旅館正對面就有一個——兩張小枱子和一座嵌玻璃的貨櫃；檯子上鋪着白桌布，擺着花瓶和一隻俄國式的大銅茶壺，貨櫃裏放着小三明

治（上面鋪着香腸和起士的單面三明治）、各種醃菜、和小小的梨子與蘋果，都是出賣的。那天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冷天。馬戲團的象在街上結隊遊行，前面走着小丑。這一天沒有任何軍事檢閱，不過體育場上却排定有盛大的表演，我們午後去到那兒。

它是工廠工人的集體隊形表演，都穿着五彩繽紛的服裝。他們表演團體柔軟操和進行式。他們在地上作各種圖形。有田徑賽——有男人的和女人的——以及彈球和排球比賽。還有一種馬跳舞的表演，訓練美妙的馬跳華爾茲、跳波爾卡、跳趾尖舞。

政府某要人也在那兒，不過我們看不到他，不知道他究竟是誰，因為政府包廂正和我們在體育場的同一邊。事實上我們幾乎也有了一個記錄。我們在俄國的整個時期中從沒有看見過一個要人。史達林那時住在黑海，沒有趕回來參加這個慶祝日。

體育場上的表演整整進行了一下午。有腳踏車檢閱和摩托車競賽，最後有一個需要很多準備的壓軸戲。一隊摩托車繞場奔馳。車手坐在車座上，每輛車上站着一個穿緊身衣的女郎，每個女郎撐起一面大紅旗，因此當摩托車開足馬力時，大旗便飄飄後揚。這個行列繞場二週，表演便告結束。

我們動身從動力體育場回來，因為我還得替喬意·紐曼弄先驅論壇報的電稿，卡柏也要

回到羣衆中去繼續使他的照像機喀嚓不停。走到半路，我們爆破了一隻輪胎，剩下的那段路只得步行回去。卡柏被捲到羣衆裏去了，我直到很久以後才看到他。我最後終於走到先驅論壇報的辦事處，寫好電稿，把它送去檢查。

那天晚上我們同路易士·阿拉貢先生夫婦一道吃晚飯，他們住在國家旅館。他們有一間有月台的房間，從那兒可以俯瞰克里姆林宮背後的巨大廣場。從那兒我們可以看到幾乎是繼續不斷迸發的焰火，聽到整晚間歇不停的禮炮。我們前面的廣場是人羣最擁擠的一個。那兒至少有過幾百萬人，他們在廣場上慢慢地轉動和前後地漩洄。廣場中央有一座音樂台，那兒有人演講，有音樂演奏，並有人唱歌和跳舞。我們祇有在新年前夜的紐約時代廣場上才看到過人們這樣緊緊地擁擠在一起。

我們直到深夜才能夠從人羣中擠出一條路回到旅館。街上依舊還有好幾十萬人在那兒擠前擠後，觀望煙火和注視電光表演。

我上床去睡了，但是卡柏却收好他的數百捲膠片，並拿出他的底片，而當我快要入睡的時候，他依舊還對着燈光照看他的底片，痛苦地埋怨着一切都搞得不好。他發現他用了一整天的有一架照像機已經有了一個漏光的地方，而他以爲他所有的膠片或者都毀了。這不會使

他成爲一個非常快樂的人，而我是這樣的替他抱歉，以致我決定第二天早晨免掉他的智力測驗問題。

我們的時間愈來愈短促，而我們還有許多要想做的事情。我們要想看到俄國的作家，他們在我們初到時都不在城裏，或是在黑海、或是在列甯格勒、或是在鄉下。我們要想去看劇院、歌舞劇、和歌舞學校。卡柏還有許多選定的鏡頭要拍。我們每天或每隔一天就到文協去探問我們的照片問題是否已經弄清楚，因爲這件事已愈來愈引起我們的憂慮了。關於我們必須在照片方面作些什麼事我們無法得到一點消息，而我們知道某種的要求是一定要提出來的。然而沒有消息答覆，除了說他們正在進行這件事以外。這期間，我們房間的抽屜裏都塞滿了膠片和一條條沖洗了的底片。

深秋已經到了，冬季正在迅速地逼近來。在莫斯科周圍的鄉下，一種碧藍的霧幕低低地垂在田野上，到處是人們在挖掘山芋和收藏椰菜。

卡柏和我之間漸漸地浮起一重冷淡，因爲一種臭味鑽進了我們的房間，而我們都似乎以爲它是衣服洗得不十分乾淨的臭味。我們認爲我們是乾淨的，我們洗澡洗得很多，換洗的東西都按時送出，然而這種氣味却不斷地增加。我們開始眨眼相向，互作煩言。氣味愈來愈壞

了。我們得經常打開一扇窗。一直到第三天過後我們才發現它是怎樣一回事。麥康將軍曾經送了我們一些D D T彈，其中有一個沒有十分蟻緊，因此它的一點點氣體便臭壞了這個房間。而且因為我們沒有料到是這種臭味，所以我們都以為它是衣服洗得不乾淨的氣味。阿綠索爾的氣味，如果你知道是它，倒還是一種滿好聞的乾淨氣味，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是它，它就有些令人噁心了。當我們發現到這個禍害的來源並把它蟻緊以後，我們都非常歡喜，而房間也就很快地恢復了它的美感。

慶祝日的第二天晚上，琪爾摩邀我們去吃晚飯，隨着時間的消逝他已經原諒了卡拍偷他那本伊里萊·奎恩的事。他的太太不僅長得美，而且還能燒出一手美妙的菜。我們過了一個快樂的、吃得很好、略帶酒意的晚上，因為琪爾摩有幾張剛從美國運到的熱情唱片。我們喝馬爾梯里斯酒，吃鬆脆的小比洛斯齊基餅，還跳了一會兒舞。那是一個愉快的晚上，我們都稱讚琪爾摩原諒卡拍冒犯他的度量。第二天甜喬意·紐曼從斯篤霍姆帶着非常精緻的禮物回來了。他帶來一枝自來水筆、一些打火機、香煙、罐頭珍饈、幾瓶蘇格蘭威士忌酒、和一只裝滿大便紙的手提箱。有他回來真是好極了。

莫斯科正在步入它漫長的冬季。劇院正在上演，歌舞劇即將開始，店舖開始發售棉衣和

人們在冬天穿的氈鞋。街上的兒童都戴起有覆耳的帽子，並在他們的厚外衣上加上皮領。在美國大使館裏，工兵軍曹——他們都是電氣工程的老手——正忙着在重裝整個建築物的電線。去年冬天電線都被燒燬了，大使館的人員沒有了他們用慣的電爐，都不得不穿起大衣辦公。

我們到軍事參贊處五個青年美國軍官住的地方去吃晚餐。那是一頓非常好的晚餐，不過他們的生活却過得並不很快樂，因為他們的行動甚至比其他的人更受限制，他們必須過那種最要四處當心的生活。我敢斷言在美國的蘇聯軍事參贊處也一樣是受到縝密監視的。在他們的房子前面經常站着一個穿制服的國民兵，而當他們一離開他們的房子，暗中就立刻有人跟着。

我們在這所愉快的房子裏和美國軍官們坐在一起吃晚餐，我們吃的是美國餐——一塊羊腿、青荳、一盆好湯、沙辣、小點心和黑咖啡。我們並且想到，在四百年前，或者也在一所像這樣的房子裏面，英國和法國的軍官們，那些穿着繡金大紅制服的青年人，如何也曾坐在他們的門廊上，而同時在外面的大門前，站着全身甲冑的俄國衛兵，手執長矛警戒着他們。這些事情似乎並沒有改變了許多。

像所有遊歷者一樣，我們也到過離莫斯科七十哩的小鎮克甯，去拜訪柴可夫斯基的家。

它是一所秀麗的房子，坐落在一座大花園裏。下面一層現在分用作圖書館、音樂手蹟收藏室、和博物館。但這位作曲家曾經住過的上面一層却一直照原來的樣子保存着。他的臥室還是和他離開它的時候一樣——一件寬大的睡衣掛在一隻狹小的鐵床旁邊，一張小寫字台擺在一扇窗下。雕花的梳妝台和套着一個女性崇拜者送給他的綉滿了花的鏡幕的鏡子立在一只角上，他的生髮膏仍舊在上面。他的起居室和那架大鋼琴——他生平所有唯一的一架——也未加改變。甚至在他的寫字台上還擺着他攔在一只煙灰缸裏的小雪茄、他的煙斗、和鉛筆殘段。壁間懸着他家屬的照片，走出去，在一條玻璃小廊上——他吃茶的地方——有一張乾淨的音樂稿紙。他的姪子是這兒的管理人——現在已經是一個漂亮的老人了。

他說，「我們要使柴可夫斯基的房子看起來好像他剛出去散步而就要回來的一樣。」

這位老人大部份生活在往事裏。他談論音樂巨人一如他們還活着的一樣——談論靡索爾斯基、里姆斯基——卡爾沙可夫、柴可夫斯基，以及其他偉大的音樂家。而這所房子也確實充滿着這位作曲家的存在。鋼琴每年調音和演奏一次。儘可能請最好的鋼琴家演奏，並予灌音。姪子柴可夫斯基先生爲我們演奏了一會兒，琴聲很柔和，惟略有些走音。

我們到圖書館裏參觀手蹟。音符被殘刺在紙上，以一種可怕的倉促切入樂譜，並有整段

被刪除的。在有幾頁上只剩下了八個音符，其餘的都被一支橫掃千軍的鉛筆兇猛地又掉了。接着我們又參觀其他作曲家的手蹟，全都是墨蹟清晰，沒有被刪的音符。但柴可夫斯基作曲的時候，好像每天都是他的末日，每一個音符都是他最後的一個音符一樣。他寫樂曲的時候，心情是狂暴的。

後來這位老人同我們一起坐在花園裏，我們談論到當代的作曲家，他悵然地說了幾句，『有學力的人嗎，是的；巧於匠心的人嗎，是的；忠實和才智的人嗎，是的；但不是天才，不是天才。』然後他向園中深深地望下去，那兒是柴可夫斯基無論冬夏，在做完了他一天的工作之後，每天都要去散步的地方。

德國人曾經到過這所可愛的房子，他們把它改作汽車站，花園裏曾停過坦克。不過在德國人到來之前，這位姪子已經把圖書館裏珍貴的手蹟、照片、甚至鋼琴都安全地運走了。現在它一切都恢復了——一個不可思議、有幽靈出沒的所在。從看守人的小舍窗上傳來了有人在彈鋼琴的聲音，是一個小孩在做功課，躊躇而差錯，而這個以音樂為唯一生命的心碎的小人物，他的不可思議的和深情的寂寞則迷漫了園間。

我們的時間愈來愈短促。我們的生活顯得有些手忙腳亂。我們從一件事衝到另一件事，

企圖要在我們最後的幾天中看到各種的事情。我們去參觀莫斯科大學，俄國的大學生看起來和我們的並沒有什麼兩樣。他們聚集在廳堂裏，談笑，從這個課室跑到那個課室。他們的男女學生各自成雙成對，正像我們的情形一樣。這所大學在戰爭中曾遭轟炸，但學生們在戰爭繼續進行中就修復了它，所以它從來沒有停頓過。

歌舞劇已經開始，我們差不多每晚都去看——它們是我們曾經所看到的最可愛的歌舞劇。它在七時半開始，一直要到十一點以後才完。場面非常偉大。一家商業劇院是無法支持這種歌舞劇的。這樣的演藝、這樣的訓練、這樣的佈景、和這樣的音樂，必須由政府予以津貼，不然它們就不可能存在。這種演出是不可能由售票來開支的。

我們也到過莫斯科藝術劇院，去看了西蒙諾夫的戲劇『俄羅斯問題』，或許是我們在看這個戲時有所誤解，或許是這個演出並不是最好的。以我們的趣味來說，我們覺得它過於做作、過於強調、不現實、和形式化——一句話：過火。美國出版家那個角兒一定會使美國的觀眾禁不住大笑，而俄國人對美國報人的看法也不過略略比彭·赫克脫的看法狂妄得好一點點。但是這個戲劇却是不可相信地成功。而且它對美國新聞界的寫照幾乎被它的全體觀眾看作是絕對的真理。我們原希望還能看到其他的戲劇和其他的演員，看看過份強調是否是普遍

的，但是沒有時間了。我們祇能說，以紐約的標準來看，『俄羅斯問題』並不好。

西蒙諾夫先生毫無疑問地是蘇聯今天最受歡迎的作家。他的詩是全國人民所熟知和吟誦的。他的戰時報告傳誦一時，猶如歐尼·派爾之在美國一樣。而他本人也確實是一個非常動人的人。他請我們到他鄉間的房子去。那是一所簡單舒適的小築，位於一座大花園內。他和他太太安靜地住在那兒。他的房子並不豪華，但却很安逸。我們吃了一頓精美的便飯。他愛漂亮的汽車，他有一部卡底拉克汽車和一部吉普車。他的菜圃、菓園、和畜場供應他的餐桌。他似乎過着一種愉快、簡樸、和安逸的生活。他自然也有敵人，那種由於他的名望引起人反對他的敵人。他是政府的寵兒，曾好幾次受勳，他是俄國人民所普遍愛戴的。

他和他太太都非常動人和親切。我們都很歡喜他們。如像對所有的同行一樣，我們對他的戲劇的批評並不是對個人的。後來我們玩投槍、跳舞、和唱歌。直到深夜我們才回到莫斯科。

莫斯科仍然在一陣忙碌的活動中，因為所有的巨幅畫像、旗幟和彩牌都必須在遭到雨淋或顏色敗褪之前趕快收下來。它們還得用來慶祝十月革命的三十週年紀念。今年的莫斯科是一個慶祝的熱鬧年。建築物上、克里姆林宮上、以及橋樑上的燈光都留下未動，因為雨不致

傷到它們，而它們在十一月七日也還是要再用的。

我們曾經要求看克里姆林宮的內部——每個人都要的——甚至要求把它拍攝下來，最後我們的准許證下來了，但准許拍照的事則沒有辦到。裏面不准攝影，不准攜帶照像機入內。我們沒有獲得特別的遊覽，而祇是一般的遊覽路線。不過，那原是我們所需要的。乞瑪斯基先生又是我們的嚮導，而且夠奇怪的是乞瑪斯基先生以前也一樣沒有到過克里姆林宮的內部。那種許可不是輕易能得到的。

我們走近那條漫長的警衛森嚴的石板路。入口處有兵。我們的名字被登記，我們的准許證被仔細審查，然後一道鈴響了，一個衛兵同我們走過那道門。我們沒有走政府辦公處所在的那一邊。我們走進這個龐大的所在，經過年代久遠的老教堂，走遍這個龐大皇宮內的博物館——這個龐大的皇宮，從恐怖的伊凡起卽爲如許多的沙皇所使用的。我們走進伊凡所睡的小寢室，走進小客廳和私用小禮拜堂。它們都非常美麗、奇異、和古老，而且都一點未動地保留着。我們看到博物館裏保藏了五百年的甲冑、金銀器皿、武器、盜器、服裝、和皇家禮品。那兒有鑽石和寶石嵌鑲的巨大皇冠，有凱塞琳大帝的大雪車。我們看到古代貴族的皮毛衣服和古怪的甲冑。那兒還有其他皇族送給沙皇的禮物——伊利薩伯女皇送的一隻大銀狗、菲德

烈大帝送給凱塞琳的德國銀器和瓷器禮品、榮譽之劍、以及令人難以相信的皇家的排場。

在看了一所皇家博物館之後，一個人就可明白地看出，壞趣味不特不是皇家所不歡喜的，而且簡直是一個絕對必需的。

我們看到伊凡的功臣閣裏面畫着他武士的肖像，那兒原來是不准婦女入內的，我們爬了幾哩長的皇家樓梯，看到許多巨大的鏡廳。我們看到最後那位沙皇和他的家屬曾經住過的那座宮院，裏面一點不舒服地擁滿了太多的傢俱、太多的裝飾品、和太多的黑漆木頭。一個小孩必須同所有這些奇奇怪怪聚集攏來的無聊東西一起生活長大，必然就會把他造成那一種類型的成人，在看了他們必須生活的這種混沌的環境以後，你便可以更容易了解王子們的性格了。當小沙皇皇子要一支槍時，他能夠得到一支二十二式的來福槍嗎？不，他祇能有一支銀質手造、鑲嵌象牙、和珠光寶彩的小小的大口徑槍——在二十世紀是一個過了時的東西。而且他不可能走到外面去狩獵兔子，他祇能坐在草地上，讓天鵝趕到身邊來給他射擊。

在這座皇宮裏面，僅僅過了兩個鐘頭，已足夠使我們氣悶得整天都擺脫不了它。一生活在那裏面，要弄成什麼樣子呢！不管怎樣，我們看到了它，而且我假定我們是歡喜的，不過以後是驕馬也把我們拖不轉去的了。它是世界上最陰鬱的地方。當你走過這些廳堂和這些樓

梯時，你很容易想像到暗殺如何會這樣容易地發生，父親如何可以殺死兒子和兒子如何可以殺死父親，以及任何真實的外界生活如何可以變得這樣遙遠，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樣。我們可以從皇宮的窗口俯瞰到克里姆林的城垣，看到外面的城市，我們可以想像到這些被幽鋼的君王們會如何看待這個城市。正在我們下面的是紅場上那個巨大的大理石壇，他們會經常在那兒殺掉他們臣民的頭，那或許正是出於他們自己的恐怖。我們從一條長階上走下來，以一種得救的感覺走出這個戒備森嚴的大門。

我們忽忽離開那兒回到京都旅館，回到先驅論壇報辦事處，我們抓住甜喬意·紐曼，走下樓去到酒店，叫了四百克的伏特加酒和一頓豐盛的午餐。但我們在經過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之後才消却了克里姆林給予我們的感觸。

我們沒有看到在另一邊的政府辦公處。那是一個從來不接受遊客的地方，我們甚至不知道它像什麼樣兒，除了能望過城垣看到的屋頂以外。但我們聽說那兒住得有一個完整的社會。若干高級政府官員都有宿舍在那兒，他們的僕人也住在那兒；管理人、清潔人員、和守衛，全都住在城垣裏面。不過據說史達林却不住在克里姆林，他在某個地方另有房子，但似乎沒有人知道它在那裏，似乎也沒有人過於留意它在那裏，但他現在據說大部份時間住在黑

海，住在一個四時皆夏的氣候裏。

有一位美國記者告訴我們說，他有一天會看到史達林在街上馳過，他又說，他坐在司機旁邊的座上，以一種奇怪的角度靠向後面，他看來好像非常僵硬。『我那時很訝異，』他說，『它是否是史達林，或它是否是一個假人。他看來不很自然。』

卡柏每天早上都念到他的膠片，我們幾乎每天都到文協去詢問要把我們的膠片帶出去將有些什麼手續，而我們每次都被告訴他們正在作這件事，我們用不着擔心。但是我們却不得不擔心，因為我們所聽到的都是膠片如何被沒收以及如何從來沒有一張被放行的故事。我們聽到了那種說法，而我覺得我們是下意識地相信那種話的。在另一方面，文協的卡拉加諾夫先生從來沒有使我們失望過一次，也沒有對我們說過一次假話。因此我們還是信賴他。

接着莫斯科作家協會來請我們去赴宴，這使我們有些着急，因為這兒全都是知識份子，都是史達林稱爲『俄羅斯靈魂建築師』的作家。它是一個叫人想起來有些害怕的場面。

我們的旅程到現在差不多都完成了，我們感到有些狂亂。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否已經把我們來看的东西都看到了。一個人所能做的和所能看的也僅僅能有這麼多。語言的困難使人發狂。我們已經和許多的俄國人民接觸過，但是我們所需要回答的問題都確實回答了嗎？我把

談話、瑣事，甚至氣候報告都作了筆記，以便後來整理。但是我們和它太接近了。我們不知道我們有些什麼。關於美國報紙所叫囂的事情——俄國的軍事準備、原子研究、奴隸勞工、克里姆林的政治計謀，我們一無所知，關於這些事情我們沒有消息奉告。不錯，我們曾經看到大批的德國俘虜在作工，在清理他們的軍隊所造成的破壞，但在我們看來，這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公道的地方。而且在我們看來，這些戰俘似乎既沒有工作過度也沒有營養不足的情形。不過我們自然沒有詳細的材料。如果那兒有大規模的軍事準備，我們却沒有看到它們。那兒確實有大批的兵士。然而我們却不是來作間諜的。

我們最後企圖要看到莫斯科的各種事情。我們跑到學校去，我們同職業婦女、女演員、學生談話。我們到那兒排起行列購買各種東西的商店去。一種紀念照片的發行一經宣佈，便立刻有人排隊來買，不消幾個鐘頭，而照片便賣光了。當一本新書發售時，也會發生同樣的情形。我們似乎覺得，就在我們在那兒的兩個月內，衣服也有了進步，同時，莫斯科的報紙並宣佈了麵包、菜蔬、山芋、和某些紡織品價格的減低。那兒常常有向商店搶購的事，幾乎是搶購任何可買的東西。曾經幾乎完全轉為戰時生產的俄國經濟現在正在慢慢地回復到平時生產，而一個曾經被剝奪了一切消費品——必需消費品和奢侈消費品——的人民便擁向商店

去購買。當冰結凍擺上一家商店時，一條行列排到好多條街長。一個揹着一箱冰結凍的人準定要被搶購。他的貨色賣得之快，簡直使他來不及收錢。俄國人愛吃冰結凍，從來沒有夠得了大家需要的。

卡柏每天都問到他的照片。他現在差不多已有四千張底片，他把他自己焦慮得憔悴了。而我們每天都被告訴說它不會有什麼問題，規章正在一步步地達到。

莫斯科作家協會爲我們設的宴會在一家喬其飯店舉行。那兒約有三十位作家和協會的主持人，其中有西蒙諾夫和愛倫堡。到這時我已經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我根本不能喝伏特加。我的身體受不了它。但無甜味的喬其亞葡萄酒却很可口。葡萄酒的種類都有號數。這樣，一個人就可知道六十號是一種濃的紅葡萄酒，三十號是一種淡的白葡萄酒。這些號數並不正確，但我們發覺四十五號的一種無甜味的、淡而醇的紅葡萄酒却很對我們的胃口，我們總是叫它。飯館裏有一個喬其亞樂隊和一些舞者，菜和在喬其亞吃的一樣——照我們的口味來說，是俄國最好的。

我們都穿起我們最好的衣服，但相形之下，我們的還是最蹩腳和最不整飾。我們簡直是一種羞辱，甜娜拉略有些替我們不好意思。那兒沒有人穿宴會禮服。實際上，在我們所到過

的圈子裏我們從沒有看見過宴會禮服。或者外交官穿它們，但我們不知道。

這次宴會上的演講長而繁複。席上的人除了俄語以外，大多還能說一種外國語，或是英語、或是法語、或是德語。他們希望我們已經享受到停留在他們國家的樂趣。他們希望我們已經找到我們來找的消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爲我們舉杯祝福。我們回答說，我們不是來考察政治制度，而祇是來看一般俄國人民的；我們已經看過他們許多人，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就已經看到的報告客觀的真相。愛侖堡站起來說，如果我們能那樣做，他們就非常高興了。桌子末端的一個人接着站起來說，有各種的真相，我們必須報告一種足以促進美蘇人民良好關係的真相。

論戰就此開始。愛侖堡站了起來，作了一篇猛烈的談話。他說，叫一個作家去寫什麼是一種侮辱。他說，如果一個作家已經有忠實之名，就不應該再作建議。他把指姆在他同僚的臉上幌動，並指責他的態度是不好的。西蒙諾夫立刻支持愛侖堡，指責第一個發言人，那個人則微弱地爲自己辯護。乞瑪斯基企圖作一篇談話，但辯論繼續進行，把他淹沒了。我們常常聽說，黨的路線在作家中是這樣的嚴厲，是決不容許有辯論的。這次宴會的精神使那種說法看來似乎並不全部真實。卡拉加諾夫先生作了一篇調解性的談話，宴會才平靜下來。

我在祝杯時不喝伏特加改喝葡萄酒使我在胃裏面舒服得多，縱然我或許要被認為是一個弱者，但我却是一個比較健康的弱者。伏特加僅僅對我不適合吧了。宴會於十一時左右在良好感情中結束。後來再沒有一個人來冒昧告訴我們寫什麼了。

我們的出境手續現在已經辦好了。我們將於三天內起程，我們的照片問題仍然還沒有結果。卡柏滿肚子不高興。美國大使館裏的人和記者們都對我們這樣好，因此我們覺得應當招待一次鷄尾酒會。駐莫斯科的記者很少人弄到住宅，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可憐的斯蒂芬却弄到了一所。其餘的人都住在旅館裏。因此斯蒂芬的地方就被選來開招待會。他對這件事也不能有多大的盡力，即使他要那樣做。我們擬好一張請客名單，發覺至少有一百人得請，而斯蒂芬的客廳僅能舒暢地容納二十個人左右。但那是沒有補救辦法的。我們以為或許有些人不會來，但我錯了。結果來了一百五十人。酒會在莫斯科是非常受歡迎的事情。那次的酒會也很有趣，不過酒却喝得不多。房間裏的人是這樣擁擠，以致你幾乎無法把你的手臂舉到你的嘴邊，而一經舉起來你就無法再把它放下去。斯蒂芬簡直就沒有怎麼看到他的酒會；他很快就被陷在一個角落裏，一直就沒有從那兒逃出來。

我們應當對大使館的人員和駐莫斯科的記者表示我們深忱的感謝。他們給予我們各種可

能的幫助和鼓勵。而且我們以爲他們在這個難搞的和艱難的環境下處理得非常好。舉一件事來說，他們並沒有像世界上許多的人那樣失去了他們的頭腦。這不特不是最愉快的，或許竟是今天世界上最尷尬的政治場面。我們謹此向他們全體致意，從大使到重裝大使館電線的

T/50

我們將在星期天早晨離開。星期五夜晚，我們到波爾索瓦劇院去看歌舞劇。我們剛出來就有一個緊急電話叫我們。它是文協的卡拉加諾夫先生打來的。他終於從外交部得到通知。我們的膠片每一單張都必須沖洗和檢查之後才能出境。他要派一組人作沖洗照片的工作——一共有三千張照片。我們訝異它如何能作得了，如果我們得在最後這個時刻來作它。他們不知道所有的照片都早已沖洗好了。卡柏把全部底片包起，第二天一早一個信差來把它們拿了去。他煩悶了一天。他四處踱來踱去，好像一只母雞失掉了她的雛兒一樣咯咯地叫着。他作着種種打算，他沒有他的膠片決不離開。他要取消他的定票。他決不答應讓膠片在他走後送來。他唉聲嘆氣地在房裏踱來踱去。他把頭髮洗了兩三次，却根本忘掉洗一次澡。祇要一半的困難和痛苦，他就可以養一次孩子了。我的筆記他們甚至問都沒有問。但假如它們被要了去，也不會有什麼不同，因爲沒有人能夠讀得懂它們。我自己讀起它們來還感覺困難。

我們費了一天的時間向各方面辭行，並答應爲他們寄來各種缺乏的東西。我們以爲甜齋意看到我們離開似乎有些黯淡。我們搶去了他們的香煙和書籍，用了他們的被褥、肥皂和大便紙，偷喝了他僅有的一點點威士忌存貯，以各種可能的方法褻瀆了他的招待，但我們仍然以爲他看見我們走是難過的。

卡柏以一半時間盤算如果他的膠片有什麼不幸他就要反革命，在另外那一半時間裏，他又僅僅想到自殺。他決不定他是否可以在紅場裏的刑台上砍掉他自己的腦壳。那天晚上我們在大飯店舉行了一個黯淡的小酒會。音樂比往常更響，那個我們叫作茜莎斯小姐（快一點小姐）的吧孃比往常更慢。

我們最後一次在黑夜裏爬起來赴飛機場。我們最後一次坐在史達林的畫像下，我們似乎覺得他那擱在勳章上面的面孔正在譏諷地微笑。我們照例喝茶，卡柏到現在似乎有些顛抖了。然後一個信差來了，把一只匣子交到他手裏。它是一只堅韌的紙版匣子，蓋子用繩縫着，結上有小鉛印。他必須等到我們通過了基輔機場——到布拉格的最後一站——之後才能動那

些印。

卡拉加諾夫先生、乞瑪斯基先生、甜娜拉、和甜喬意·紐曼都來送行。我們的行李比以

前輕多了，因為我們把可以省掉的東西都送掉了，整套的衣服和茄克、幾架照像機、所有多餘的鎂光泡、和沒有照過的膠片。我們爬進飛機，坐上我們的座位。到基輔是四個鐘頭。卡柏把紙版匣捧在手裏，他不得打開它。如果印弄壞了，它就過不了關。他在手裏量量它。『它很輕，』他苦着臉說，『它僅夠一半重。』

我說，『或許它們在這裏面放着石頭，或許那裏面根本就沒有什麼膠片。』

他搖搖匣子。『它的響聲像膠片，』他說。

『它或許是廢報紙吧，』我說。

『你這個狐狸養的，』他罵道。然後他就和自己討論起來。『他們要把什麼東西抽去呢？』他問。『這種東西是對人無害的呀。』

『或許他們就是不高興卡柏的照片，』我提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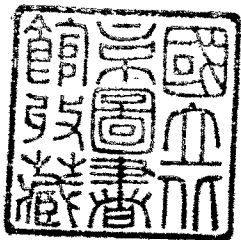
飛機飛過廣闊的平原同它的森林和田野，飛過迂迴曲折的銀色的河流。那天天氣很美，秋天的薄霧低低地罩在大地上。女侍應生把淡紅色的蘇打水拿給飛機師，又走回來給她自己打開一瓶。

正午我們在基輔降落。關員把我們的行李略略檢查了一下，但膠片匣子立刻被揀了起來。

他們已經得到關於它的通知。一個官員把繩割斷，卡柏這時的神色像一頭受驚的羊一樣。以後是官員們微笑，握手，走出去，機門關上，引擎開動。卡柏雙手顫抖着把匣子打開。膠片似乎全部在那裏。他面露笑容，把頭向後一靠，在飛機還沒有昇到空中時，他已睡熟了。底片被抽去了一些，但並不多。他們把過於顯示地形的膠片取去了，史達林格勒一個瘋女郎的遠距離鏡頭不見了，顯示戰俘的照片——從我們的觀點看來並無多大關係——被扣留了。此外，農場和人面，以及俄國人民的照片，都沒有動，而這些正是我們原來要去照的。

飛機飛過邊境，午後很早我們就在布拉格降落了，我還得叫醒卡柏。

好了，都在這裏了。它就是關於我們去找的東西。我們看到，如我們揣測的一樣，俄國人民也是人民，而且，正和其他人民一樣，他們也是非常可愛的。我們所遇到的俄國人都痛恨戰爭，他們也想要所有人民想要的同樣東西——好生活、不斷增加的舒適、安全與和平。我們知道這本日記既不會滿足教會式的左派，也不會滿足冥頑的右派。第一種人會說它是反蘇的，第二種人會說它是親蘇的。它確實很膚淺，它如何能不是呢？我們沒有結論可下，除了說俄國人民也像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民一樣。不好的人固然不免也有，但絕對大多數的人都是非常好的。



蘇聯行

一版出年七十三國民一

原作者 史坦倍克

翻譯者 蔣買學開基模

發行人 買開基

發行所 文摘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上海北京路二六六號大樓四樓

元四十價定本基

• 有 所 權 版 •

1 1950 收

]